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日本留蘇學生座談蘇聯
現代修正主義的實況

新谷明生・足立成男 著
佐久間邦夫・原田幸夫

余以謙 譯

香港三聯書店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

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香港威靈頓街二十八號

大千印刷公司印刷

香港英皇道六五七號五樓

*

1969年12月版・定價港幣二元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日本留蘇學生座談蘇聯
現代修正主義的實況

新谷明生・足立成男 著
佐久間邦夫・原田幸夫

余以謙 譯

香港三聯書店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

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香港威靈頓街二十八號

大千印刷公司印刷

香港英皇道六五七號五樓

*

1969年12月版・定價港幣二元

毛主席語錄

各國的人民，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

出版說明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書爲日本留蘇學生新谷明生、足立成男、佐久間邦夫、原田幸夫等合著，首先在日本山口縣《長周新聞》登載。一九六九年三月由東京大安書店出版。後經余以謙譯成中文，題爲《留蘇聞見錄》，於六月間開始在香港《大公報》連載，頗受讀者歡迎。爲徇讀者要求，本書現再根據原著譯校出版。

香港三聯書店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係 蘇聯實力政策的失敗 倒向西方的東歐
各國——旨在賺取美元的觀光事業 來自西方
的經濟侵略——引進外資 南斯拉夫是修正主
義的老前輩 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青年、學
生的示威游行 羅馬尼亞的“獨立自主”路線
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獨立自主”路線 從
諾沃提尼到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
的發展和蘇聯等五國軍隊的侵略 西德的威脅
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 作為社會帝國主義
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 與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
阿爾巴尼亞人民 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
定會起來反對修正主義

前 言

最近數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真正是一個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過程，發生了一個接着一個的從一般馬列主義的常識出發無法想像的事件。我們自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八年在莫斯科留學期間，遇到了這一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的大風暴。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如：由“加勒比海危機”直接引起的中蘇公開論戰，赫魯曉夫下台，直到中國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這些事件，都是我們這次座談會面對的問題。當時在莫斯科的日本留學生是採取什麼態度的呢？蘇聯學生和蘇聯人有些什麼反應？在民族友好大學留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國學生是怎樣對待這一連串重大事件的呢？我們只是把我們的體驗如實地說出來。

今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的大動蕩，牽涉到世界上所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和一切共產主義者，要求他們作出抉擇：是向左呢還是向右？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截然分成革命的和機會主義的兩個壁壘。毛澤東思想代表了革命的、左派的、布爾什維克的潮流；赫魯

曉夫修正主義則集中代表了機會主義的、右派的、孟什維克的潮流。這一事實擺在世界億萬人民面前，已愈來愈明顯了。

爲了判斷什麼是真的共產主義和科學的共產主義，有必要把論戰雙方的理論及其實際拿出來檢查。不管在理論上怎樣說，總不能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從這一點來判明是誰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維護、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誰以“情勢的變化”爲藉口，抽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靈魂，篡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要用這個觀點一檢查，就不能不承認今天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的路綫，是真正的現代修正主義路綫。在此以前，有誰會想到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蘇聯，黨和國家權力會被一小撮現代修正主義者所篡奪，並復辟資本主義呢？但是現實就是現實。

對於這些修正主義者的猖獗、跋扈，我們光是發出慨嘆是不行的。我們必須起來，斷然地和國內外的現代修正主義者進行鬥爭，打倒他們，使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獲得勝利，在日本實現社會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這份有關蘇聯實況的座談報告，如果能在激烈的反帝反修鬥爭中起一些作用的話，就是我們最大的喜悅了。

作者於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目 錄

前 言

一、我們為什麼留學蘇聯…………… (1)

民族友好大學創建的情況 民族友好大學的學生生活
留學的經過 抱什麼目的留學
民族友好大學的國際性 對蘇聯人民的感謝

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現實…………… (13)

蘇聯的青年 對政治漠不關心 毫無意義的紀念大會
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興趣 不良少年的出現——“游蕩兒”
“要住房，要汽車，不要老一輩的人” 修正主義從思想和文化的變化開始，西方廣播自由開放，却不准聽北京廣播
“同志”這個稱呼正在消失 自卑感與優越感
“紅場”上的妓女 一看電影就明白社會真相
帳篷裏發生的料想不到的事
剝開皮來看 正經人被認為是笨蛋，貪污腐蝕着整個社會
官僚主義壓制創造性 不能唱革命歌曲的“五一”節前夕
黨和人民的關係
入黨是穩定社會地位的保證 只要人民服從的黨的領導
忘掉了“為人民服務”和“羣衆路線”的觀點
新特權階層的形成和黨的變質 喪

失了黨的領導作用——屈服於“和平的敵人”美帝國主義 失去了對黨的信任 俄語中沒有“羣衆路線”這個詞 黨員的條件——不論思想好壞，“有能力的人”就行 能動地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思想領域的鬥爭的重要性 人民民主 不進行自我批評，不查明思想根源，不組織羣衆討論 否認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學校當局對日本的想法，反對日本駐蘇大使來校事件

三、蘇聯的對外政策——援助越南和敵視中國… (54)

到美國大使館前舉行抗議示威的隊伍遭到血腥鎮壓 蘇聯當局對越南留學生施加壓力 蘇聯認為美帝國主義比越南人民更重要 宮本集團爲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辯護 事實說明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蘇聯當局竟審查越南拍攝的新聞紀錄影片 逼人說“感謝蘇聯援助” 把印尼留學生交給了蘇哈托反動政府 拋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蘇聯 在以色列侵略問題上出賣阿拉伯人民 蘇聯不報道拉丁美洲的武裝鬥爭 連經濟地理教科書也把蘇聯“援助”寫進去 蘇聯“援助”印度的成就 以“恩人”自居激怒了非洲學生 古巴事件時的“援助” 已有固定內容的蘇聯式“支援各國人民集會” 爲了滿足私欲，蘇聯學生希望被派到國外去 蘇聯和中國對非洲援助的不同 在國外過着貴族生活的蘇聯技術人員們 革命學生對中蘇兩國的態度的不同 “九·三〇”事件後印尼留學生的分裂 蘇聯人怎樣看中國呢——徹底

的反華宣傳 連“紙老虎”和“東風壓倒西風”
也不懂 當中蘇論戰剛開始的時候 對暗殺
肯尼迪事件的反應 也有了解中國的人

四、赫魯曉夫下台及對這一事件的反應…………… (96)

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委 報道赫魯曉夫下台的前
後 失魂落魄的蘇聯學生 由赫魯曉夫下台
引起的校內動蕩 完全投降了的宮本集團
一九六四年的“五一節”事件 瞪着眼睛撒謊的
蘇聯現代修正主義 學校當局對學生施加壓力
思想鬥爭和修正主義 報紙是兩黨關係的
晴雨表 按政治風向招收外國學生 民族友
好大學的日本留學生 “親蘇派”各國留學生正
在增加 志賀一派的末路 宮本一伙的轉變
方向 被外國學生拋棄的宮本修正主義的路綫
同現代修正主義決裂 “修太郎”壓制批評
同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人民的團結大會

五、毛澤東思想和各國留學生的動向…………… (131)

毛澤東思想給各國學生的影響 驅逐非洲留學
生事件 我們同各國留學生們建立在無產階級
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和“修太郎”的孤立 各
國留學生對“日本晚會”的援助 同中國學生的
友好 宮本一伙的“獨立自主”路綫 學習毛
澤東思想 從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發展到同
自己的修正主義作鬥爭 蘇修和日修的反華大
合唱 世界性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破“私”立“公” 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六、斯大林問題和現代修正主義…………… (157)

以實用主義改變對斯大林的評價 戰爭與和平問題 德國問題對蘇聯所具有的意義 蘇聯的斯大林時代和現代的根本區別 “蘇維埃選舉”和先鋒黨的變質 斯大林沒有培養革命接班人 斯大林的缺點和毛澤東的羣衆路線 從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到勃列日涅夫的“法西斯黨” 宮本一伙的“組織原則” 蘇聯軍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根本區別

七、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191)

社會主義各種制度的變質和崩潰 “休養之家”的實況 人口集中大城市和房荒 “物質關心”和“物質刺激” 作學問也搞“物質關心”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 資本主義的“集體農莊市場” 什麼人掌握着生產資料 騙人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理論 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和蘇聯對它的輕視 修正主義毀滅了社會主義

八、東歐各國的印象和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 (214)

保加利亞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東德
南斯拉夫 羅馬尼亞 蘇聯國內的民族問題 同反社會主義聯結在一起的反蘇情緒 西方的思想、文化乘機而入 沒有權威的東歐各國共產黨 東歐比蘇聯早一些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和東歐各國的關

一、我們爲什麼留學蘇聯

新谷：首先，我們想從我們曾經度過了五年留學生活的莫斯科民族友好大學是什麼樣的大學等話題談起。談談我們當初抱着什麼樣的目的進入這所大學？我們在赴莫斯科之前，對從未見過的社會主義國家抱着什麼樣的印象？我們對蘇聯原來抱着怎樣的希望和期待？以及過着什麼樣的大學生活？

民族友好大學創建的情況

原田：我們上的這所大學，正式名稱是“帕托里斯·盧蒙巴各民族友好大學”。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開辦。帕托里斯·盧蒙巴是剛果前總理，是民族解放鬥爭中出色的戰士。一九六一年爲比利時和美帝國主義者所殺害。

這所大學是赫魯曉夫在任時，作爲他的“和平共處”、“裁減軍備以援助落後國家”政策的一環而開辦的。此舉意思是說，只要裁軍，就能做出這種好事。蘇聯作出了這樣的例子，利用裁軍節約下來的開支創辦了這所大學。

所以，剛創建時，就原封不動地利用了原來的陸軍大學的校舍。現在正在莫斯科郊外建築校舍、宿舍、醫院、體育館。將來，在這裏要建成一個大學城。當初宣佈創建這所大學的時候，真成了世界青年男女嚮往的所在，那時，據說有世界八十多個國家的四萬多人報名，以印尼學生為最多，近五百人。現在有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國的青年，加上蘇聯的青年，共約有三千學生。沒有錄取除古巴以外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學生。古巴也從一九六四年起，沒有再向這所大學選派學生。社會主義國家的學生，似乎是根據政府間的協定，在我們這所大學之外的另一些大學就學。

足立：本來，這所大學是借赫魯曉夫的名聲建立起來的，在他下台時學校當局就很擔心這所大學是否會撤消，結果沒有撤消。但是，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後，蘇聯政府好像對這所大學很快地失掉了熱情，本來蘇聯學生只佔全體學生的一成到兩成，後來却逐漸增多，外國學生佔的比例不斷減少。日本學生每年平均有十五人入學，現在總共不過七十多人。

我們這所大學，一九六五年六月送走了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典禮是在克里姆林宮裏舉行的，不過，印象很深的是，出席致詞的不是赫魯曉夫，而是柯西金總理了。

民族友好大學的學生生活

佐久間：這所大學是像日本也有的那種擁有各類院系的綜合大學，學生全部住校。一般的院系，入學後首先要讀一年的俄文預科，本科學習期限為四年，全期是五年，僅醫學系是七年。

原田：蘇聯方面負擔入學時赴莫斯科的旅費和畢業時回國的旅費。五年中間，每月發給九十盧布的獎學金。由於莫斯科的冬季每天都是零下十幾度到二十幾度的氣溫，所以在入學以後還發給三百盧布的大衣、鞋帽費。因為學費、宿費、醫療費也是免費，所以，像我們這些日本學生，獎學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吃飯上面了。這一般需要六十盧布，剩下來的三十盧布買書籍和日用品，或者用作暑假旅行的費用。

足立：日元和盧布的官定比價是一盧布兌四百日元，大致計算起來，實際只不過是一盧布兌二百日元左右。

新谷：稍微說一下我們讀的經濟系，從預科到本科畢業共五年，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從早晨九點到下午三點上整整六小時的課。當然，講課都用俄文。到了高年級，為了寫學年論文，除了星期日以外每星期還有一天休息。為了不出缺課的人，檢查上課或缺課是很嚴的。不准學生自己選修課程，有關經濟學的一切學科都作為必

修課來學。這是和日本的大學很不相同的。

原田：蘇聯是從九月一日開始新的學年，六月底結束這一學年。一學年分爲兩個學期，一月和六月有兩次考試。在一月的考試以後有兩個星期的寒假，在六月的考試以後，七月和八月是暑假。假期內，或者是到莫斯科以外的城市旅行，或者是到學校的“休養之家”去。這樣可以詳細地參觀了解蘇聯的國內情況，直接同蘇聯人民接觸。在暑假期間，到歐洲去旅行的，或者是回日本的人也很多。

佐久間：當然，我們在五年中間，都是用俄語，不但聽蘇聯人的課，有時因實習也到各種各樣的企業去，這不像接待外國代表團那樣，沒有譯員，對話要靠自己，所以不單單是表面上的“參觀”，還可以接觸社會的實際。暑假到蘇聯國內旅行時，雖然也必須照外國人一樣辦手續，但是也可以到那些短期參觀旅行所不能到的地方，而且，可以同任何人談話。所以能從不同於一般旅行者的角度來看蘇聯。

足立：各國學生都分別組織了學生會。日本人學生會的全體學生，在政治上思想上態度並不都是一致的，但在作爲日本民主力量的一員而行動這一點上需要統一思想。我們的學生會，從新生的歡迎直到畢業生的歡送，自始至終都是整個留學生活中相互幫助的組織。日本人學生會，還在提高日本留學生的政治思想和促進國際團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們的留學生活成爲非

常有意義的事。

留學的經過

新谷：如果想上這所大學，必須經過蘇聯方面認為是可靠的政黨、民主團體、工會或個人的推薦。我是通過日蘇協會的推薦而入學的。

足立：我也是同樣。

佐久間：因為我當過國營鐵路工會支部的書記，就要求工會推薦我，我是一九六三年去的，一九六八年七月回國。其餘，是同其他各位一樣，通過日蘇協會作了留學的準備的。

原田：我在高中讀書時就積極參加“反對評定職務鬥爭”和“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鬥爭”。高中畢業後又在日蘇協會高知縣聯合會工作了三年。由於年輕，充滿了正義感和火一般的熱情，幹得非常起勁。在這三年裏，我模模糊糊地對日蘇友好運動、民主運動有了一些認識。我覺得為了使運動發展得更有意義，仍然需要讀書。如果照現在這樣下去，將來一定會有局限性，所以要認真考慮一下上大學的問題。我也考慮到了上這個民族友好大學。很幸運，當時的高知縣日蘇友好協會領導人對我那三年中的工作評價很好，全力幫助我，實現了我留蘇的願望。因此，在留學期間，我為了報答這些領導人的期

望，腦子裏總是在想，我是高知縣民主力量的代表，非好好學習不可。

可是我現在却成爲一個毛澤東思想的熱烈擁護者回國了。回國後有些朋友問我：“如果去中國成爲親中國派還說得通，像你們這些過去搞日蘇友好運動的人，去蘇聯之後竟變成親中國派回來，究竟是什麼道理？”

足立：我們對這點可說是自己也感到奇怪，看來人們是不容易理解的。五年來，我們在蘇聯每天每天都看到十月革命的祖國不斷在變質、腐敗、墮落。我們現在終於明白，要實現共產主義，除了毛澤東思想以外，沒有別的道路。關於這一點，我們還要向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者抱有幻想的人們傳播，讓他們對照今天蘇聯的現實，了解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這才是我們的重大任務。

抱什麼目的留學

佐久間：我對十月革命成功的蘇聯，過去是很嚮往的，也曾經是參加日蘇友好運動的一個小小的活動家。在日本，無論怎樣設想，都無法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實感。例如：沒有資本家、沒有剝削的優秀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具體情況？無論怎樣也是想像不出來的，只不過是有些抽象的概念而已。到底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的

人，思想如何，喜歡些什麼？日常生活中有些什麼看法？我對這些都是很感興趣的。

存在決定意識，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關係變了，當然人的意識也要變。我非常想看看，在蘇聯共產黨領導下，應該說是受過充分思想教育的蘇聯青年，特別是最近出生的青年——他們是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和日本資本主義教育下的青年，究竟有什麼不同？也就是說，儘管還沒有完全變為共產主義的人，但已接近於這樣的新人的形象，在蘇聯的青年中是怎樣形成的呢？所有這些，我都很想親眼看一看，親身體會體會。我自己也很想在這樣的社會裏得到改造。

我留蘇的另一個理由是，以前稍微學了一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但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經濟理論却一竅不通。如果我能直接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就想專攻社會主義經濟。這就是我進民族友好大學選讀經濟系的動機。

但是，我想到的比什麼都更為重要的却是，在列寧的國度，一定要通過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些方面，把革命思想好好地學到手。所以，從一開始我就根本沒有考慮過要從蘇聯學些什麼知識回來好做工作。

足立：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到蘇聯留學，一九六七年回國。一九六二年正是《莫斯科聲明》發表之後的兩年，正如聲明中所說“資本主義世界進入全面危機的新

階段”，是反帝民主力量壓倒帝國主義的時期。加加林成功地進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宇宙飛行也是在這個時候，正是蘇聯的發展狀況引起世界上的人們注意的時候。非洲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一個國家接着一個國家取得了獨立。在這樣的時期裏，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去到蘇聯學習。那時，我感到我的責任和使命重大，我考慮到我是從日本的鬥爭着的很多希望學習的人們中挑選出來的，因而在回國以後也就必須爲這些人們而努力工作。

但是，蘇聯的現實，初時令我失望，繼而令我憤怒。倒是從最近幾年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中，正像印度尼西亞的艾地說過的那樣，在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學校”中，使我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毛澤東思想。

原田：我留學蘇聯，原抱有四個目的：第一，我想正確地了解世界上第一個使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成功的蘇聯，向它學習。第二，通過專攻經濟學，學習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第三，希望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下的新社會的蘇聯男女青年共同生活，一起學習；第四，希望和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青年交流，正確地了解國際主義精神。我抱着這四大目標，滿懷希望，同時也意識到任務的重大，離開橫濱前赴蘇聯。

剛巧，我在一九六三年到蘇聯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了。這時，中蘇兩黨開始公開論戰。我這個被

稱爲日蘇協會高知縣聯合會的青年活動家，當時感情上是親蘇的，和我一起去的留學生，我想也是親蘇的。

關於共產主義運動這一場國際大論戰，我在日本時每天收聽北京和莫斯科廣播，試圖盡可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判斷、分析誰是正確的。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分歧？就是爲了日蘇友好運動，也非弄清楚不可。當時聽到一種解釋，“支持蘇聯的和平共處政策，總是正確的”，我自己也就隨便附和了這種看法。到莫斯科以後，目睹蘇聯的種種現實，這才了解到今天蘇聯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實際情況，決心要徹底地和修正主義作鬥爭。

新谷：我的情形和大家一樣，留學蘇聯的目的，是希望是世界上第一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學習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和理論，學習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各種理論和實際。

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初到達莫斯科，這年年底就爆發了中蘇公開的論戰。第二年七月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下台，這一連串的事件，使我受到留學初期時無法想像的大沖擊。我們在這個大漩渦中學習到種種非常寶貴的經驗。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開始之後，特別是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後，日蘇兩國共產黨的關係惡化了，蘇聯當局對日本留學生的態度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赫魯曉夫下台前夕，我們已陷入隨時可能被驅逐回國的境地。一九六六年，中國爆

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這時起，日蘇兩黨關係又開始恢復好轉，到我們一九六七年畢業回國時，日蘇兩黨關係已非常好轉了。我們在蘇聯留學的五年期間，遇到了日蘇兩黨關係前所未有的令人眼花撩亂的變化。

我們在這個期間，無論在理論上和生活體驗方面，都接受了深刻的教訓。現在我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正在中國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

民族友好大學的國際性

佐久間：對我們來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這就是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八十多國的學生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一起思考，就能夠一起鬥爭。我有許多時間和拉丁美洲的學生住在同一個房間。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到莫斯科不久，巴西發生了反革命政變。如果是在日本，我可能對這件事不那麼關心，可是和巴西學生住在一起，就實在不能當作是別人的事情了。

這個時候，巴西的民主人士大量被殺害，被下獄。在莫斯科的巴西留學生都是曾經和他們一塊兒進行革命活動的，是他們的親人。他們有一個星期左右徹夜不眠，搜集消息，商討對策。因為對於他們來說，由於祖國的政變，就會發生即使是畢業之後也有國不能歸的事態了。這次事件使我們感到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都是彼此

相關，就在自己身邊一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對待這類事情應該採取什麼立場，同學們就熱烈地展開了辯論，並努力學習理論。

新谷：由於亞非拉三大洲的反帝和民族獨立運動迅速蔓延，從這些地區到蘇聯來的留學生對政治問題都是非常敏感的。他們說政治和他們的關係就是生命攸關的關係。在這一點上，我們日本學生就存在着只是口頭上議論議論的弱點，所以我們從中獲得了深刻的教育。只須略一想想，巴西、印尼、加納和阿爾及利亞等許多國家的政變，越南戰爭，以色列的侵略，這類現實的教訓實在太多了。

佐久間：碰到這類事情，民族友好大學的當事國學生立即成立鬥爭組織。我們也明確表明我們的立場，參加他們的鬥爭。這些問題迫使我们對一些政治事件必須認真考慮，展開討論。

足立：在民族友好大學裏，各國學生、各種政治立場的人都有。他們又各有不同的情報網。像巴西政變這類事情發生後，很快就獲得來自各方面的詳細情報，幫助我們正確地判斷事物。而且，那種不容許有任何敷衍了事的判斷的踏實精神，已成為我們的寶貴的經驗教訓。

在留蘇五年期間，我曾先後和俄國人、印度尼西亞人、坦噶尼喀（現在的坦桑尼亞共和國）人、古巴人、哥斯達黎加人、厄瓜多爾人同住一個房間。從地圖上

看，這些國家大多是小國，過去對它們不大關心。回國後再在報紙上看到刊載這些國家的消息，就想起這些同學，對那些新聞也有了親切之感。

新谷：在民族友好大學裏，值得回憶的事情當然很多，但其中最值得提到的就是我們和來自亞非拉三大洲、從事民族解放運動的青年們結成了親密的友誼。我可以斷言：這些國家的正在從事鬥爭的青年學生，都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他們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有了認識。

對蘇聯人民的感謝

新谷：在蘇聯居住期間，對蘇聯人民的質樸、善良性格留下了強烈的印象。蘇聯人民現在雖然在修正主義集團統治之下，但是毫無疑問，蘇聯人民必將會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列寧、斯大林親手締造的社會主義精神，必將在蘇聯國土得到恢復和發揚。

對給了我們在莫斯科學習五年的機會的日蘇兩國人民，我們衷心表示感謝。我們將遵從列寧指出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為日蘇兩國人民的今後根本利益而工作。

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現實

蘇聯的青年

新谷：首先，我們還是談談蘇聯的青年吧。經過革命後五十年的蘇聯，她的第三代、第四代青年的人生觀如何？世界觀怎樣？今天蘇聯青年的思想是怎樣形成的……

佐久間：簡單說來，一句話就能解決問題。只要你想一想在日本隨時都能碰到的那些只知享樂，對政治毫不關心的人，就知道了。

具體地來說，他們認為，政治和戀愛觀、人生觀、生活興趣是一樣的東西，可以隨個人好惡而定。包括“共青團”的幹部，對政治也表現出驚人的漠不關心。我們這個民族友好大學，學生們常常主動召開有關政治性的集會。但是跑到莫斯科大學看看，那裏的學生最多，幾乎是清一色的蘇聯人，學校裏越南留學生多次召集抗美援朝集會，却硬是開不起來。有一次莫斯科大學召開了有幾百人參加的援越集會，而其中只不過有蘇聯學生十幾二十人。但是在這個會場的隔壁，第二天舉行了一次舞

會，全場擠滿了蘇聯男女學生，他們在舞會上大跳西方扭腰舞、搖擺舞。

看到這種事情實在令人生氣。而在民族友好大學讀書的蘇聯學生，也完全一樣。

原田：就這一點來說，蘇聯的母親們的一般想法是，自己這一輩人已經吃盡了苦，好容易到這個和平時代，可不能讓自己的子女再受那種苦了，青年們願意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吧。這種想法是從哪裏來的呢？一句話，就是從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的黨和政府的“和平共處”政策來的，並且越來越濃厚了。

所以，青年們的想法也就是進大學，就高職，拿高薪，娶個漂亮的老婆，過舒舒服服的日子。特別是大學生和中上層家庭的子女，這種想法更為普遍。

對政治漠不關心

新谷：不限於青年，在一般蘇聯人之中，漠視政治的風氣也是根深蒂固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當我畢業後辦理回國手續向學校告別時，一位蘇聯教授對我說：“好啦！再見！”這是他給予我的最大限度的歡送詞。那意思是說：“你回到日本後可以找到好的職位，拿高薪，有了錢，就可以討個漂亮的老婆”。（笑聲）我簡直是無言以對了。

那位教授在蘇聯可說是最標準的正經人。他說這些話並沒有惡意，完全是他的真心直言。蘇聯全體的大學教育工作者都抱着這種想法，不僅是教授、講師如此，蘇聯的青年和學生從小到大，就是夢想進第一流的大學，最好是著名理工科的學府，學成之後成為專家、高級技術人員。在大學學習中，最好能入黨，畢業後就可以一步一步爬上去。生活理想是，住高級豪華的別墅，家庭用具全部電氣化，出入有汽車代步，這些就是蘇聯青年人夢寐以求的東西。

從這點來看日本，許多青年人不也是不關心政治，只知埋頭讀書，一心要做一個高級技術人員，將來過舒適安定的生活嗎？可以說，蘇聯青年不關心政治的傾向比日本青年還要普遍。蘇聯沒有像日本、西歐那樣的學生運動，也沒有日本那樣的私立大學，所以蘇聯的教育就是有系統地徹頭徹尾培養不關心政治的人。

毫無意義的紀念大會

新谷：在蘇聯，“五一”勞動節和十月革命節是最重要的節日，每年都要盛大慶祝。黨政機關、大學當局也在自己的單位舉行慶祝集會。在蘇聯，“五一”集會是分成兩部分的：第一部分是開會儀式，講話，致節日祝賀等；第二部分是餘興節目，唱歌、跳舞等。但是第一部

分的集會，會場幾乎是空的；到第二部分時，觀眾還要看是否有著名的歌手演出，或者是否有吸引人的影片，才決定入場參加。據參加過克里姆林宮“五一”集會的人說，那裏的集會也是如出一轍。在一些黨和政府高層領導人出席的集會，預定開會的時候到了，只見座席上放着一方方的手帕，表示人已到，座位則是空的。演講人只是對着一方方手帕講話，到第二部分餘興節目開始時，才看到手帕的主人陸續進場。這在十年之前就已經如此了。

不僅僅是青年人，蘇聯一般人也多數對政治不關心。首先是蘇聯政府的宣傳，就叫人民羣衆不要關心政治。他們說，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蘇聯的黨和政府領導人是人民的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沒有矛盾。政治是他們的事情。工人們只要去採煤、煉鐵、分担一種生產任務，放心將政治全部交給政府辦理就行了。

其次，蘇聯領導層內部不斷爭權奪利，例如赫魯曉夫下台，一會某個人上台，另一些人下台，這類事情究竟怎樣發生，人民大眾完全被蒙在鼓裏，使人民大眾對政治具有恐怖之感，都想遠遠離開政治。這也是促成人民漠視政治的一個原因。可以說，今天的蘇聯人民大眾，無論老少，完全和蘇聯政府所說的他們關心天下國家大事相反，而是走向全不關心的道路。

足立：我們在蘇聯所看到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對待人民大眾的態度，用中國式的語言說，就是工作作風吧，決不是要求人民大眾革命化，和教育他們自己站立起來，而是採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辦法。他們就是要羣衆變成盲目無知者，這樣才容易統治。人民不關心政治，就不會自覺地起來鬧革命。這和中國革命青年們從事祖國建設，想到世界革命，考慮的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我隨便可以舉出蘇聯青年人對政治是怎樣漠不關心的例子。有一次，我到格魯吉亞旅行。遇到一個十八九歲模樣的青年，我們便攀談起來。他見我是一個外國人，就說他對世界政治很感興趣，他說：“日本在兩三年前已經爆發革命了。”這位自稱關心世界政治的青年，竟然會說出這樣幼稚的話來。如果換了個不關心的人，豈不更要鬧出笑話。我問他關於日本的現況，他却什麼也不懂。

我又曾向一個蘇聯少年問：“你能談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麼不同嗎？”這位十五六歲的少年竟木然不能回答。像這類資本主義存在剝削、社會主義沒有剝削的最基本的答案，這個蘇聯少年也說不上來，對於日本人民的鬥爭和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等問題，他們更是無法了解，也不會去注意。

佐久問：我也來舉個例子，我舉的不是蘇聯一般人，

而是共青團裏面担任領導職務的人。

有一次我和他們談天。一個共青團的領導人對我說：“你們老是說日本人民反對在日本的美國基地，日本人民爲此而鬥爭，這是真的嗎？”我回答說：“正是這樣。”他又問：“一直都是這樣的嗎？”我回答說：“一貫就是反對的。”

他接着問：“爲什麼不能把美國趕出去呢？”我向他解釋，因爲有日本反動政府的存在。他又質問我：“日本人民既然反對美國軍事基地，爲什麼日本政府不把那些基地撤消？”我便和他談起日本社會的階級組成，反動政府的階級性和反動性。我說完之後，那位共青團的領導人却說：“你們那裏可以進行民主選舉嘛。人民既然反對，通過選舉把政府推倒不就行了。”

作爲一個共青團的領導者，連階級鬥爭的起碼常識也不懂，看來對他必須從階級鬥爭課的ABC的A字教起。

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興趣

佐久間：在蘇聯青年普遍不問政治的同時，對於西方頹廢的資產階級文化，却處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種傾向非常強烈。

他們如果從哪裏弄到一兩張西方的音樂唱片，明明有唱片袋可以裝進去，他們却不，一定要把唱片套的封面

故意露在外面，招搖過市，引人注目，表示他有外國唱片。

他們如果開唱機，住在樓上的，一定把窗戶盡量打開，把音響放得大大的，好讓左鄰右舍知道他在“欣賞”西方音樂，並引以為榮。（笑聲）他們跳起舞來，不是扭擺舞，就是牛仔舞，以此為時髦。

過去我在日本曾參加過歌唱運動，會唱一些俄羅斯民歌。有一次我和蘇聯青年在一起時，我唱起俄羅斯歌曲，不料無人附和。我感到奇怪，忙問個究竟。那些蘇聯青年回答說：“唱那種沒有意思的古老調子做什麼，我們要聽新歌。”接着他們就唱了起來。所謂新歌，就是那些無意義的時代曲，這些歌曲拿到日本來一樣可以通行。

我穿的西裝褲褲腳是有摺邊的，一個蘇聯姑娘竟指着我的褲腳說：“你們日本人為什麼還穿這種老式的褲子？”（笑聲）好像不效法西方，不穿那種褲腳沒有摺邊的緊身腰的阿飛褲，就不算“時髦”。

不良少年的出現——“游蕩兒”

佐久間：現在蘇聯也出現了終日游蕩的孩子，由於父母參加工作，孩子丟在家裏無人教養，變成小流氓，成為社會問題。在我們看來，還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問題而已。

據我們所知的一個例子：我們大學宿舍的附近有一片森林。夏天每到夜晚甚至過了十二點鐘；還有大羣小流氓在樹林中聚集，有時大吵大鬧，有時發出可怕的尖叫聲。有一晚，兩個印度學生一邊談心一邊步向森林地帶，在黑暗中被一羣小流氓包圍，沒說上幾句話就爭吵起來。一會兒，一個印度同學飛奔跑回學校宿舍，帶領另一批同學到樹林中去，只見另一名印度同學已被小流氓殺害。這件事情就發生在距離我們學校宿舍二三百公尺的地方。

這一事件的發生，它的本身就不只是游蕩孩子造成的問題，而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根本問題。這些小流氓從小就幹壞事，他們之中不少人還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長大後就加入共青團，再大就加入共產黨，如果在這種不關心政治的環境下成長，他們將來會變成什麼樣的人，細想下去不是令人感到可怕嗎？

現在，蘇聯也有大量的“硬殼蟲”出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頹廢、消沉、過一天算一天的思想，正在毒害着蘇聯青年一代。少年犯罪問題，確實成為蘇聯今天重大的社會問題。

“要住房，要汽車，不要老一輩的人”

足立：在日本有一句話：“要住房，要汽車，不要

老一輩的人”，想不到在蘇聯，情形也是這樣。

原田：在蘇聯，一般婦女挑選的“理想對象是：大學畢業，身為黨員，有高級住房，沒有老一輩的人”。

佐久間：有一個在政府機關中工作的年約四十歲左右的蘇聯婦女，在和我談天時問我：“你們日本也有婆媳之間的問題麼？”我說：“當然有的，我也要問問，你們也有這個問題嗎？”她說：“可厲害啦。”這時我又談起日本婦女嫁人的三個條件：“要住房，要汽車，不要老一輩的人”。她聽了後格格大笑，然後說：“我們這裏的閨女的出嫁條件，和你們那邊可說是一模一樣啊。”

新谷：今天蘇聯社會的不斷蛻化變質，除了當局有意識地促成之外，有些是環境影響的結果。例如忽視思想教育和思想鬥爭，特別是青年人一代中，如此醉心於美帝國主義的文化，憧憬資產階級的玩意，就是在不知不覺中任其發展起來的。蘇聯青年對爵士樂和搖擺樂的瘋狂迷戀，也是這樣造成的。我們原先以為，到蘇聯以後可以到處聽到真正的、地道的俄羅斯民歌。結果相反，不但聽不到，而且我們會唱的俄羅斯民歌和蘇聯早期革命歌曲之多，竟使蘇聯人大吃一驚。現在的蘇聯青年人早已不會唱這些歌曲了。他們所唱的都是爵士樂和搖擺樂一類。他們也不像以前蘇聯人講究唱歌藝術，只是一味狂喊大叫。到了這種程度，已經不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所能制止得了的。舞蹈也是一樣。他們嚮往種種美國生

活方式，嚮往西方。這種風氣越來越發展。

例如在我回國的一年前，一首日本時代曲《花生米》在蘇聯非常流行，這首由一對雙胞胎歌手合唱而走紅的日本歌曲，不僅在俄羅斯共和國，在拉脫維亞等共和國也流行，一年不到，在全蘇聯都流行起來了。

有一年夏天，我們民族友好大學的幾十個學生，到一所在海濱舉辦的濱海暑期學校去參觀。一羣從幼稚園到小學低年級的學生出來歡迎我們，並且唱歌表示友好接待。這羣天真的孩子，唱的竟是那首日本時代曲《花生米》，而且反覆唱那歌詞中“愛情的假期”的一段。（笑聲）他們看到我是日本人，就再三要求我用原文唱給他們聽。我對他們說：“這不是在衆人面前唱的歌。這是受美帝國主義頹廢、墮落文化影響最深的東西。日本的正派青年也不唱這種東西。”我的這番話，竟使他們感到詫異。

兒童唱歌這類小事可能會被忽視，但是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首先總是要製造輿論，要搞意識形態的工作。在蘇聯，資產階級的文化藝術已經在社會上無孔不入，正在腐蝕着人民的思想。特別是年青一代思想被腐蝕，是社會變質的第一步。我曾經和蘇聯共青團的中央委員們面談，我常常問他們：“你們對於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究竟採取什麼對策？”他們對這個問題，可說是完全不懂，所以無法回答，大概是没有想過這個問

題。

佐久間：有的蘇聯領導人這樣說：“好的就是好的，不管是美國的還是哪國的，好的都可以吸收。”這是一次我們學校組織旅行團到一個加盟共和國首都訪問時，一個共青團組織的書記說的。這個旅行團不僅有日本學生，也有其他外國學生，我們大家都向他提出：“青年人跳扭擺舞，你認為是好的還是不好的？你們怎樣對待這個問題，怎樣去指導青年？”不料他竟反問我們：“你們為什麼要提這樣的問題，我們吸收好的東西難道不好嗎？”反而使我們好幾次都無言以對了。

修正主義從思想和文化的變化開始 西方廣播自由開放，却不准聽北京廣播

原田：回顧在蘇聯五年來的生活，使人痛感到：究竟是從哪裏打開了使蘇聯變成修正主義的缺口，又發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呢？首先仍然是文化、藝術和意識形態這些方面。

例如，我們到蘇聯之前，美國爵士音樂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在全蘇聯泛濫。當時爵士音樂已經流入，但只是一些青年人圍在一起，聽聽唱片，跳跳舞。我們在蘇聯這幾年來，却目擊爵士音樂、扭擺舞等勢如洪水，毫無控制地在全蘇蔓延開來。

蘇聯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個“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每年都舉行爵士音樂演奏會。在黑海沿岸一個叫索契的城市，每年夏天都舉行有東歐國家參加的爵士音樂和狂歡舞會。從這裏被選出來的樂手或舞蹈冠軍，常常被派到美國和法國去。這樣，在政府熱烈提倡下，爵士音樂自然就更快的流行起來了。

在這以前，蘇聯政府對西方國家的廣播是限制收聽的，例如“自由柏林”、“美國之音”、倫敦“BBC”電台的俄語廣播節目，都不能隨便收聽的。可是從我們到了那裏以後，就對西方廣播採取了完全放任態度。相反，對於北京廣播，却採取發射出干擾訊號等等的極其嚴厲的限制措施。最近，在莫斯科已經完全不能收聽北京的俄語節目了。由於收聽西方廣播不再受限制，來自西歐和“美國之音”的爵士樂、搖擺樂，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斷地在蘇聯天空泛濫。

佐久間：講到廣播，今天的“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兩個電台的世界收聽率，恐怕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為最高。收聽的人說是要聽聽這些電台的爵士音樂，實際上不過是遁詞，他們也收聽這兩個電台的政治宣傳節目。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陣營如此猖狂的文化侵略，蘇聯政府却完全處於不設防的狀態，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就這樣被葬送了。

“同志”這個稱呼正在消失

佐久間：還有，在我們回國之前，蘇聯出現了一個新的話題，就是連我們也一向很熟悉的“托瓦利什（同志）”的稱呼，正在消失。《文學報》上刊出的一個作家的倡議認為“托瓦利什”這個字眼是個陳舊的、不文雅的稱呼，應該停止使用。他主張在蘇聯人中間提倡使用高尚文雅式的稱呼，例如用一些古代的詞語，像西班牙語中的“塞尼約爾”（SENOR，西班牙上流社會使用的字眼，意即先生）、“塞尼約里達”（SENORITA，西班牙語，對女士、小姐的尊稱），代替目前的“托瓦利什”。如果不用這兩個西班牙字，也可以用俄國貴族使用的古老的詞語“蘇一達利”或“蘇達魯尼亞”代替（意即老爺或太太）。

這一問題正在人們議論之中，看情形，“托瓦利什”這個稱呼十分可能將在十月革命的國家中消失。

原田：談到青年人不關心政治這點，例如莫斯科大學，是蘇聯高級知識分子的巢穴，學生差不多全部是蘇聯人。莫斯科大學的政治經濟問題討論會，許多人都拒絕參加，或者參加了而不發表自己的意見。最近西方資產階級報紙也有報道，蘇聯是今天世界上唯一沒有學生運動的國家。蘇聯青年也看報，問他們為什麼看報，他

們說：“有人問起時，如果不知道一點蘇聯政府的說法，那就很難爲情。”他們看報，不是爲自己解決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是政府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所以，他們不出席政治集會的第一部分，因爲那些發言，無非是重複政府、黨或機關報上發表的言論，參加了也是白搭。可是集會到了第二部分——餘興節目部分，他們參加了，又看電影又跳舞，氣氛爲之一變，和第一部分的參加者寥寥無幾的情形，適成強烈的對照。

自卑感與優越感

足立：羨慕、崇拜美國和西歐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已經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有蘇聯最高領導人在這方面事事帶頭，上行下效，理所當然。赫魯曉夫穿的衣服，就是特地到英國定製的，這和中國的領導人一貫穿人民裝相比，也就清楚地表明了這兩個國家所走的不同方向。

例如，我們在莫斯科“紅場”就碰到一些奇特的事情。“紅場”是蘇維埃革命的聖地，直到幾年以前，到蘇聯的人都想到那裏去一下，那裏有列寧的陵墓，凡是到紅場的人，心情應該是嚴肅的。但是，今天的紅場，已經沒有莊嚴肅穆的氣氛了。我們到紅場去參觀時，就看到許多栽着假睫毛，塗上藍眼圈，臉上塗着厚厚脂粉的

蘇聯女人。她們見到外國人，就施施然走近來問：“有沒有日本半導體收音機？”“帶着美鈔嗎？”我告訴她們：“什麼都沒有！”誰知她們竟指着我穿的日本西裝說：“就這個，你賣給我們吧！”

這些行爲表明：在蘇聯人心目中，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什麼都是好的，文化當然也是西方的好。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政治鬥爭的觀念。階級鬥爭的念頭更是烟消雲散了。在我們看來：自己成了國家的主人，並且正在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向着共產主義邁進，該是多麼值得驕傲的事情。只要有一點點這種想法，就不可能羨慕別人穿的西裝，更不會千方百計想要一架外國半導體收音機。也只有喪失了對建設自己祖國的熱情的人，才會覺得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都是好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蘇聯人一開口；就說什麼都是蘇聯的好。這個是世界第一，那個也是世界第一。如果按照他們說的，第一架飛機是俄國人發明的，無線電也是他們首先發明的。環遊世界一周，也是他們首先做出來的。但是在這種狂妄優越感的背面，卻又暴露出這麼一副卑躬屈節的態度。這可能是在他們的性格中，優越感與自卑感和平共處，而這兩重性格又不斷地交替表現出來。

“紅場”上的妓女

佐久間：紅場周圍的奇特事情，可以舉出數不完的例子。我在紅場就碰到過日本戰後初期的那種“梆梆女郎”（妓女）。有一次我陪兩個日本遊客在紅場附近散步。遊客的樣子一望而知，特別是日本遊客少不了兩樣東西：照相機和眼鏡（笑聲）。那些女郎見到我們後，就從紅場上跟着，我們在克里姆林宮裏參觀完畢後，再度回到紅場中間，最後進入國營百貨公司，她們仍在尾隨着，當我們一回頭時，一個女郎用英語向我們搭訕着問：“你們住在哪個旅館？”我一看那些女郎的化妝就明白了一切，那些女郎的模樣和戰後初期日本的妓女完全一樣，我立刻用俄語說：“你們不必用英語講話，用俄語說吧。”我的話剛出口，她們面露驚悸之色，匆匆逃走。她們原以為日本遊客多數是說英語的，我的俄語一出，她們知道路數不對，吃驚地逃走了。

一看電影就明白社會真相

有遊客自日本來時，我總是勸他想辦法去看一場電影，就是言語不懂也不要緊，看看俄國人平時看些什麼電影，也就能够有助於了解蘇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至少我感到今天蘇聯上映的影片，大部分是描寫間諜、強盜、庸庸碌碌的小職員或頹廢悲觀的人之類。法國的阿飛、黑社會打鬥片在蘇聯上映得最多，好萊塢的喜劇片，南斯拉夫和西德合作拍攝的美式西部片等，都在蘇聯大大流行。觀眾看了這些影片，被資本主義思想腐蝕是必然的。我們在蘇聯五年多，還沒有看到過一部優秀的革命影片，充其量只是很早以前拍攝的早年的影片。所以說，從放映的影片，就可以了解到現實情況。如果按照原定的遊覽日程，是不能了解這些情況的，只有深入社會觀察，才能一目了然。

帳篷裏發生的料想不到的事

佐久間：還有很多料想不到的事，剝開表皮就露出了真相。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有四十多年，從形式上看，它的成就至今仍然存在。官本修正主義集團的《赤旗報》原封不動地大力宣傳這些東西。例如，某工廠的共青團組織，夏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就用工廠的汽車載運大批帳幕，到森林去野營。把這種照片刊登出來加以宣傳。日本的青年工人看到以後，感到每星期都能到野外去露營實在是太棒了，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好哇。可是，到那個工廠去實習的日本留學生，被邀請參加野外露營回來之後，却氣得滿臉通紅。問他為什麼這樣，他說：“所謂

野外露營生活就是唱那些無聊的歌，跳那些下流的舞。如果到此爲止，倒也罷了。可是，到了深夜，這些男女就一對對步入叢林深處，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在帳幕中，那些人直胡鬧到天亮才回來。第二天整個白天就在帳幕中蒙頭大睡，到了晚上，整理整理帳篷再回工廠，這就是共青團主辦的、每週讓團員過着的有組織的生活。”如果說，你只聽了前半半話，那當然你就要說，“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好哇！”可是你聽了後半半話，那你就會問，“這到底是哪個國家呀？”（笑聲）像這類剝開表皮就露出真相的事情，要說起來真是多得很。

剝開皮來看

新谷：最近一個時期，日本到蘇聯的遊客特別多起來了。這一來，凡是日本遊客常住的旅館、港口、車站和風景勝地，總是圍聚着大批想買日本商品的人。他們看起來都很年青，絡繹不絕地向日本遊客糾纏，要買這個要買那個。還有不少小孩子則伸着手圍着日本遊客說：“給我一片口香糖！”“給我一支鋼筆！”看到這種情形，使人想到蘇聯青年已把對於社會主義的熱情和自豪，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最近日本大企業陸續在蘇聯設立分公司和商行，並在莫斯科索科爾尼基公園，舉行了多次日本商品展覽。

日本是個進行廣告宣傳的國家，商行對每一位入場者都贈送一個印有許多日本商品廣告的塑料袋，不料許多入場者竟爲了一個薄薄的塑料袋互相爭奪起來。一些在蘇聯的日本商人也嘆息說：“太淺薄了，太不要臉了！”

在旅店或其他場合，小費給得多，服務態度馬上轉變，不先給小費，他們就聳聳肩，表示“愛莫能助”。總之，從上層領導集團起，整個蘇聯社會是越來越走向腐敗、墮落和變質了。

正經人被認爲是笨蛋， 貪污腐蝕着整個社會

由於蘇聯社會的不斷腐敗、墮落和變質，正經人就會被人譏笑爲笨蛋，甚至被認爲是神經病。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從下層到上級，層層官員都各幹各的壞事，越是爬到上層，壞事幹得越多。最爲普遍的就是貪污瀆職。這樣發展下去，蘇聯的經濟機構、社會機構就會無不被腐蝕而霉爛，這一類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

貪污發展到不止個別的人，而是集體地、有組織地進行，有不少企業從門房到最高的領導層，人人貪污。

例如我從蘇聯回國時，有些行李需要處理，一部分行李交由國際郵政局托運。我把行李拿到國際郵政局，一個司磅的人故意少算我的行李重量。他告訴我可以

省二十個盧布，我便給他十個盧布作為報酬。這種事情在社會上已司空見慣，人們毫不以為怪。這還是屬於最起碼的找“外快”，越往上層領導，貪污的規模也就越大。這樣的腐敗、墮落，在今天的蘇聯整個社會中，是普遍地存在着的。這樣下去，列寧所創造的，斯大林所撫育的這個社會主義的蘇聯，就將被這些人完全盜空了。

官僚主義壓制創造性

新谷：在蘇聯，每年最大的節日是五一勞動節和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節。在民族友好大學的日本學生雖然不過八十人，但是經常提出一些有關慶祝方式的創造性建議。如針對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提出不同的標語口號，使每年舉行的慶祝活動有所不同。但是，這種創造性的建議或行動，在蘇聯是絕對行不通的。日本學生提出一些創造性的慶祝口號，每次都要遭到蘇聯當局的非難。標語口號一字一句全部要事前檢查。最省事的辦法，當然是按照蘇聯當局所交代的去做，或者拿着官方製好的標語口號參加游行。

足立：反正就是一個“和平”，一個“友好”，超出這一範圍就不行了。

新谷：對，如果只是這些，就不會有問題；但要是提出一些適應當地革命鬥爭的口號，就必須經過一番激

烈的鬥爭。

原田：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六七年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特大紀念的日子，過去，日本學生在蘇聯參加節日游行，只許打日本學生會的那面紅旗。可是，這次五十周年的游行，蘇聯官員竟告訴我們連那面紅旗也不准打，要去就得把旗子卸下來。我們說：“既然你們不准帶紅旗，那我們就只好帶旗桿去了。”

我們真的帶着旗桿去了，可是蘇聯官員一見到我們，又說旗桿也不准帶。我們說：“你們現在又說不能帶旗桿，可教我們怎麼辦呢？”他說：“那你們就回去吧！”我們說：“我們已經來了，你們又叫我們回去。不管怎樣，不管你現在怎麼說，我們不用旗桿，就用雙手高舉紅旗行進好了。”我們一邊說，一邊走進紅場，結果我們只用手撐着日本學生會的那面紅旗參加了游行。

在此之前，我們製作了許多創造性的標語口號，却全部被禁止使用了。

佐久間：蘇聯官員說：“因為今年是五十周年，多餘的東西統統不許搞！”（笑聲）這就是他們的理由。他們又說：“五十周年是大慶日子，全國都在慶祝，你們那些骯髒的標語口號，千萬不可拿到游行隊伍中。”這一年的慶祝，全部由當局規定，連顏色也講究統一。因為今年的顏色是什麼，是表示今年的政治基調的，隨便搞一種顏色是不行的。

但是我們的標語口號是照日本的方式，分別由每個人自己寫了以後帶去的，而莫斯科的區委會却硬說那些是骯髒的東西，不准拿着游行，不准讓人看見。我們說：“那我們就搞一些不骯髒的吧。”就要求學校當局提供材料，製作了一些講究的標語。有的標語上用俄文和日文寫着“打倒佐藤內閣！”我們舉着標語前赴大會時，途中一位蘇聯官員飛跑過來說：“拿着這幅標語，不許参加游行！”似乎是在說：我們和佐藤政府建立了牢牢固實的外交關係！（笑聲）

十月革命紀念節日，居然禁止提日本人民打倒本國反動政府的口號，當場就有許多同學不服。我們據理力爭說：“我們不能捨棄這幅標語！”那蘇聯官員說：“不捨棄就不准游行。”這時，已經有數名大漢前來，把拿着標語的幾位同學連同標語一起帶走，到人們看不見的街角，強行將標語撕毀。

在莫斯科，今天已經不能喊出“打倒佐藤內閣”的口號，更不許進行反佐藤的示威了。

原田：因為蘇聯領導人要討好日本壟斷資本，蘇聯政府已數次向佐藤發出邀請他訪問蘇聯的請帖。所以，不能刺激佐藤政府就成了藉口了。現在，蘇聯政府和日本反動政府大講和平友好，僅從這一點來看，已足以顯示蘇聯領導人不知天下有羞恥事了。

不能唱革命歌曲的“五一”節前夕

新谷：“五一”和十月革命節前夕，總是要舉行預祝集會的。由於參加者來自各地，都準備有自己的節目。日本學生一般是表演三支歌：一支是用日語唱的日本革命歌曲，一支是用俄語唱的老革命歌曲，還有一支是日本現代民謠或日本人民鬥爭的歌曲。總之，無論是用俄語唱的革命歌曲，還是用日語唱的日本革命歌曲，在節目前夕唱革命歌曲，日本學生成了唯一的例外，因為在這種場合已經不唱這種歌曲了。

當我們要唱那兩支革命歌曲時，蘇聯人員總是以時間不多了，唱一支民謠就夠了為藉口，不讓我們唱革命歌曲。

“五一”這一天，同學們清早五六點鐘就得起床準備參加游行。學校當局為了催同學們起床，一大清早起就播放爵士音樂。爵士音樂竟成了起床號，真是不可思議。

佐久間：在學校裏舉行節目前夕祝賀時，樂聲喧天，吵鬧不絕，全是些搖擺樂、扭擺舞音樂。有時想唱一唱《國際歌》，可是混雜在這種烏七八糟的氣氛中，是多麼地不倫不類啊！

原田：工廠工人的游行隊伍中的吹奏樂隊演奏的也是這一類曲調。一面滴哩哩滴哩哩地奏着“愛情的假期”

之類的曲調，一面游行。我還想起一九六六年民族友好大學舉行的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當時是在克里姆林宮裏面的大會堂舉行的。日本學生組織了合唱團準備演出。合唱人員早在考試期間，不管功課怎樣忙碌，就都盡量抽出時間練習。出場時照例是準備唱三種歌曲，其中一支是俄語老革命歌曲《紅旗頌》，但是在上場演出之前，蘇聯當局硬是不許我們唱這支革命歌曲。我們問他們理由，他們說這一天的畢業典禮和文娛節目實況，要通過電視向蘇聯和歐洲廣播，唱革命歌曲很不適合。我們聽了很是氣憤，結果只唱了日本歌曲。

新谷：正是因為蘇聯當局的諸多干涉，許多有革命意義的、有創造性的新事物，一概遭到扼殺。任何集會或活動，人們只要是不按照官方交下來的或官方批准的做法去做，如果是按照羣衆自己的創造，特別是牽涉到革命的事物，就必須進行殊死的鬥爭。作為外國人，一旦被蘇聯當局懷疑或不歡迎，還不致於立刻威脅到生活；但是，如果是一個蘇聯人被目為異己的話，那就要大禍臨頭，就會被迫害得走投無路。所以，人們的那種逃避政治和對政治的漠不關心，那種失掉了熱情和自豪感的原因，恐怕就是來自於這種制度吧。

佐久間：對於我們現在談的這些蘇聯見聞，或許有人會說：“你們因為對蘇修痛恨，所以說話時感情用事，只揀人家壞的講。”其實，在莫斯科的日本人，包括社

會黨的人，甚至是“日本之聲”（指投靠蘇修的前日共機會主義者志賀義雄一派——譯者）的人，每天飲茶、吃飯時，都在談論蘇聯這些腐化、墮落的現象。其他外國學生，每天也都以這些為話題。我們說的這些，只不過是把每日的見聞照原樣如實地說出來罷了。絕對沒有誇大。

足立：有時說話太老實，人家反而會說不相信哩。
（笑聲）

黨和人民的關係

新谷：在蘇聯，目前是蘇聯共產黨一黨專政，這是蘇聯憲法上規定的。這個制度自從革命以來，已實施了五十年了。關於蘇聯共產黨和人民大眾的關係，先不必從理論上去談，不妨從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來談。即究竟蘇聯的人民大眾對黨的看法怎樣？蘇聯共產黨員是怎樣對待人民大眾的？黨和人民的關係怎樣？

在蘇聯的大學裏，稍微功課好一點的學生，在畢業以前幾乎都入了黨。

足立：總之，所謂“優等生”都能入黨。

入黨是穩定社會地位的保證

新谷：日本過去有高等文官考試、外交官考試，許

多人多年苦讀，一朝考取之後，就取得了學而優則仕的資格。今天的蘇聯，則以入黨為取得社會地位的保證。當然，今天在蘇聯入黨比日本的文官考試要容易得多了。但是不入黨就不能夠在社會上爬上去。功課優良的學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場如何，都可以入黨。一個人在大學畢業，也就同時成為黨員。入黨，對蘇聯人來說，是一個人一生取得高職優薪、生活富裕和更高地位的不可少的一項保證條件。學生只要在學校分數高，就能入黨。在蘇聯社會，黨員意味着“優秀人物”，他們高人一等，處處表現出自我優越感。

只要人民服從的黨的領導

現在可以看看蘇聯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在蘇黨看來，所謂人民，就是接受黨的領導的工具。這種領導是單方面的。黨發號施令，人民只能服從，已經成了公式。人民決不准批評黨的不是。如果人民批評了黨，馬上就會遭到迫害。蘇聯的黨決不是毛澤東思想所指出的“人民——黨——人民”這個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原則，而只是“黨——人民”這個公式。人民必須承認黨的絕對權威，並只能服從它。它完全否定了黨是革命的工具，是為人民服務的觀點。蘇黨早已忘記了“人民——黨——人民”這個公式，只能由黨的領導人指揮人

民羣衆，由所謂“優秀人物”指揮“不優秀的人”，結果變成了法西斯主義。

蘇聯現在實施各式各樣的經濟制度改革，使“有能力的人”的薪水越來越高，工資差距越來越大。高踞在人民頭上的蘇黨高級黨員的所作所爲，無不爲了保持自己階層的利益，而提出一個接一個的政策。

忘掉了“爲人民服務”和 “羣衆路線”的觀點

原田：爲人民服務的觀點，羣衆路線的觀點，對蘇黨來說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蘇黨所要維護的，就是現在這套絕對主義的統治。層層領導人只圖一己的私利私欲，他們的腐化墮落是必然的，這也就必然地引起蘇聯社會的全面變質。

新特權階層的形成和黨的變質

足立：蘇聯共產黨開始變質的重要關鍵之一，是入黨以後就能取得特權。按照列寧建黨的原則，一個黨員絕對不應該比一般非黨勞動者取得更多的工資。但是今天的蘇共黨員的收入，遠比一般人多得多。因爲當了黨員，地位就升的快。例如在工廠裏，黨員當了廠長、車

間主任，就可拿到比一般工人多得不知多少的工資。有能力的人，不管腦袋裏的思想如何，只要當了黨員又有了地位，就能領取高的工資。所以，普通人就拚命想成爲黨員。青年學生也把入黨作爲他們拚命爭取的目標，努力自我修養。可是，他們心目中實際上想的却是入黨就有了一切。根本沒有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可是從表面上看却是很老實的，也挑不出一點不是的人。這種黨和西方國家的政黨又有什麼兩樣？

喪失了黨的領導作用

——屈服於“和平的敵人”美帝國主義

足立：今天的蘇黨已經失去了作爲黨的領導作用，這在赫魯曉夫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觀點中已暴露無遺。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重大的損害。具體地說，人民的傷亡達二千萬人，物質財產的損害相當於其他歐洲國家所受戰爭損害的總和。斯大林格勒幾乎全城被毀滅。二十年慘淡經營的革命成就，幾乎全部報銷。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人民大眾希望和平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日本在第二次大戰後，人民的感情也是強烈地渴望和平。

但是赫魯曉夫却利用這一點，選擇了和美帝妥協的道路。對這個問題，如果蘇共是真正發揮領導人民羣衆

的作用的話，就應該向人民明確指出誰是和平的敵人，指出一條真正的爭取和平的道路；就應該徹底地揭露和平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只有領導人民和美帝堅決鬥爭，才能防止另一次侵略戰爭。

但是蘇黨不是這樣，他們一味強調再打一次戰爭就要蒙受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無論如何都要避免戰爭。蘇黨利用人民對和平的善良願望，掩蓋它向美帝投降的實質。這是一個典型的說明蘇黨從根本上喪失作為黨的領導作用的事例。

失去了對黨的信任

佐久間：現在談到的問題，實際上包含着好幾個方面，如黨的問題、羣衆路綫的問題、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等等。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大眾對蘇黨的信任越來越下降，特別是最近，可以說在各方面都再也清楚不過地表露出來了。例如，向蘇聯工人問到“你是黨員嗎？”很多人會這樣答覆：“我為什麼要入那個什麼黨？我不想和那班人攪在一起，不入黨不是更好？”（笑聲）最近在蘇聯一般人中，採取這種對蘇黨蔑視的態度的，出乎意料地多起來了。

原田：有些蘇聯人還說，入了黨，開會就多，拿這個時間賺點盧布豈不更好？為什麼一定要入黨？

佐久間：還有，一般蘇聯人對黨員們神氣活現，只愛吹牛、不肯做事的惡劣作風，十分反感。他們痛感黨的領導人已變成大大小小的官僚，對蘇黨的憎恨更加深刻了。

俄語中沒有“羣衆路綫”這個詞

佐久間：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蘇黨不走羣衆路綫，也根本沒有羣衆路綫。說明這個問題的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俄語中沒有“羣衆路綫”這個詞。我曾經問過一些懂日語的蘇聯人：“羣衆路綫該怎樣譯法最好？”如果根據中國發表的俄文文件，那很簡單，羣衆路綫就是“利尼亞一馬斯”，但是那些蘇聯人還是不懂，他們說：“沒有聽過這個名詞”或“沒有那種說法”。我問他們究竟應該怎樣翻譯，他們支支吾吾，半晌說不出來，原因是他們不懂這個詞的內容，從來也沒有想到過羣衆路綫。我還是追問他們：“究竟羣衆路綫應該怎樣解釋？”他們在各種各樣的說明中，始終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其中一個解釋說：“就是站在羣衆的立場，爲羣衆辦事……”“是嗎，那同林肯的想法是相同的。”（笑聲）

這件事情清楚地說明了蘇黨根本就不實行羣衆路綫，他們心目中也沒有羣衆。

黨員的條件——不論思想好壞， “有能力的人”就行

新谷：在蘇聯，吸收黨員，只側重個人能力和努力讀書、努力工作的人。這和日本通過國家考試來吸收那些拚命用功讀書、旨在向上爬和做官的學生，本質上是一樣的。脫離思想、脫離政治去觀察一個人，就看不到他的短處。一個人，只是爲了自己而入黨，只是爲了自己飛黃騰達，有高的地位，有好的生活而入黨。日本過去和現在的高級官僚，就是這樣往上爬的。抱着這樣目的的人，心中不可能有革命和爲大眾服務的觀點。假如一個黨由這樣的人組成，他們又處在執政地位，這個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是可想而知的。當然，我並不是說，蘇聯共產黨員都是壞的，都是修正主義者和搞資本主義復辟的人。

蘇聯的黨，誰都知道是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黨，黨內的確也有優秀的黨員。但嚴重的是蘇共的黨已經變了質，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對這一點，是我在這次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才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的。

原田：舉例來說，有些工人由於認真勞動，做出了別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他們成了“勞動英雄”，接着再有兩、三次就成了黨員，有些且成爲最高蘇維埃代表。現在蘇聯一般的就是這樣做的。

足立：例如蘇聯滑冰運動員斯科布利科娃，在世界滑冰比賽中取得了三個項目的冠軍後，立即打電話給赫魯曉夫，你猜她說什麼？她對赫魯曉夫說：“我要成為共產黨員！”一個滑冰運動員得到冠軍以後，馬上就有本錢入黨。這樣的人，是否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黨員，則根本不理會了。

佐久間：從這點看，日本的大鵬（摔跤冠軍）馬上應該成為黨員了。（笑聲）

足立：如果說某一個人得了一個全國冠軍或世界冠軍的頭銜，就立刻可以入黨，這種做法顯然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員如果都是這樣的人，也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但是蘇聯共產黨入黨的標準，就是完全抽去了一個人的思想認識和政治立場。這樣的人入黨之後，慢慢成了黨的領導者，從長遠來看，必然把黨引導到錯誤的方向。就像現在這樣，無產階級專政也就變質，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變成了法西斯主義。

能動地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赫魯曉夫下台時，蘇聯報紙上的報道，只說是由於年齡大和健康上的原因。這個解釋在外國人看來，誰也不會認為滿意。我們曾和學校裏教授俄語的教師辯論這個問題。我們問他：“赫魯曉夫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而突然去

職？”他說：“蘇共中央不是發表了公報嗎？我認爲那就是理由。”他又說：“赫魯曉夫除了年老和健康原因以外，不會有其他的理由去職。”

佐久間：“這和宮本集團常說的：‘只要是黨中央說的，都是正確的’的論調完全一樣。”（笑聲）

原田：記得在赫魯曉夫下台的第二天，我們正在上政治經濟學課程。當時號外出來了，許多外國學生都爭着出去買報紙，課室裏的人幾乎都走光，課也上不成了。但是蘇聯學生怎麼樣呢？他們只是東張西望。大家談起這個問題來時，他們則一味說：“當然是健康上的理由”、“這絕對沒有錯”。兩三天之後，國外的消息傳入了蘇聯，事實證明赫魯曉夫的下台，絕對不是什麼健康和年老的問題。我們再問蘇聯同學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時，他們只是回答說：“我們不知道！”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出，蘇聯青年不僅不關心政治問題，就是對本國的黨和國家的事情也冷淡到如此程度。無論你問他們什麼，他們都是這麼回答：“不知道！”

新谷：任何一個強大的黨，如果失去了爲人民服務的觀點，採取拒絕羣衆的批評和進行自我批評的態度，就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呢？蘇聯今天的現實，就是一個具體的答案。特別是在取得政權以後，黨的問題更是重要。它關係到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蘇共在第二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推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認為蘇聯已經沒有敵對的階級，階級鬥爭已經結束，這就是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取消了階級鬥爭。可以說，這是使蘇聯從社會主義演變到資本主義的決定性的歷史事件。

思想領域的鬥爭的重要性

新谷：前面談到了蘇聯青年的思想意識情況。更值得談的是和這個問題有關聯的思想領域鬥爭的問題，這是個重要問題。在蘇聯，地主和資本家是看不到了，但是階級鬥爭絕對沒有完結。看到蘇聯實際生活的情况，確能使人重新認識到思想領域的鬥爭的重要性。從外表上看來是一些“優秀的”、居於核心領導地位的黨員，他們實際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許多人不容易看透蘇聯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變質，主要原因就在於沒有看透這伙掌握了黨的權力的核心領導人物。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思想領域的鬥爭是不行的。現在，中國正在進行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清楚地說明了思想領域的鬥爭的重要性。這場大革命集中了人類的最高智慧，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人民民主

新谷：談到思想領域鬥爭的問題，就必然接觸到人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內部的民主，無論在其深度或廣度上，都是和資產階級民主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的。人民民主對推動思想鬥爭是絕不可少的，它必須是真正生氣勃勃的，真正能够激起羣衆革命熱情的民主。但是在今天的蘇聯，人民民主已經喪失了。例如對赫魯曉夫的下台，蘇聯人一句話也不說，也不提出疑問，好像是說不出話來了。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幹了那些事情的赫魯曉夫，到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未開之前就下台了。可是，勃列日涅夫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甚至連赫魯曉夫的名字都未提到。這個曾經是蘇共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的赫魯曉夫，就這樣由於“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而下台了。與赫魯曉夫下台同時，以他的女婿阿朱別伊爲首，凡是和赫魯曉夫關係密切的許多黨的領導人，也都以“工作上的過失”爲理由，同樣被免職了。試想，誰能相信赫魯曉夫是因爲“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而下台的呢？但是，在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上隻字未提這個問題，無論這裏面是愚弄還是蒙騙，也沒有人提出質問。一般蘇聯人對此則更漠然處之，視爲常識上的當然事情。僅此一點，也能說

明蘇聯社會的變質已經到了什麼程度。由於民主權利喪失了，蘇聯人民不能討論赫魯曉夫為何失敗，它的原因何在，它的思想根源是什麼等等問題。這正是蘇聯的大悲劇。

不進行自我批評，不查明思想根源， 不組織羣衆討論

佐久間：不進行自我批評，不查明思想根源，不組織羣衆討論——這就是問題的本質。總之，蘇共從赫魯曉夫以來，就沒有作過自我批評。他們把蘇聯的任何壞事，歸咎於一個原因，即指責以前的領導者，但是又不公佈錯誤發生的原因，更絲毫不談及發生錯誤的思想根源。

在蘇聯，有一個時期，把全部的壞事，都說成是由於斯大林的錯誤。有一部名為《晴朗的天空》的影片，一談到斯大林的死時，畫面為之一變，黑壓壓的滿天烏雲，只有遠處出現了一角晴空。他們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說成一片漆黑，斯大林一死，一切都好轉了。但是，這回赫魯曉夫下台，新的繼承者又把錯誤推在赫魯曉夫身上，這不過是轉移羣衆對執政者的不滿而已。他們從不揭露錯誤的思想根源，也不在羣衆之中展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我在蘇聯五年期間，從沒有看過蘇聯領導人

徹底地從思想上追尋問題的根源，而是完全相反，絕口不談思想鬥爭。

足立：事實上是蘇聯當局不能這樣做，也不敢這樣做。

否認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佐久間：另一個是階級鬥爭問題。照蘇聯領導人的說法，現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已進入最後的完成階段，開始步入共產主義的建設，因而階級鬥爭已不存在。他們說，只有資本主義國家才存在着敵對的階級矛盾，在蘇聯則是沒有的。其實，如果這樣下去，他們不僅不懂得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連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也不會懂。

我隨便舉出一個例子：在我畢業時，一位和我很親近、懷着善意的蘇聯人對我惜別說：“你回到日本之後，想必可以在政府機關中獲得一個待遇優厚的高級職位了。”我當時對他說：“不可能的，我們從蘇聯回去後，日本政府和壟斷企業是不會僱用我們的。”

我這句話說出後，他竟然發怒了。我問他為什麼發怒，他說：“難道日本還不了解我們蘇聯的教育水平嗎？”他居然以為日本政府和大企業不僱用留蘇學生，是由於看不起蘇聯的教育水平。他完全不懂得日本社會的階級

矛盾。在日本，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優秀人物，只要你有革命的思想，就會被貼上“紅色”的標籤，不要說不會聘請你就職，就連已有的飯碗也會不保。何況是在被他們認為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受教育而回國的人，日本的壟斷資本和反動派更是不會僱用的了。我無論怎樣對他說明，日本是在進行着極其激烈的階級鬥爭，他還是不明白。

學校當局對日本的想法， 反對日本駐蘇大使來校事件

佐久間：當日本政府和南朝鮮舉行“日韓會談”時，我們在莫斯科的學生，爲了聲援正在鬥爭的日本人民，在學校內張貼反對“日韓會談”的標語，舉辦了有關的展覽會。我們書寫的標語有“打倒佐藤內閣！”“粉碎‘日韓條約’！”等，這些口號是用俄文寫的，張貼在學校中。

荒謬的是，這時學校當局竟邀請日本駐莫斯科大使到學校來和學生舉行座談。日本大使是日本反動政權的走卒，我們和他從來沒有關係。既然大學當局邀請他來了，我們倒要當面向他抗議“日韓條約”。我們將這個意見通知學校當局時，學校方面立即對我們說：邀請日本大使到學校來，完全是爲了民族友好大學的畢業資格還未被日本政府承認這個問題。請代表日本政府的大使到

學校來，第一是要他參觀一下學校的設備和教學，讓他了解這所大學的教育水平，希望日本政府能承認這個大學的畢業資格；第二，我們委托這個大使，希望他對本校即將畢業回國的日本學生，在就業問題上給予多方關照。我們聽了學校的解釋，簡直要笑出來，校長的“心意”，我們十分了解。可是我們的前途問題，牽涉到階級鬥爭的本質。這一點，我們的校長可說是完全不懂。但是，校方強調已請了日本駐蘇大使來校參觀，就下令我們把那些揭露“日韓會談”反動本質、介紹日本人民反對“日韓會談”的展覽會和標語，統統取消。

我們堅決拒絕除下那些標語，拒絕收起展覽會的展品。結果，在日本大使到校的前一天夜晚，校方竟出動共青團人員多人，將全部展品收了起來。這一來，日本學生幾乎全體動員，當天就到校長辦公室外示威抗議，要求大學當局立即發還展覽品。由於這次激烈的示威，日本大使不敢來了。為此，學校當局竟將日本學生會負責人召去，提出了嚴重警告，並下令給予“嚴厲約束行為”的行政處分。日本學生立即舉行了學生大會，反對校方的處分。爲了這件事，日本學生和校方進行了多次交涉。從這件事例可以證明，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消滅了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國家才有階級鬥爭的說法，實際上是表明他們的領導人根本就不懂得階級矛盾。他們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沒有階級鬥爭的謬論，已經

造成了重大的流毒，邀請日本大使到學校訪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足立：這位校長，在蘇聯來說，也算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同時也是黨的領導人。他使人感到是一位真正的老好人。他雖然有大學校長的頭銜，但只要是不涉及政治，可說是一個非常容易接近的人。然而，一旦臨到他以公務的校長身份來同我們在政治問題上打交道的時候，那我們真感到實在是太差勁了。因為他是脫離開階級觀點來考慮問題的。蘇聯人，特別是普通勞動者，一般的都較直爽、樸素。可是那種直爽、樸素如果脫離開階級性，不就跟資本主義國家中那種叫作老好人的人沒有什麼兩樣了嗎！

政治笑話

什麼“真理”，我們這兒沒有

在莫斯科的街角上，有零售報紙的小鋪子。一個男人走過來問：

“有《真理》嗎？”

小鋪子的老太婆說：

“什麼‘真理’，我們這兒沒有。我們這兒只有‘消息’。”

爲了社會主義

威爾遜、約翰遜、勃列日涅夫、諾沃提尼同乘一架飛機。但是，這架飛機在中途發生了故障，所以把重的行李都投下去了。儘管這樣，還有危險。這時，首先是威爾遜喊了一聲，“爲女王陛下”，就跳下去了。緊接着，約翰遜也喊了一聲，“爲了自由和繁榮”，也跳下去了。

這樣，最後，勃列日涅夫看了一眼，也喊了一聲：“爲了社會主義大家庭！”就把諾沃提尼推下去了。

三、蘇聯的對外政策——援助越南 和敵視中國

新谷：現在讓我們轉換一個話題，就越南問題來談談吧。我們留蘇期間，美國開始轟炸北越，而且，轟炸規模逐步升級。在蘇聯有許多越南學生，我們和他們一起堅決地進行了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鬥爭。

到美國大使館前舉行抗議示威 的隊伍遭到血腥鎮壓

美國北炸開始後，越南學生立即組織起來，呼籲大家舉行示威，抗議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日本學生和各國學生，都自動地列隊到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前舉行示威。可是，蘇聯當局竟對我們進行了瘋狂的鎮壓。爲了阻止我們到美國大使館前示威，蘇聯出動了騎警隊及正規軍，在街道上如臨大敵般築起了街壘，把列隊行進的留學生示威隊伍，分割包圍，下令馬隊全速衝向學生，進行血腥鎮壓，許多學生當場重傷，血流滿地。

從這次事件以後，蘇聯當局嚴禁一切示威游行。他

們警告說，如果再舉行反對轟炸北越的示威，就將所有參加者一律逮捕。蘇聯當局原本就是不許舉行示威的，以前讓學生舉行集會，是迫於形勢，不得不採取“默認”態度。

蘇聯當局對越南留學生施加壓力

新谷：這只是莫斯科發生的情形，在列寧格勒，鎮壓就更加兇狠了。列寧格勒並無美國的外交機構（後來根據美蘇簽訂的領事協定，美國決定在列寧格勒設領事館——譯者），但是學生却遭到更兇狠的鎮壓。

美帝轟炸北越後，在列寧格勒讀書、實習的越南學生，決定舉行抗議集會，並事先得到蘇聯當局的許可，借用該市的廣場召開羣衆大會。這一天，越南學生按時到廣場開會，不料一批美國遊客坐的公共汽車，恰恰在相同的時間也要通過廣場。蘇聯當局感到很是狼狽，既不能臨時取消這個已經許可的抗議集會，更不想讓美國人看到這個場面。結果蘇聯當局突然派出大批警察，將越南學生包圍，並一個不留地閃電式的捉上汽車，帶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越南學生當然抗議警察的非法逮捕，這一來就遭到警察的毒打，許多人被擊暈拖上警車，身負重傷。

足立：從這個血淋淋的事實可以看出，按照宮本修

正主義集團的說法，要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採取聯合行動，反對美帝國主義”，是多麼的荒謬。我們通過這個事例，立刻明白了要反對美帝，不可能和蘇修“聯合行動”。

對蘇聯的這種豈有此理的作法，北越政府竟連一句抗議的話也沒有說。

蘇聯認為美帝國主義比越南人民更重要

新谷：從這一個具體事例看來，蘇聯政府是真的支援越南人民，還是更重視美蘇“和平共處”路線？顯然，蘇聯是站在美帝的一邊的。這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寧可對人民、對兄弟國家的革命青年採取血腥鎮壓、逮捕，而不願美帝對它有任何不滿。蘇聯的做法，恰恰是認敵為友，以友為敵，而日修宮本集團竟要和蘇聯組織反對美帝的“統一戰綫”，簡直是單相思。（笑聲）

宮本集團為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辯護

新谷：由於宮本修正主義還未能執政，它的錯誤方針還未能引起十分嚴重後果，但是，蘇聯黨竊取了國家的權力，造成的後果就極其嚴重了。他們顛倒敵友關係，他們可以把他們擁有的巨大的火箭和軍事力量，從

朝向那裏轉而朝向這裏，他們是真正能殺人的。蘇聯黨的變質，和日本共產黨變質的影響不同，蘇共的變質，不僅對蘇聯本國人民造成可怕的危害，對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也犯下了罪該萬死的嚴重罪行。對此，宮本修正主義集團還說：“現在蘇聯共產黨有了某種修正主義的傾向，但依然是‘瘦死的駱駝大於牛’，不能對列寧創造的共產黨，用極端的言詞將它罵臭，它仍然有好的地方。”這種說法正是不折不扣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美化論。

足立：按照宮本集團的荒謬說法：“美帝侵越固然是由於它的侵略本性，但是美帝轟炸北越，與其說是它的侵略本質，毋寧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不團結造成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團結造成的。”這是宮本集團抹煞問題的本質，企圖把不團結責任推給中國的一種狡辯。問題的本質是：蘇聯的黨和國家領導集團，已墮落成爲反革命分子。蘇聯領導人和美帝聯合起來，背叛了世界人民。這件事情，特別是對蘇聯人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堅持革命的中國和背叛革命的蘇修之間，當然談不上什麼團結。

新谷：例如中蘇大論戰一開始，蘇聯就把駐在東德的大量軍隊調到中蘇邊境，虎視眈眈，竭盡軍事威脅之能事；另一方面，對美國却百般討好，雙方默契將德國問題凍結起來。當中印關係惡化時，蘇聯立即以大量現代化武器裝備印度軍隊，慫恿印軍入侵中國。宮本一伙對

這大量事實視而不見，恰恰說明它是蘇聯修正主義的辯護士。

這次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更是再清楚不過的了。照常識判斷，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蘇軍竟毫不猶豫地一下子佔領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這正是修正主義本質的暴露，它的政策就是那樣地在推行着。蘇修一面在國際上進行辯解，一面却用實際行動對外侵略，他們理論是理論，行動是行動。盲目地替蘇修辯護，只有使自己也陷於言行不一的窘境。

事實說明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新谷：宮本集團妄圖遮人耳目，用謊言代替事實，使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走上了邪路。革命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問題，將敵友倒置，就沒有討論的餘地。從蘇聯的實際情況，可以舉出成千累萬的實例，證明蘇聯的黨早已叛賣了革命人民。宮本集團要和蘇修採取“聯合行動”的唯一論據，是蘇聯仍在“援助北越”。關於這一點，民族友好大學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留學生，都能異口同聲地加以駁斥。

蘇聯如果本身不變質，對美國侵略北越就會採取堅決的反對態度，把對北越的侵略看作是對自己的侵略。只要採取這種堅定的政策，這就比給北越一些武器不知

有效多少倍。現在蘇聯只給北越一點有限的援助，一面却大吹特吹，大事宣傳給了多少槍炮火箭；另一方面，又和美帝國主義勾結，雙方取得默契，讓德國問題凍結起來，好讓蘇聯自東德抽調軍隊到中蘇邊境，美國也自西德抽調兵力到南越戰場去。蘇聯這種行徑，實際上是從另一方面援助美國放手侵略越南。

去年夏天，一架滿載侵越軍隊的美軍運輸機侵犯南庫頁島的領空，蘇聯政府立即釋放了這架美機。這個事例，又一次生動地證明：蘇聯領導人在衡量美帝和越南時，總是毫不猶豫地袒護美國，站到美國的立場去，採取有利美國的行動。

官本修正主義集團對援越的看法，完全是從經濟主義觀點出發，打着從根本上就錯誤的算盤。按照他們的觀點，只要在國內募集到的援越捐款數字越多，援助就越大，而不考慮從政治援助出發。以日本為例，佐藤正在把日本的基地供美軍作侵略越南之用。日本人民不容許他們這樣作，並堅決進行鬥爭，使美軍無法利用這些侵越軍事基地，這就比幾億日元的募捐援助有更大意義。蘇聯果真要援助越南，就應該停止目前這種騙人的“援越”障眼法，採取堅決不許侵略越南的立場和態度。

佐久間：美國在全面開始轟炸北越之前，恰巧柯西金到河內訪問。柯西金在河內曾揚言：北越是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成員，對北越的攻擊就是對蘇聯的攻擊，

我們決不坐視。蘇聯將對攻擊進行堅決的反擊。不料他的話，語音未落，美國就開始全面轟炸北越了。這對蘇聯來說，是大失顏面的事情。柯西金的顏面更是丟盡。當時，我們外國留蘇學生自動起來舉行反對美帝轟炸北越的示威，以為蘇聯當局一定支持，且會發動蘇聯羣衆參加。因為這件事情不僅我們憤慨，想必蘇聯人民也是憤慨的。但是實際情形並非如此，當我們示威時，蘇聯官員竟質問我們說：“你們為什麼要在蘇聯搞這種示威？”

我們立即反問他們：“你們為什麼不在蘇聯舉行示威？光舉行示威還不夠，你們的部長會議主席不是清楚地說過，美國對北越的侵略得視為‘對蘇聯的戰爭行為’嗎？為什麼你們對待示威的羣衆進行血腥的鎮壓？”誰知他們竟這樣回答：“你們這種在蘇聯的美國大使館前示威的行動，不能把美帝國主義怎麼樣，所以蘇聯工人不喜歡示威。我們認為蘇聯工人與其參加示威，不如在機器旁多作些工作，對越南多一點物質援助。”

這種說法是徹頭徹尾的從物質主義出發，用金錢物質來衡量一切；而對人民的政治上的援越行動視為毫無力量，且加以粗暴的鎮壓。當全世界對蘇聯鎮壓留蘇學生的暴行發出越來越多的譴責時，蘇聯却吹噓它對北越的物質“援助”，想以此掩蓋自己的叛賣行徑。

蘇聯當局竟審查越南拍攝的新聞紀錄影片

佐久間：在美軍轟炸北越期間，北越拍攝了不少新聞紀錄影片，那是越南人民使用原始武器和用不怕犧牲的勇敢精神與美帝戰鬥的真實紀錄，也有各國人民舉行抗議示威，反對美帝侵略越南，表示支援越南人民鬥爭的實況鏡頭。但是日本學生在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學舉行援越政治集會要放映這些影片時，事前却受到蘇聯當局的無理阻撓。我們要求放映影片，學校當局就出來說話，要求對影片加以審查。我們說這些影片是從越南大使館借來的，實在沒有檢查的必要。可是學校當局堅持一定要檢查，並聲言這是學校當局的義務，非加檢查不可。

爲什麼蘇聯要檢查北越的抗美援朝紀錄片呢？只要一看影片的內容，就一切都明白了。原來影片中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盛大的羣衆示威場面。各地示威羣衆人數一天比一天多，援越反美浪潮一天比一天高漲，出現了許多激動人心的情景。影片中也有日本人民阻止美國核潛艇停泊的鬥爭。這種種的政治鬥爭和羣衆運動的場面，反襯出蘇聯的援越場面是冷冷清清的，毫無力量的，連一個羣衆示威的畫面也沒有。本來就沒有嘛，叫人到哪裏去拍攝呢？如果想要有的話，只能是騎警和軍隊對援越示威的外國學生進行血腥鎮壓的實況。所以，影片中只有

柯西金在河內同胡志明擁抱的一個鏡頭。觀眾看到時，都不禁啞然失笑了。經過蘇聯的檢查，影片中凡是不利於他們的鏡頭統統都剪去了，這是犯罪行爲。

有很多鏡頭描寫越南人民在美機狂轟濫炸下，從容鎮靜地用步槍和機關槍等輕武器擊落噴氣式飛機的情景。這當然是對蘇聯大肆宣傳給越南大量現代化武器的極大的諷刺。對這些場面，蘇聯當局也堅持要剪掉，理由是這些畫面和蘇聯政府宣傳以大量現代化防空武器援越的事實不符。

許多外國留學生知道蘇聯的虛偽宣傳，他們故意問蘇聯學生：“你們援助北越的火箭，到底在什麼地方使用過？”他們說：“現在還未曾使用，但是河內的周圍已完成了蘇聯火箭的防空網。你們看，美國炸了許多地方，到現在就是不敢炸河內，就是因爲蘇聯火箭集中保衛河內的緣故。”但是，等到美機後來接連轟炸河內時，我們又問那些蘇聯人：“蘇聯的火箭到哪裏去了？”他們却無言以對了。蘇聯援助北越的虛偽宣傳一次又一次被事實揭穿，一再被事實所駁倒，但是他們還是要千方百計地辯解，硬說他們的“援助”是“巨大”的。

逼人說“感謝蘇聯援助”

原田：等到蘇聯援越的虛偽宣傳一再被暴露，證明

他們的武器不濟事時，他們竟說：“我們是送了越南許多火箭，但是越南人沒有使用過這種現代化的武器，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使用方法的緣故。”（笑聲）

更可惱的是，蘇聯當局竟要我們學生在舉行援越抗美的政治集會時，每人在講話中都要加上這樣一句台詞：“越南在蘇聯的大力援助下，正在取得抗美援朝的勝利。”蘇聯代表在講話中，更是從頭到尾，反反覆覆宣傳蘇聯的援助。最後在越南學生上台講話時，蘇聯當局又授意他一定要說“對蘇聯的援助，表示感謝”。這樣的集會實際上已經不是聲援越南人民的大會，而成了宣傳蘇聯援助的集會。

有些外國學生不齒於蘇聯干預集會的行徑，在上台講話時硬是一字不提蘇聯的援助，之後就被學校當局召去個別談話，對他提出警告。我們日本學生代表就是有意識地不提蘇聯援助的，我們當時是這樣講的：“我們對越南不應該單單是同情者或援助者。越南人民的鬥爭是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越南人民的鬥爭就是我們自己的鬥爭。我們不只是越南人民的同情者，我們是同一戰綫上的戰友。現在正是我們和越南兄弟携起手來，共同使全世界的反美鬥爭的火燄更加熊熊燃燒的時刻了。”我們常常因為一字不提“蘇聯的援助”，而在事後被蘇聯當局多次召去訓斥。

新谷：蘇聯政府不僅對越南人民實行叛賣，它對世

界上所有爲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而鬥爭的人民，都是採取這種罪惡的叛賣行爲的。我們大學中包括日本在內的八十多個國家的學生，都面對着這個問題。

日本的國內政治制度，比較來說算是穩定的。其他的國家的學生在留蘇期間，常常碰上自己的祖國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生政變或爆發革命等事情。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尼發生反革命政變後，蘇哈托—納蘇蒂安政權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的關係，不是惡化，反而比以前更加緊密得多了。

蘇聯在一系列問題上，包括越南問題上所起的反革命作用，以及各國在蘇聯的留學生採取的態度，關於這方面的例子，由於我們每天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實在知道得太多了，在這裏，只能選一兩個典型的來談談。

原田：首先，在越南問題上特別使日本學生對蘇聯的想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蘇聯政府對於勇敢地推動援越抗美鬥爭的日本學生，採取了大規模的鎮壓。美國全面轟炸北越後，日本學生和外國學生立即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前舉行了示威。示威剛完畢，蘇聯校長就把日本全體學生召去，用粗言斥罵我們。他說在蘇聯國內舉行這種示威是荒謬的，如果以爲憑這種示威就能支援越南人民的話，倒不如拿點錢出來買些坦克和飛機送到越南還有效些。他又說，如果這樣還不夠，不妨自己扛起槍到越南去，最好明天就去，蘇聯可以爲他準備赴越南的

飛機。他最後說：“假如你們做不到這些，却要在美國大使館前搞那些示威，簡直就是荒謬的行動。”

這個蘇聯校長隨即宣佈，要對這次參加示威的日本學生給予處分，包括最高的行政處分——停學。

由於一再受到蘇聯的迫害，每一個日本學生從切身體會中明白了這個道理：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綫中，絕不能包括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日本學生明白了蘇聯的最高權力已被修正主義者所掌握，蘇聯早已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國家。倒不妨說，蘇修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敵人。我們從蘇聯軍警鎮壓援越外國學生的殘酷教訓中，懂得了修正主義是什麼東西，懂得了和現代修正主義根本不可能採取什麼“聯合行動”，而只有和他們鬥爭並粉碎他們，此外別無他途。

把印尼留學生交給了蘇哈托反動政府

足立：我還可以舉出蘇修叛賣革命人民的典型例子，那就是印尼問題。我在蘇聯留學期間，一九六二年夏季，印尼發生了西伊里安問題，還發生了加里曼丹的紛爭，一些印尼學生準備組織反對荷、英帝國主義的示威，並要求其他國家學生參加。日本學生準備了標語，決定聲援印尼學生。但是臨到舉行示威的前夕，蘇聯的

中等和高等教育部部長下令，不許印尼學生示威。當時是一九六二年秋，中蘇之間的公開論戰還未爆發，不過種種疑團已經出現，當時我們就覺察出蘇聯當局不許印尼學生示威的作法非常可疑。當時我們認為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留學，而且莫斯科就是世界的革命聖地。我們想來想去，想不出蘇聯當局為什麼要禁止印尼學生舉行反帝示威，還以為蘇聯當局這樣做，大概是顧慮到英蘇的外交關係。

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印尼右派軍人政變後不久，印尼法西斯政權的外交部長馬利克，竟受蘇聯政府的邀請，到莫斯科來訪。我們從這件事看清了蘇聯政府的醜惡面目。我們當時還不明白：何以一個至少屠殺了數十萬印尼共產黨員，並且正在繼續捕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法西斯政權的外交部長，偏偏在這個時刻受到蘇聯政府的邀請，跑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呢。而且，當印尼留蘇學生在莫斯科機場示威，對馬利克的到達高呼“馬利克滾回去”的口號時，竟然遭到蘇聯警察和憲兵的鎮壓。

馬利克的到訪，正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節的前後。印尼學生在游行時高呼“馬利克滾回去！”又立即遭到蘇聯警察的制止。類似這些事情，竟然發生在蘇聯，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佐久間：那時的印尼留學生都氣憤地說：“蘇聯領導人居然用印尼人民的鮮血和印尼法西斯主義者一起乾杯

了。”

足立：如果僅止於此，倒也罷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蘇聯政府竟將印尼的進步學生直接從莫斯科送回印尼，交給法西斯政權手裏。這些印尼學生回去後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蘇聯學校當局對印尼學生說，凡是要離開蘇聯的學生，學校當局只為他們準備直通印尼的飛機票。蘇聯此舉，目的是害怕一些印尼進步學生藉回國的時機，中途到中國或北越去。印尼學生和其他外國學生當然反對這種做法，並聯合起來向學校當局進行鬥爭。我們指責蘇聯這種做法無異借刀殺人，那些印尼進步學生一回到雅加達，就可能被全部殺害。看到這種情形，和我們一起鬥爭的印尼學生說，在他們看來，現在的蘇聯政府究竟是敵人還是友人呢，確是一個問題。他們說，除了把蘇聯政府當作敵人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拋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蘇聯

足立：對印尼問題也好，對越南問題也好，蘇聯政府對待世界革命的修正主義態度，可以從許多方面加以批判。一言以蔽之，今天的蘇聯政府，已經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背離了世界革命的觀點。我認為，即使蘇聯在經濟上有了無論多大的發

展，也決不會到達共產主義。歸根結底，只有全世界人民都起來打倒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那個時候，蘇聯也才能進入共產主義建設。蘇聯是和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越南人民在浴血奮戰，不真正給予援助是不行的。列寧也曾指出過，第一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應該對世界革命運動作出重大的犧牲。可是今天的蘇聯當局完全不是這樣，它一心一意只想撲滅越南的反美救國戰火，反對南越人民取得勝利和解放。正因為如此，蘇聯當局對越南人民的援助，根本不是真心的。相反却是壓迫越南人民的正義鬥爭，以便和美帝國主義達成妥協。

佐久間：蘇聯有不少人把越南人民看作是可憐的人，說越南人民成了殘酷的戰爭的悲慘的靶子，因而一再強調要趁早結束這場戰爭。他們根本看不到越南人民的正義鬥爭的勝利前途，一點火星就會演變成一場世界戰爭的思想牢牢地束縛着他們。他們的想法是：蘇聯已經不存在敵對的階級矛盾，只要沒有戰爭，蘇聯再經過幾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就可以達到“共產主義”。如果爆發戰爭，那一切都成為空想，所以他們害怕戰爭到極點，不管是正義的戰爭，還是非正義的戰爭。世界上無論哪個地方的人民拿起武器要求解放，蘇聯當局就嚇得不得了。世界人民一旦起來拿起武器進行解放戰爭，就一定遭到蘇聯的破壞。雖然他們有時還不得不作些給予軍事、經濟援助的姿態，實際上他們非常厭惡這種正義的革命

戰爭。我們在民族友好大學的亞、非、拉美許多國家的同學，都聽到過蘇聯人這樣清楚地當着我們的面說過：“爲了援助你們，我們的共產主義建設可就拖延了。”

在以色列侵略問題上出賣阿拉伯人民

佐久間：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國家後，蘇聯政府立即將問題提交聯合國，要求談判解決中東局勢。阿拉伯許多國家事前已覺察到以色列的侵略態度，知道它要發動戰爭，紛紛動員準備一戰。蘇聯政府則唯恐阿聯等國家採取堅決抵抗的方針，連忙通過外交機構向開羅猛施壓力。要阿聯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要動手，如果以色列先發制人，蘇聯就會立即將問題提到聯合國。結果使阿拉伯國家喪失了主動地位，任憑以色列發動閃電進攻。阿聯四百架戰鬥機整排地排列在機場上，還未及起飛就被以色列空軍炸毀，阿聯空軍主力頃刻之間被全部消滅。

事後蘇聯政府千方百計隱瞞這一事實真相，在蘇聯國內還說什麼戰爭一開始，阿聯方面首先擊落以色列飛機三十架，又說蘇聯已將中東問題提交聯合國，並正在加強援助阿拉伯國家。

但是，在莫斯科的阿拉伯學生逐步明瞭事情真相後，對蘇聯當局的做法感到無比的憤怒。阿拉伯學生原本是民族友好大學中最親蘇的一派，這時他們再也按捺不

住，公開指責蘇聯政府對阿拉伯國家的叛賣行爲。在事實面前，蘇聯政府無法狡賴，只好發動誣衊誹謗阿拉伯國家的宣傳攻勢，以擺脫自己所處的窘境。說阿拉伯國家的政府缺乏效率，說阿拉伯軍隊紀律鬆弛，士氣渙散，腐敗墮落。這樣的軍隊，即使有蘇聯援助的飛機和坦克，也沒有戰鬥力，竟然一彈未發就被以色列軍擊潰，以致白白糟塌了蘇聯的援助。蘇聯叛賣阿拉伯國家於前，又誣衊、誹謗這些國家於後，這種卑劣的行徑說明，他們還有一絲一毫的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觀點嗎？

蘇聯不報道拉丁美洲的武裝鬥爭

佐久間：蘇修領導集團對拉丁美洲的武裝鬥爭，也是深惡痛絕的。

五年前，委內瑞拉游擊隊的武裝鬥爭已發展到形成國內統一戰線的規模。但是，委共總書記這時從監獄中釋放後，立即去蘇聯，一面療養一面和蘇聯方面接觸，終於變成了一個修正主義者。他下令將本國的武裝鬥爭，轉變為走和平的議會道路，並斥責武裝鬥爭不符合委內瑞拉的實際情況，是“極左的機會主義路線”。在他的影響下，由委內瑞拉共產黨領導、深入山區活動的大部分游擊隊，離開了山區根據地，走下山來。游擊隊一暴露了據點，就失去了力量，被反動軍隊一次包圍總攻

擊，主力全被敵人吃掉。

這個事實，說明蘇聯修正主義者唯恐人民的武裝鬥爭發展壯大，不僅不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革命鬥爭，反而千方百計地撲滅各地的民族鬥爭的火燄。這一點正是蘇聯修正主義者的一大特徵。

因此，現代修正主義向全世界擴張，使很多的黨的領導層發生變質，最後必然放棄革命道路。同時，也必然有革命派的共產黨人起來拋棄那些修正主義者，成立新的、真正革命的左派政黨，這就是今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趨勢。我們大學的各國畢業生，有不少人回到祖國後成為革命的左派，重新組織新的革命力量。這些人正在認真地考慮着怎樣進行本國的革命。現在還追隨修正主義者的那些人，已墮落到連口頭上也討厭提起“政治”或“革命”的字眼的這種地步。

足立：黑海沿岸有個叫做瑪卡布塞的地方，我們學校在那裏設立夏季的“休養之家”，我也去參加了。那裏舉行了一個關於越南問題的集會。由於是蘇聯方面舉辦的，到會羣衆不多。因此他們就從附近的小學校動員了許多小學生前來參加。結果，這次“援越集會”完全走了樣。蘇聯方面的會議主持者，事前授意少數親蘇的阿拉伯學生，不斷在會上呼口號：“感謝蘇聯的無私援助！”“蘇聯的無私援助萬歲！”那些蘇聯小學生在台下就跟着喊。整個會場變成了“感謝蘇聯”的集會，只聽到一遍遍

的“堅決支持蘇聯政府的方針！”、“蘇聯援助萬歲！”的口號聲。

連經濟地理教科書也把蘇聯“援助”寫進去

足立：蘇聯的經濟地理教科書上，記載着世界許多國家的經濟和地理情況，例如談到委內瑞拉，教科書上介紹這個國家的資源、工農業情況，哪一種工業最發達等等，這方面和其他國家的地理教科書是一樣的。但是，蘇聯教科書却有一個與衆不同之處，就是在對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地理介紹之後，一定要詳細寫上蘇聯給這個國家多少價值的援助。在寫到非洲國家時，那就更熱鬧了，課文中記載着哪個工廠、哪個企業、哪座醫院是在蘇聯援助之下興建的，筆筆細賬，一筆不漏。至於其他國家對這些國家的援助，當然一字不提了。（笑聲）

作爲普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贈給人一點東西，總是盡量使對方不要爲此感到過意不去，更不可只要求人家感謝自己，更何況蘇聯這種外援根本就不是白白贈予的。蘇聯在對外國“援助”上，許多是自己提出建議，硬要人家接受的，等到人家接受後，蘇聯就認爲“你非得感謝我不可”，你不感謝，也要叫你說“感謝”。

蘇聯“援助”印度的成就

佐久間：在經濟地理教科書上，硬要列入“援助”細賬倒還罷了，更荒唐的是，考試時也必然要出這類試題。例如關於印度問題的試題，除要求回答印度的資源、產業等情況之外，還規定學生必須回答蘇聯怎樣對印度提供了援助，修建了哪一條堤壩？蓋了哪一座工廠？在我們看來，印度的壟斷資本正在發展；但是我們從蘇聯課本所看到的，却說印度正向着“非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並成為亞洲的一個典型國家”！它又說：“印度的國民經濟，在蘇聯的無私援助之下，已取得重大的成就”……只要稍為注意印度現實情況的人，就會發現蘇聯教科書上所說的全部是鬼話。印度今天絕大多數人民，還沒有擺脫飢餓、疾病的纏擾。蘇聯的“無私援助”，絲毫沒有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恰恰相反，蘇聯政府和美帝國主義競相“援助”印度反動派和反動資產階級的結果，使印度的壟斷資本更形龐大。而且蘇聯政府鑒於美國對印度提供比自己多得多的“援助”，為了討好印度，也就對印度的壟斷資本和反動派增加了大量“援助”，包括送上大批現代化武器，用來反對社會主義中國。

我們對試題中關於蘇聯政府“援助”部分，一句也不回答。日本學生在這種場合下，還可以免受追究，但那

些受到蘇聯“援助”而來留學的外國學生，就非得回答這些問題不可，並且還要表示“感恩戴德”一番。

以“恩人”自居激怒了非洲學生

佐久間：蘇聯對非洲國家完全以“恩人”自居。我們班上的教師公開對非洲同學說：“你們非洲人今天之所以能够獨立，全靠我們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在我們班上，非洲同學對這種說法大起反感，一個同學當場起立對蘇聯教師說：“先生，請你聽着：我們國家由於帝國主義的長期壓迫，人民還沒有取得徹底解放，因此我們仍然很窮。如果拿人來譬喻的話，我便是一個窮人，我連衣服也沒得穿。你今天給我一件衣服，我很高興，我認爲你够朋友。但是我穿着你給我的衣服在街上行走時，你却指着我的衣服，見人就說：‘他的衣服是我送給他才有得穿的！’即使這件衣服對我非常必要，我也會毫不猶豫地脫下來扔到陰溝裏去。”

在非洲同學理直氣壯的陳詞面前，那個蘇聯教師窘得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原田：有一個日本同學的經濟地理教科書，發現裝訂有錯，無法使用，就拿着這本書找教師商量。蘇聯教師就把教科書的校樣借給他，要他自己根據校樣整理。這個校樣是根據教師寫的原稿初步印刷後並送呈上級機

關審閱的。我們在那校樣上看到許多紅筆勾劃的增刪地方，只見上頭滿滿是上級用紅筆寫的“在蘇聯援助下”字樣。本來在那教師的原稿上就已經寫了不少“蘇聯的偉大援助”字樣了，上級還嫌不夠，臨時又加了許多。僅從這一點小節，就令人爲之氣憤不已。

古巴事件時的“援助”

新谷：我留學蘇聯那年，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當時發生了加勒比海危機。在這次事件中，蘇聯對美國如何卑躬屈膝、百般讓步的態度是世人皆知的。但是事件過後，蘇聯又無恥地吹噓它的熱核武器的威力，竟說古巴這個國家能夠維持生存，古巴人民之所以能夠活下去，完全是蘇聯熱核武器的威懾作用。如果沒有蘇聯強大的火箭和熱核武器，古巴早就被美國消滅了。古巴學生聽到這種說法，當然十分氣憤。古巴革命政權能夠存在，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首先是由於古巴人民所表現的反對侵略和敢於鬥爭的精神。外國的援助無論多大，也只能通過古巴人民的內因才能發揮作用。但是蘇聯却不如此，在許多演說或集會的場合，蘇聯領導人都以古巴的“恩人”自居，硬說全靠蘇聯的熱核武器，阻止了美帝的侵略，古巴人民才能生存到今天，因此古巴人民應該感謝蘇聯的“援助”。

已有固定內容的蘇聯式 “支援各國人民集會”

足立：在蘇聯，如果是由當局出面舉辦什麼支援外國鬥爭集會的話，其內容一定是宣傳蘇聯的“援助”怎樣“無私”，宣傳對方國家怎樣“感謝蘇聯”；蘇聯的新聞影片在紀錄這類集會時，也是從頭到尾吹噓這一套。

原田：在所謂支援外國鬥爭這類集會上，外國學生的大會講稿，甚至由蘇聯當局包辦，事前即已寫好，臨時叫他上台照讀，以表達對蘇聯的“衷心”感激。蘇聯的這種作法，已經是習以為常了。

佐久間：我們外國學生進入民族友好大學，第一年需要先學一年俄文。蘇聯學生則選讀英語、法語或西班牙語。爲了提高會話能力，這些蘇聯學生都和外國學生一起住宿。蘇聯同學在快要畢業或畢業後，就被派到各個國家去。蘇聯把這就叫作“技術援助”或者什麼別的援助，並大肆進行宣傳。可是，在莫斯科的外國學生，深知這些蘇聯學生的底細，對蘇聯政府這樣的作法非常不滿。一些外國同學都在背後竊竊私語：“我那房間的蘇聯人居然到我的國家去當什麼高級專家了。那傢伙的水平實在有限，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笑聲）

爲了滿足私欲，蘇聯學生希望被派到國外去

佐久問：僅僅是這樣也還罷了，這些傢伙到外國去，目的是發洋財。他們被派到國外，就可以享受比國內高得多的高薪，而且是外鈔，這樣他們就可以用外匯在西歐買許多在蘇聯買不到的東西，帶回國去用來擺威風，充闊氣。他們還從外國買小汽車回來。

有一次，一個學生到外國充當“高級專家”後回國，帶了一輛汽車回來，有些同學就問他：“你這輛車是哪國給你的援助？”（笑聲）原來，在同學之間，俄語“蘇聯援助”已成爲別有含意的雙關語。例如同學之間說：“喂！你來，我給你一點好東西。”“什麼好東西，還不是‘蘇聯援助’啊！”這就是說，“蘇聯援助”只給人家一點小恩小惠，却宣傳得天花亂墜，又要人家非感謝自己不可。“蘇聯援助”，現在已成爲學生之間日常談笑中的慣用語了。（笑聲）

蘇聯和中國對非洲援助的不同

我同班的一個非洲同學，原是一個地道的“親蘇派”。這年夏天，他乘放暑假之便回國，後來再回到莫斯科後，態度大有改變。有一天晚上，他在宿舍裏悄悄對我說：“我這些話在這裏不能大聲講。我這次回國以後，

到非洲幾個國家看看，令我吃驚的是，非洲國家這兩年對蘇聯的印象，越來越惡劣。相反，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却越來越大了，我一時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後來我到幾個國家去看看，發現中國對我們的援助，和蘇聯可說是完全不同的。”

我問他有什麼不同。他說，那些蘇聯技術人員嫌非洲人的房子不堪居住，要求住新公寓。他們還要電冰箱，每個人要一輛專用小轎車。可是，中國人員完全兩樣，他們堅持和當地普通人過一樣水平的生活，拿同樣的待遇，不要一絲一毫的特殊待遇，而他們的工作精神更令人感動。他們的工作量，起碼超過當地人一倍。最初我還不十分相信，以為中國的援助也是為了宣傳，後來才發現我的看法不對。例如在馬里，蘇聯最先給馬里的援助，是建築一座足球場。中國呢，他們的專家到馬里去，首先幫助馬里人學會種植水稻等農業技術，而這是馬里發展經濟最迫切需要的。中國專家在坦桑尼亞、贊比亞的艱險山區中，協助修建鐵道。他們是真心實意地幫助非洲國家發展本國的經濟。這是落後國家真正需要的外援。

他們——非洲國家的人民，都親眼看到：一個是給了一些援助之後，逼着人家說感謝；而另一個却說，不要謝，不要謝，那是我們應該作的。非洲人看清楚了這兩種不同的援助，因此對蘇聯政府的印象越來越惡劣了。

這些都是那個親蘇派非洲同學說的事實。

足立：現在蘇聯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根本態度，歸納起來就是：對拿起武器起來革命的世界人民，不顧一切地進行壓制；另一方面却又給一些不痛不癢的“援助”，目的則在於宣傳。以與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什麼兩樣的方式進行投資，目的不是爲了幫助那個國家的革命力量的發展，而是助長那個國家的資本主義反動勢力，而且，又借“援助”對方，以大國主義的態度一定讓人家感謝自己，並要挾對方聽自己指揮。

如果看不清蘇聯政府援助的本質，還以爲蘇修會改變態度，認爲它還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因而對它抱有幻想，這就會給本國革命帶來重大的損害。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已和美帝携手，企圖重新瓜分世界。我們透過許多事實，證明和蘇修決不能結成反美統一戰綫。

在國外過着貴族生活 的蘇聯技術人員們、

新谷：蘇聯和中國對非洲國家兩種援助的根本不同點，不必從理論上來談，非洲人從現實中已經充分體會到了。非洲同學們對此非常了解。蘇聯的技術專家打着“社會主義國家”的招牌，實質上和當年白人殖民主義者到非洲去的目的是相同的。他們一到非洲國家，就要求特殊待遇，許多專家在工程契約滿期後也不願回國，千

方百計繼續留在國外過其貴族式的生活。他們在國外有高級住宅住，有汽車代步，揮金如土，吃喝玩樂，樣樣俱全。

自一九六〇年蘇修突然全部撤走在中國的專家後，中國從蘇修反面教員中得到了痛苦的教訓，中國對新興國家的援助，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如對馬里等國幫助當地人民種植水稻，使人民能够自力更生。中國技術人員到了非洲，在氣候條件完全不同的情況下，盡全力摸索試種水稻的經驗，他們有的一到非洲就病倒，仍然頑強地工作。他們和非洲工作人員拿同樣的待遇，不要求任何特殊享受。援助額的多少是另一問題，單是中國這種真誠援助的精神，就使當地人民深受感動。在莫斯科，我們碰到不少非洲學生，他們的祖國同時接受中國和蘇聯的援助。這些學生對兩種援助的差別非常清楚，並常常說給我們聽。

原田：什麼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一個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對於正在進行解放鬥爭的人民，從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來看，應該把他們看作是在最前綫作戰的戰士，因此要給予一切必要的支持和援助，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人民不可推卸的國際義務。世界上凡是起來為爭取解放而鬥爭的人民，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就是自己的鬥爭，必須堅決地和他們站在一起。

但是，以蘇聯爲首的一些修正主義國家，把自己應負的國際主義義務看作是沉重的負擔。因此，他們才認爲“越南人民的勝利，全靠蘇聯的援助”，硬要越南人民感謝自己。當人民的解放鬥爭激烈起來，以致蘇聯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磨擦加劇，影響到蘇美“和平共處”的路綫時，蘇聯政府就向解放運動施加壓力。它給越南的一點點“援助”，不過是以此爲誘餌，要挾越南人民放棄對美帝的武裝鬥爭。這種假援助是違反越南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革命學生對中蘇兩國的態度的不同

新谷：現在談談蘇聯對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從事獨立解放鬥爭的人民，究竟抱着什麼態度。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九·三〇”政變後，留蘇的印尼學生頓時變成有國難回的流亡者。不僅僅共產黨員是如此，就是那些只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學生也是如此。還有秘魯等一些國家的學生，不顧一切危險，千方百計跑到蘇聯，他們也嘗透了有國難回之苦，因爲在那些政治上極端反動的國家中，誰沾上共產黨就是非法，他們回國只有入獄或被殺害。

這就是各民族友好大學有大量外國學生之故。但是，蘇聯當局對冒險前來就讀的外國革命學生，常常以

“政治上的理由”，勒令他們四十八小時內離境。所謂“政治上的理由”，就是因為這些外國學生他們本國的共產黨分裂，而他們是採取了同情左派的立場，或因他們同情中國，甚至他們到過一次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或者看過中國的一些書籍，都會被“遞解出境”。

蘇聯強令那些有國難回的外國革命學生離境，等於置那些學生於死地。而且他們採取這些迫害措施時，冷酷無情，絲毫不講道理。一個人被迫害到這種地步，立刻明白誰是真正的朋友，誰是真正的敵人。

一對秘魯兄弟，就是這樣被蘇聯下令一起離境的。那個弟弟也在我們大學裏讀書，哥哥本來是被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而要他離境的，而他的弟弟受到離境處分，則僅僅由於他是被叫離境的人的弟弟。這類事情，我們是知道得很多的。中國方面，對這些革命的學生，及時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在這方面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我們在蘇聯學習期間，對中國和蘇修的分歧，不必從理論上去探討，只是通過實際體會，就能判斷出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了。那對秘魯兄弟後來是得到了中國的援救的。通過這些事實，使人看清楚誰是真正支持世界革命運動，誰是世界革命運動的真正叛徒，事情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九·三〇”事件後印尼留學生的分裂

佐久間：我來談談印尼發生政變後，在蘇聯留學的印尼學生陷於怎樣困難的境地，這個事實使我們獲得了非常有意義的教訓。

“九·三〇”事件後，一些大學的印尼學生當然不能回國了，已畢業的學生就繼續留在莫斯科，有的到工廠勞動，有的以研究生或旁聽生的名義，大部分仍住在學校。

過去和我們一起鬥爭過的印尼學生、共產黨支部的負責人，這時有的就出賣了靈魂，倒向了蘇修。他們對於蘇聯修正主義，一變以前態度，緊閉嘴巴，不再提出批評了。既然發生了這種現象，印尼學生中間因此引起了大爭論，不僅黨員學生截然分成兩派，就是印尼民族黨左翼的學生，也發生了分裂。

佔壓倒多數的留蘇印尼學生，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修正主義者劃清了界限。他們支持印尼國內的反蘇哈托武裝鬥爭，並表示無論怎樣也要參加鬥爭。他們譴責印尼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集團和蘇修勾結破壞印尼革命。他們和修正主義的黨支部斷絕關係，陸續到中國去了。當然，他們名義上不能這樣說，否則蘇聯當局會對他們橫加迫害。

剩下來的一部分印尼人，用我們的習慣語說，就變

成了“莫斯科維奇”，意思是“莫斯科仔”。他們已經背離了祖國人民，成天在莫斯科胡混。這些人表面上走官本路線，以示“自主”和“中立”。他們的黨的負責人住在豪華的公寓之中，每月拿着高薪，生活高人一等。

但是，由於蘇聯政府公然和印尼法西斯政權打得火熱，就連這些人也起了分化。因為他們的親屬和伙伴都已遭到印尼法西斯政權的一概捕殺。當印尼學生向蘇聯當局提醒蘇哈托—納蘇蒂安是十足的法西斯政權時，蘇聯官員却說，蘇哈托政權不是法西斯，法西斯只有在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軍事獨裁化的情況下才有。印尼還沒有壟斷資本，所以不是法西斯。這種答覆使留在蘇聯的印尼人十分氣惱。真正死心塌地出賣靈魂的畢竟是少數，他們在印尼學生中飽受批判，越來越孤立。真正的革命戰士，在印尼學生中結合這次政變的血的教訓，舉起了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組織起學習會。

這樣，在莫斯科留下來的這些印尼學生，又分成了兩派，現在大多數學生堅持着正確的反修立場，其中有些人而且敢於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當然，這些人一定會被迫離境，只是時間問題罷了。即使屬於修正主義的一派人，事後證明他們也只是暫時受蒙蔽，他們很快認識了蘇修真面目，重新走上革命道路。最後的最後，只剩下那些極少數的人，娶了蘇聯老婆，死心塌地背叛祖國。印尼學生的演變，對我們是個極其重大的教訓。印

尼共產黨中真正的革命派、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同志們進行的種種活動，對於促使我們也敢於在莫斯科起來造蘇修的反，起了非常大的鼓舞作用。

蘇聯人怎樣看中國呢——徹底的反華宣傳

新谷：我們在這裏不妨談談蘇聯人對中國的看法。這也是我們回國後很多人都提出的問題。

佐久間：一九六三年八月底，我剛到莫斯科不久，就到全市最有名的高爾基公園去散步。一個知識分子模樣的男子一看到我，就氣勢洶洶地走過來問道：“你是中國人嗎？”在我留學蘇聯的五年期間，碰到這類事情不知有幾十次了。我說：“不是的，我是日本人。”他一聽就答話說：“哦，日本人，我們的朋友。”如果我說是中國人，麻煩的局面就會出現。蘇聯當局通過無線電、電視、報紙、雜誌等一切宣傳工具，整天宣傳反華，有些蘇聯人就是這樣中了毒。

蘇聯政府是怎樣宣傳反華的呢？第一是說中國忘恩負義。中國是在蘇聯“援助”之下才取得革命的勝利。革命成功後也是在蘇聯“援助”之下才有今天。但是今天的中國不僅不感謝蘇聯，反而仇視蘇聯，如此等等。這類宣傳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通過各種大規模的宣傳機器，向蘇聯人灌輸。不少年青人和知識分子就認為：中

國人都是忘恩負義之輩。日本人和中國人相像，我們在這方面受到過不少氣。

原田：蘇聯用數倍強烈的電波干擾北京的俄語廣播，使人完全無法收聽；而對於“美國之音”，蘇聯當局則任它自由泛濫。

蘇聯政府在電視廣播中，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百般污蔑。它們把紅衛兵在北京抗議蘇修反華的示威行動，盡情歪曲。這種歪曲、誣蔑的伎倆，一如宮本集團和《赤旗報》前駐北京人員砂間一良和紺野回國後所作的那種虛偽的描繪手法。他們播映紅衛兵在蘇聯大使館前示威的情形時，造謠說蘇聯大使館人員生命如何受到“威脅”，怎樣“歷經艱險”逃往飛機場。他們又極其惡毒地造謠，把北京飛機場描繪成一片恐怖。這種手法，和宮本集團及西方的反華宣傳，是一路貨色。

連“紙老虎”和“東風壓倒西風”也不懂

佐久間：蘇聯一般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內容一無所知。他們從早到晚所聽到的和看到的，就是蘇聯當局通過各種宣傳機器發出的反華叫囂。這種對新中國、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造謠和誣蔑，誇張到令人不可置信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蘇聯人對中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上的爭論，也是被蒙在鼓裏的。我們

剛到莫斯科，就發現不少蘇聯人的理論水平極低，理論知識貧乏得十分可憐。例如毛澤東主席有一句有名的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句話直譯成俄文，就成了“紙的老虎”。他們竟認為既然是“紙的老虎”，這句話又跟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還對“東風壓倒西風”這句話毫不理解。照蘇聯的可笑解釋，“東風”就是中國，“西風”就是中國西面的蘇聯。他們誣衊這句話是“毛澤東的中國企圖征服蘇聯，站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上說的一句話”。這一類的例子，一時也舉不完。打開地圖看看，中國的東面還有一個國家，就是日本，按照蘇聯這種無知得可笑的解釋，豈不是說日本要征服中國和蘇聯嗎？蘇聯這種對人歪曲和誣衊的態度，簡直是愚昧無知的亂咬一通，真是莫名其妙。（笑聲）

足立：蘇聯發動反華運動，是在一九六二年底，即加勒比海危機結束之後。記得當時教我們俄文的教師，突然在我們面前破口大罵中國。這個教師曾經去過中國，能說中國話。他說：“中國接待客人態度不好。”教經濟地理的教師也是這樣。從此我們就知道反華運動已告開始。

新谷：冬天是滑雪季節，大家都去滑雪。俄國人一般都精於此道，再加上他們的個子特大，我們在滑雪時，常常被一些蘇聯傢伙誤認為中國人而施以暗害，他們以

全速衝前，用全身向我們猛撞。這種猛撞如被撞中要害，甚至會有生命的危險。

原田：不僅如此，那些傢伙看到我們在滑雪，故意在滑道十字轉彎路口附近，暗置鐵絲、鐵條，當滑雪者以全速向下坡飛馳，在這些金屬障礙物上滑過而轉彎時，身體就會因失去重心而傾斜，猛烈蹣倒在地。我們已多次碰到這類事情。爲此，許多日本人外出時，神經也變得特別緊張起來。

新谷：我們沒有辦法，只好在滑雪衣前後綴上一面明顯的太陽旗標誌，讓那些傢伙知道我們是日本人，才算沒事。太陽旗居然成爲在蘇聯的日本人的護身符了（笑聲）。

足立：正如一般日本人初見西洋人時，分不清他們的國籍一樣，在蘇聯人眼中，對亞洲人也是分不清的。他們以爲黃皮膚的都是中國人。爲此，日本學生在蘇聯，遭受到多次侮辱和肉體上的損害。

新谷：今天蘇聯當局的反華和排斥中國人運動，是生根於過去沙俄看不起東方人的大民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我們碰到這種情形時，說“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國人”以避免受害，這雖然是應急的權宜脫身之計，實際上說這句話是不對的，這是一種求情的表示。但是，在今天的蘇聯，遇到那些蠻橫無理、粗暴無恥的暴徒時，如果不這樣說，立刻就會失去人身安全保障。請問這樣

的國度，還說得上是“社會主義”嗎？這又跟德國法西斯歧視猶太人有什麼兩樣呢？

這種現象當然只是一部分極端分子所為，但也正是蘇聯政府動員全部國家機構，開動全國的宣傳機器，歇斯底里地煽動反華、排華的結果。

當中蘇論戰剛開始的時候

新谷：在中蘇論戰剛開始時，早晨七時半起床一看，《真理報》刊載出就像日修《赤旗報》上那種又臭又長的文章。早上的無線電節目也在廣播同一篇長文，說中國共產黨這也不好，那也不對，一直到了中午再打開收音機，仍然繼續廣播那篇文章。

中蘇之間爆發公開論戰，是中蘇兩黨在莫斯科舉行談判期間，由蘇共中央突然發表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引起的。對蘇共中央這封公開信，中共中央後來連續發表了九篇評論，提出了反駁。蘇共中央這封公開信發表後，立即在全國展開宣傳。從小學低年級只認得幾個字的小學生，到一切學校、一切機關、工廠、地區，不管人們懂與不懂，所有的蘇聯人，統統都被強制閱讀這篇文章。同時，所有國家機構都被動員起來，發動徹底的反華宣傳運動，煽動反華情緒。不僅如此，蘇聯政府還散播中國可能進攻蘇聯的謠言，製造戰爭的氣氛，造成全

國的恐怖感。

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莫斯科就傳說中國已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當時中國實際上並未宣佈核試驗消息，但在蘇聯已經暗暗傳開了，居然形成一種恐怖氣氛。

足立：回顧中國最初核試驗在蘇聯的反響，確也有趣。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國進行第一次核試驗時，和肯尼迪被暗殺之後一樣，莫斯科的一般氣氛是非常緊張的。但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學生們，却歡喜若狂，熱烈地歡呼中國擁有了自衛的核武器。

在這次核試驗以前，莫斯科早就流傳中國在試驗原子彈了。試驗這天，我們聽到了這個消息，並告訴同房住的一個蘇聯人。我說中國進行核試驗了。當時那個蘇聯同學已經睡了，聞訊立即跳下床來說：“這是非常壞的事情。”我又向另外一些蘇聯人問對這件事的看法，他們都顯示出心情沉重。這種表情和肯尼迪被刺消息傳來後蘇聯人的反應完全一樣。在他們看來，這兩個問題本質是一樣的，“好戰的”中國擁有原子彈，對和平是“重大的危險”。“和平之神”肯尼迪死後，世界和平也就同時受到威脅。

原田：爲什麼他們這樣害怕呢？據他們說，中國有了原子彈，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提早爆發。我又問他們，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又怎樣？他們說：“到那時我就去自殺。”甚至共青團的男女負責幹部也說出這

種話來。難怪他們一聽說中國核爆炸，就嚇得臉都青了。

對暗殺肯尼迪事件的反應

佐久間：肯尼迪被刺事件，在蘇聯也引起一場大震動。我們進入各民族友好大學後，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間，肯尼迪被刺的消息傳來了。當時，大學宿舍中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學生，都為這個美帝的頭目的死而興奮、高興。那時是在半夜，消息傳來，外國學生們真的是歡聲四起。

可是我們看到蘇聯教師和學生的反應，却和我們相反。他們為這件事情顯得非常沉痛。我們到他們聚集的地方去看看，只見他們每五、六個人聚集在一間房間裏，人人表情哀痛，沉默不語。我們問蘇聯同學這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這樣英明的美國總統竟然會被人暗殺了，實在令人惋惜。肯尼迪的明智，保衛了世界和平。現在和平之神被殺害，什麼時候打世界大戰就難以預料了。”他們說這些話的表情是非常嚴肅認真的，有些人還低着頭，陷入深沉的哀思中。這和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學生的興奮，適成極其強烈的對比。當時我們到莫斯科不過兩三個月，看到這一“奇景”，不禁為之愕然。這件事給了我們深刻的印象。這也是我們到蘇聯後第一次遇到的令人震驚的怪事。

原田：有一次，我和一個匈牙利同學一起出外散步，拍攝秋天的莫斯科風景。我們到了紅場，拍過幾張照片後，就在那裏站着聊天。在我們前面兩三米的地方，有一個蘇聯軍官在那裏。他的體格高大，官階很高。他顯得有點慌慌張張，看看我們又來回踱步。一會兒，他向我的匈牙利同學招招手，示意要他過去。對這個蘇聯軍官，我們完全不認識，他爲什麼要那位匈牙利同學過去呢？我就叫那位匈牙利同學前去看他做什麼。匈牙利同學去了，他們在距離我兩三米的地方低聲講話，也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一會兒，那位匈牙利同學回來對我說：“那個蘇聯軍官想請我們替他拍個照。”

我那位匈牙利友人對那個蘇聯軍官說：“我不會拍照，你還是找那個男子（指我）拍吧。”那個蘇聯軍官說：“那個人是中國人吧，我可不敢找他。”那位匈牙利同學對他說，我不是中國人，他才敢放心前來對我說明來意。我替他拍了照片後，不禁好奇地問那蘇聯軍官：“你看到我很像中國人，好像很怕的樣子，究竟是什麼原因？你是軍官，我不過是個學生，中國人有什麼可怕？”他說：“不，中國人確實是可怕的。我對中國人的事情了解得很多。我曾經在中國作戰，我的經驗是中國人非常可怕。”我再問他，中國人什麼地方令人可怕，他說亞洲人做事情，要末不做，一做起來就要幹到底。（笑聲）這個蘇聯軍官說話倒是很爽直的。

原田：我們外出時，無論在電車上或公共汽車上，也無論是大人和小孩，都對我們從頭頂一直看到腳尖，而且是惡狠狠地死盯着。他們一面看，一面還不斷地問：“你是中國人嗎？”我們說：“不是。”但他們還不放鬆，還要追問。有許多次，我們也惱火了，大聲反問他們：“如果我說我是中國人，你們究竟想把我怎樣？”這時他們不作聲了，但過了一會又說：“對不起，請問你究竟是哪國人？”我們說：“日本人。”他們立刻鄭重地道歉說：“剛才有失禮貌，請你不要見怪。”（笑聲）這才改變了敵視的態度。然後他們就和我們攀談起來。他們一開頭總是說日本的半導體收音機如何好，接着又說些其他的奉承話。

也有了解中國的人

足立：但是也有一些多少和中國接觸過、與中國人有交往的蘇聯人，對中國比較了解。他們稱讚中國人的勤勞、樸實、工作和學習態度認真的良好品格。這類蘇聯人，我也確實遇見過不少。他們談起中國人，總是稱讚中國人對人熱情有禮，決不像我們那位教師所誣蔑的中國人對人沒有禮貌。即使在莫斯科大學的教師中，也有一些人稱讚中國留學生認真學習和生活嚴肅的優良作風。

新谷：我記得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爭論中，中蘇兩國共產黨之間有不少往來文件和信件發表，其中中國給蘇共的信件，《真理報》只刊登過一封，其他的中國文件全部沒有發表，不讓蘇聯人民看到中國方面的見解。蘇聯人持有中國報刊文字，警察見到立刻加以沒收，並追問文件是哪裏來的，這就禍事臨頭了。

日本學生在外國學生當中，這一方面遇到的情況好一些。由於一般蘇聯人不懂這是“危險文件”，我們努力搜集到一些中國方面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論戰的日譯文本，把它珍藏起來，拿來和蘇聯方面的論文以及其他國家的論文對照閱讀，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來分析誰是誰非，這就能夠比較深刻地理解這場大論戰的本質了。

從中蘇論戰一開始，蘇聯就宣傳“中國的一切都壞”，但是在蘇聯的論文中對中國方面究竟哪裏不對，却說不出道理，更不敢擺出中國方面的論據來。蘇聯人根本無從看到中國發表的論據，也不敢去尋找中國的有關文件閱讀。蘇聯當局只憑大規模的宣傳機器，滿懷仇恨地詛咒中國，製造全國性的反華運動。蘇聯政府一面欺騙蘇聯人民，一面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在今天，蘇聯最害怕的，第一就是中國，第二是西德。至於美帝國主義，是完全當作他們自己人的。（笑聲）

蘇聯政府在國內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徹底地煽動反華情緒。前面說的紅場上的那個蘇聯軍官，見到旁邊

有一個看起來像是中國人的青年，就感到提心吊胆，惴惴不安，這正是蘇聯當局全面排華反華造成的大眾心理的具體表現。蘇聯政府的反華達到這麼瘋狂的程度，這樣的政府當然談不上是社會主義，它連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影子也沒有了。這樣的政府，還談得上用馬列主義的真理去探討雙方的分歧嗎？

四、赫魯曉夫下台及對這一事件的反應

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委

新谷：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下台了，當時莫斯科發佈這個消息時，一般蘇聯人的反應怎樣？各國學生和日本人怎樣看待這一消息呢？我們當時都在莫斯科，不妨談談那時的體驗。

足立：就當時我們所具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常識而言，對於當時所發生的一個接着一個的事件，如中蘇兩黨間關係的惡化，以及日蘇兩黨間關係到達最壞的情況，可說是完全沒有想到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日蘇兩國共產黨關於對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評價，發生了公開爭論。那時赫魯曉夫還未下台。但是，我們對蘇聯領導集團已經淪為現代修正主義這一點，已經有了清楚的了解。我們常常談起蘇聯今後會變成什麼樣的問題。所以，當赫魯曉夫被趕下台時，我們是非常高興的。

我們知道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內部矛盾不斷加

深，這促成了赫魯曉夫的下台。

作為蘇共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的赫魯曉夫，突然之間被免職下台，原因是所謂“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任何人都知道這種說法是虛偽的。這自然給人以非常陰森可怖的印象。因此，一般蘇聯人對這件事情的反應，是漠然無動於衷，一方面由於他們對政治抱有恐懼感，一方面他們根本就不相信蘇修中央委員會的話。這種政治上的不信任，也表現在他們對官方的一切公報，都採取冷漠的態度。只要是以黨中央名義發佈的東西，你說什麼就是什麼，即使和現實完全不符，他們也決不提出疑問，也不去深入思考。他們害怕與政治問題搭上關係，因為這是危險的事情。

這種情形，和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人對待大本營發表的公報一樣，誰也不信那些公報。即使知道公報裏有些事實大有疑問，也不去追問。因為那是一般人不應該知道的。這就造成人民大眾對政治普遍不關心。相反，謠言、內幕消息流行起來，帶有諷刺性的政治笑話廣泛傳播，這是人民表現出來的一種反抗。

報道赫魯曉夫下台的前後

新谷：從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的發生，到赫魯曉夫下台這段時間內，蘇聯政府的態度可謂囂張一時。

對待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反修力量，蘇聯政府一律予以猛烈打擊。日本學生已預料到在短期內必然會受迫害。

十月十五日晚上十一時，南美圭亞那學生從英國廣播中，首先聽到赫魯曉夫被撤職和繼任人是勃列日涅夫的新聞。他們立刻來到日本學生住處說：“你們聽見了嗎？赫魯曉夫被免職了。”當時我們對這個消息是否正確，一時還難以證實。第二天一早，我們找《真理報》看，發現什麼政治消息也沒有，只是紀念某作家誕生若干周年的新聞。

這天的《真理報》，已經顯得很奇怪了，因為沒有任何關於赫魯曉夫的消息和照片。平時的《真理報》，每天必定刊出赫魯曉夫的照片，如赫魯曉夫上一天在哪個工廠視察，到哪個集體農莊訪問等等。這類新聞照片，差不多天天都有。電視也幾乎每天都是清一色的赫魯曉夫的活動。甚至戰時他在烏克蘭戰線工作的舊新聞紀錄片，也重新搜集出來加以剪輯放映。還有奇怪的事情，十五日這天晚刊的《消息報》（蘇聯政府機關報），竟沒有出版。

失魂落魄的蘇聯學生

新谷：那天的情形確實奇怪。到夜晚十二點鐘以後，赫魯曉夫被免職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全大學的宿舍，

只聽見從宿舍裏傳出歡呼聲，當時真是熱烈極了。一些蘇聯教師和學生，認為我們都是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是中國派，對我們非常敵視。和我同房住的蘇聯學生，一向對我態度冷淡。但是，赫魯曉夫下台後，這些蘇聯人的表情無不茫然不知所措。一提起政治問題，他們更是顯得格外厭煩，簡直像丟了魂一樣。

第二天早上，外國學生都到飯堂，大家談起赫魯曉夫的種種倒行逆施，不禁再次歡呼，並互相握手祝賀他的垮台。

除蘇聯學生無所表示外，親蘇聯的外國學生中，印度和阿拉伯人較多，他們的表情也很尷尬。這天不少日本和南美學生上街時都到書店去，大家想到赫魯曉夫一垮，他的書籍可能被禁止出售，所以想趁早買一兩本赫魯曉夫選集。但是我們走進書店尋找，已經找不到任何赫魯曉夫的書了。不僅如此，赫魯曉夫的像也從莫斯科各個角落一齊失蹤。

赫魯曉夫被免職後一個時期，蘇聯國內相當混亂。對於新政權採取什麼路線，大家都感到興趣。到了這一年的十一月七日，即十月革命紀念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從北京飛到莫斯科，對蘇聯方面說：“改變路線，改變赫魯曉夫那一套作法。現在是回到正確道路上來的時候了。”那時，米高揚却說：“蘇共路線決不改變，今後蘇聯的政策，將貫徹蘇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一次、二十二次

代表大會制訂的方針。”

佐久間：正是那年的十月革命節，我們到“紅場”去，看到了周恩來在列寧墓上向人們招手。

新谷：我們在莫斯科的外國學生，通過討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台，並不是蘇共黨內不同路線的鬥爭，而完全是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赫魯曉夫下台後，修正主義路線的本質不會改變。

原定這一年十二月舉行的國際共產黨會議的籌備會議流產了，決定延遲到一九六五年三月舉行。這個針對中國的會議，原是赫魯曉夫竭力提倡要召開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權上台後，即宣佈仍要召開這個會議，只不過將會議延期。這就清楚地表明，新政權和赫魯曉夫執政時，並無本質上的差別。

對於蘇修新領導集團，日本宮本集團的看法是：“蘇共已經發生了改變，赫魯曉夫時代的壞事，現在變好了。”但是，在莫斯科的日本學生，却不同意宮本這種看法。我們認為，蘇聯新政權比赫魯曉夫更壞。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快速度地、粗暴地推行政策，而是非常緩慢地、有周密計劃地、隱蔽地逐步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認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權發生了變化的人，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類似宮本集團這樣的判斷，完全不符合蘇聯的實情，是絕大的錯誤。

由赫魯曉夫下台引起的校內動蕩

足立：赫魯曉夫下台後最初一個時期，學校的蘇共黨委會內部，舉行了幾次真相報告會。我們的政治經濟系主任，也給我們講了一點有關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各民族友好大學是赫魯曉夫建議開辦的，他下台後，我們的大學是否繼續辦下去，包括教師、學生在內，都表示關心。我們那個政治經濟系主任說：“赫魯曉夫的被免職，並不是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而是政治上的重大失敗。像《真理報》寫的那樣，那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事實上那是在撒謊。”他接着又說：“赫魯曉夫雖被免職，各民族友好大學不會垮。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前，預算已經決定了。大學校舍還要擴建。大家可以安心讀書。”這個系主任是大學黨委會成員，他說大學繼續辦下去，自然是可信的。

事實上，說赫魯曉夫因為年老和生病而下台，誰也無法相信。只要看看當時凡是和赫魯曉夫關係密切的人，都一股腦兒被解職，就知道這事的背景。當時的《消息報》總編輯阿朱別伊（赫魯曉夫的女婿），和《真理報》、廣播和電視局等所有宣傳機構的負責人，以及赫魯曉夫的親信，全部被撤職，理由是“工作上的過失”，這就顯示這次赫魯曉夫下台，是內部爭權奪利

的結果。

赫魯曉夫下台的第二天，我們上課時，碰到這樣一個有趣的事情：過去上課，教師老愛拿着一份《真理報》，一面引用赫魯曉夫這樣說，赫魯曉夫那樣說，一面進行教課。這一天，這位教師也拿着一份報紙，這回却說赫魯曉夫這一點犯了錯誤，那一點也犯了錯誤。一夜之間態度完全變了樣。（笑聲）

原田：例如教我們經濟學史的教師，這天就沒來上課。我們想，他可能是由於不能一下子就說出他過去講的課都是錯誤的，出於這種良心上的自責而沒有到學校來。我們覺得，這還是有良心的人。第二天，這位教授到學校來了。他對圍着他的學生們說：“說老實話，昨天早上起身，聽到赫魯曉夫被免職，我就沒有到學校來，而直接到科學院去了。請求發還我寫的學術論文，然後化了一整天時間把論文中引用赫魯曉夫的話全部刪掉了。”他之所以這樣作，就是要顯示他是一個頭腦轉得多麼快，又是多麼地不落後於潮流而值得自豪的人啊！這樣從他身上，你就是怎麼樣也找不出一點點作學問的良心來。

完全投降了的宮本集團

原田：一九六四年的七月起到十月中，也就是日蘇

公開論戰開始到赫魯曉夫下台，是日本學生心理上最緊張的時期。但是實際上，在莫斯科工作的日共黨員，由於執行日共中央的路綫而被蘇聯免職強制送還日本的，還是赫魯曉夫下台以後的事。宮本集團對這些事完全了解，但是却以“赫魯曉夫下台後，蘇聯已經發生變化”為理由，宣傳“蘇共變好論”。從這一點看來，這正是日修宮本集團向蘇修“投降”的先兆。

一九六四年的“五一節”事件

佐久間：一九六四年確實是多事之年。這年“五一”，我們學校中發生了“五一事件”。當時大學當局下令全校學生必須在“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口號下參加慶祝游行。我們拒絕在這個口號之下參加游行，要求各個隊伍攜帶自己的標語口號參加。但是學校方面非常頑固，一定要照學校當局的指示辦事。“五一”的前一天，校長緊急召見全體日本學生，他說：支持部分禁止核試條約是蘇聯政府定出的口號，你們對此不滿意的話，就不許你們參加節日游行。你們這些人都是“好戰主義者”。

所謂“好戰主義者”，在蘇聯政府看來，就是“美國軍部中一小部分狂人，西德復仇主義者和中國派”。現在校長把我們也列為“好戰主義者”，這是最嚴重的罪名，如果是蘇聯學生，一定會被嚇得發抖。

之後，日本學生會立刻召開臨時大會，提出這個問題讓大家討論。會議作出決議，參不参加節日游行，可以根據每個人的意願自己決定。但是作為日本學生會這個團體則決定拒絕在蘇聯規定的口號下參加“五一”的慶祝。

到了“五一”這天，除了僅有的一個日本人為了拍照才跟着游行隊伍行進外，全部日本留學生都抵制了這次“五一”游行。其實，不只是日本留學生，其他外國學生也極少人參加，因為大家都對蘇聯當局強迫別人一定要擁護部分禁止核試條約的行徑，起了反感，凡是採取正確政治立場的學生，都拒絕參加這次節日游行。就是親蘇派的學生也是稀稀拉拉的。因為那些具有修正主義傾向的人，往往都是政治覺悟很低，很不願意參加政治活動，而只關心與他個人有關係的事。這種傾向，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學生表現的都很突出。因此，雖然派來了很多運送參加游行人員的大汽車，但卻空空蕩蕩的没人去坐。

事後，大學當局却責怪日本學生煽動其他學生不参加，對日本學生進行了迫害和處分。這次“五一事件”，是日本學生和大學當局的重大政治衝突的第一回合。

瞪着眼睛撒謊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

原田：蘇聯修正主義的特徵之一，是以撒謊為家常

便飯，赫魯曉夫被免職，說他因年老和健康不佳，任何人都一眼看穿是個彌天大謊。而蘇聯當局居然將謊話當作官方公報發表。

佐久間：厚顏無恥，瞪着眼睛撒謊，是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慣常手段。例如這次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却硬說是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部分領導人的“邀請”才出兵的。誰都明白，捷克斯洛伐克沒有任何人“請”蘇軍侵略自己的國家。蘇修硬說人家“邀請”，這不是最大的謊言麼？但是，蘇聯不少人因為無從得知其他的情報，居然相信了這種說法。

學校當局對學生施加壓力

足立：赫魯曉夫在任時，蘇聯學生的態度也是神氣活現的。但是，赫魯曉夫一夜之間垮了下來，那些目空一切的蘇聯學生，不知道為什麼，也完全喪失了自信。有些人悄悄跑到我們身邊問我們：“有什麼消息嗎？世界局勢和中國現在的情況怎樣？你們有這方面的資料嗎？借給我看看好嗎？”由於他們不懂日文，不能在我們的房間看，我們便將珍藏的英文版《北京周報》借給他們悄悄地帶回去。

佐久間：赫魯曉夫下台前後，我們大學宿舍裏的外國學生珍藏着各國語文版的《北京周報》。學校當局對

此防範很嚴。例如宿舍的管理人員、班級主任教師，就對外國學生進行監視。他們在學生到了課堂上課後，便擅自開鎖進入各學生房間檢查，看看有沒有中國書籍雜誌。不僅如此，學校當局還公開威脅學生不許藏有這類書籍文件。學校當局還對外國學生進行思想調查，由於遭到全體外國學生的強烈抗議，並和校方進行了多次鬥爭，後來學校才被迫取消了思想調查。

原田：這也算作是國際反修鬥爭的重大成果。他們在學生離開宿舍時，隨意進入房間，打開木箱，拉開書櫥，進行搜查。他們系統地記錄學生在各個場合的發言，以斷定這個學生是不是“中國派”。如果被看作是“中國派”的話，各方面的壓力也就來了。

在我們學校裏，調查學生思想、行動的機關有三個系統。一個是屬於秘密警察系統，一個屬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調查局系統，還有一個直屬於蘇聯外交部的系統。各個系統各自安插若干名職員和特務，嚴密監視學生的動態。他們最重視的是，大學內的學生是不是親華，凡是被認為屬於“中國派”的學生，就會受到更加嚴密的監視和盯梢。美國駐蘇大使館也僱用學生幹特務工作，這是學生自己揭發出來的。美國特務被揭露後，大學當局也只好將特務學生遣送回國。

足立：可能我的話有一點離題了。像這次赫魯曉夫下台，使我進一步認識到，在蘇聯，對人民羣衆是創造

歷史的動力這一個觀點，非常缺乏。例如，赫魯曉夫下台這個問題，蘇聯當局就不敢向人民交代赫魯曉夫究竟犯了什麼錯誤。要是真正信任人民羣衆的話，就應把赫魯曉夫的錯誤公佈出來，讓羣衆去討論，這才是正確的做法。又例如，對斯大林的批評，也是亂罵亂咬，把斯大林攻擊得一無是處，但是他們却拿不出半點對事物的科學分析，更是講不出道理。

還有我們大學的學生問題，例如許多學生不上課，學校當局也是採取非常機械的、粗暴的行政措施去對付……

佐久間：對付不上課學生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削減獎學金了。

足立：在我們看來，爲什麼某些課程，學生上課率非常低，就應該在學生中間調查、分析，然後加以改進。上課率低的根本原因，是學生對那一門課程不感興趣。其次是蘇聯大學硬填硬塞式的教育，每天上課六小時，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周就是三十六小時，又不許學生選課。學生對這樣的教育制度非常不滿，但是學校當局在心目中完全沒有羣衆，只是一味用行政手段壓迫學生，用高壓來迫使學生就範。

佐久間：各國的黨就中蘇論戰問題所表現的不同態度，對我們是非常大的教訓。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蘇修的做法就是對於中國方面所說的一切，完全不讓蘇聯人

民知道。有些蘇聯人偷聽北京廣播或設法弄到中國出版的文件，就要受到當局的殘酷迫害。蘇聯人民只能知道修正主義集團的論調。

中國方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在重大事態發展的時刻，它的態度是怎樣的呢？首先，中國把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論文，一篇接着一篇在《人民日報》等各種報紙上發表，讓人民大眾對這些論調進行討論，到一定時期以後，中共中央才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這是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貫採取的態度，這是根據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鬥爭，必須使廣大羣衆都能懂得這個原則。放手讓人民大眾去掌握真理，這才能使羣衆堅決相信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態度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正確，對比之下顯出蘇聯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從而堅定了自己對這兩條路線鬥爭所採取的態度。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戰，是關係到人類歷史向哪一個方向發展的極端重要的大事，但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却完全以街頭上的無賴的態度來對待這個嚴肅的問題。

原田：蘇聯當局慣常使用國家的權力來對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這一場論戰，其結果只能是暫時地剝奪了蘇聯人民說話的權利，壓制了國內人民的意見，但是外國共產主義者的嘴巴是封閉不了的。在這種情況之下，

無論怎樣也不能避免引起大論戰。

在蘇聯國內，由於當局長期以來忽視了理論鬥爭，加上蘇聯共產黨領導部門的理論水平非常低落。蘇共從論戰一開始，就無法在國際舞台上立足，它的一套理論經不起中國方面的一駁。最後，蘇共唯有拚死地利用國家權力和高壓手段，千方百計阻止中國正確的革命理論的傳播。

思想鬥爭和修正主義

佐久間：如何發展思想鬥爭，就是將正確的意見和錯誤的意見進行對比，通過討論、思考等思想上的鬥爭，結果真理必然戰勝錯誤，馬克思列寧主義必然是在鬥爭中經受了鍛煉而發展起來。經不起鬥爭，把它放在育嬰器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能是官方製造的“馬列主義”，是假馬列主義。蘇聯修正主義的腐敗，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當中蘇兩黨面臨重大的問題時，我們看到的是兩種根本對立的立場。

從這一點看，日共官本修正主義集團，今天和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對這一場論戰，採取了同樣的態度，即不許大家閱讀中國的出版物，不許聽中國方面的辯論。誰讀了就被開除出黨，誰聽了就受黨紀處分。這是滑稽透頂的事情。蘇聯修正主義已經取得了國家權力，擁有國

家統治機器，所以它用暴力統制言論並非完全無效。宮本集團還沒有取得政權，就依樣畫葫蘆，運用蘇修的一套，對黨員實行高壓，好像它已經取得了政權一樣。

問題在於，必須把真理交給羣衆，讓人民羣衆去了解，取得人民羣衆真正信任。相反，蘇修、宮本集團，他們對自己的路線就缺乏信心，只能憑藉權術，把自己的路線強加於人。

足立：從這點出發，修正主義必然成爲唯武器論者，因爲它們不重視人以及人的思想。結果，在戰爭問題上他們就是唯武器論，在經濟領域裏，就是物質刺激。

佐久間：這就是經濟主義！

足立：正是如此。

佐久間：現在蘇聯當局宣傳它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和創造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却根本拋棄了進行思想鬥爭的觀點，這是決定性的重大問題。人的思想如果變了質，腐化墮落，只剩下一些國家機構，無論怎樣改變這些機構，也決不會帶有社會主義發展的性質。從蘇修現在的狀態來看，它早已離開了社會主義。如果指望“物質刺激”、“追求利潤”這一套法則也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話，那麼，今天的日本和美國，早該進入共產主義了。（笑聲）

新谷：資產階級總是要通過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它的世界觀的，不讓它表現是不行的。只有讓它表現，表現出來以後，就要加以批判。不採取這種態度，也就無從批判。正確的理論，必須經過對不同意見和錯誤見解的論爭，才能鍛煉出來。蘇聯今天沒有思想鬥爭這種觀點，所以它的理論水平非常低，也非常脆弱。

報紙是兩黨關係的晴雨表

新谷：蘇聯本來是進口各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刊的，並准許在國內公開發賣。但是，中蘇論戰一開始，北京的《人民日報》就不准進口了。日蘇兩黨關係一惡化，《赤旗報》也就不見了。

佐久間：到我們回國的時候，法共的《人道報》、意共的《團結報》、南斯拉夫的《戰鬥報》，都不准進口，因為發生了蘇軍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這些黨都是反對蘇聯當局的侵略行為的。

原田：古巴的《格拉瑪報》也不准進口。

佐久間：《格拉瑪報》很早以前就不許進口，後來古巴表示支持蘇聯當局對捷克問題的政策以後，最近是否又恢復進口，則知道了。

新谷：我們大學原訂有《赤旗報》三十份。當中蘇論戰激烈化時，《赤旗報》一度轉載過一些中國的文章，

但是凡是載有中國文件的《赤旗報》，一概不許進口（笑聲），因此我們訂的報紙從來不是天天收到的，總是像拔掉牙齒一樣，缺口很多。

佐久間：我們一發現哪天的報紙不送到，就知道這天一定刊載重要文章，真是一猜就着！（笑聲）

原田：逢到缺報的那天，我們就記住日期，想法子從別的途徑去找，果然發現載有非常重要的文章。到後來，缺的報紙越來越多，蘇聯當局就減少我們的訂報份數，從三十份減到五、六份，這就更加不能滿足需要。到後來，連日共的論文，蘇聯認為不滿意的，也不許送報，最後索性全部停止派送。代替的是，從一九六四年八月底起，蘇聯當局把叛變日共的志賀義雄辦的《日本之聲》刊物，拿到學校裏派給我們。

過了一定的時間，日共漸漸趨向修正主義，蘇聯當局又恢復向我們送報，《赤旗報》又來了。這真是判斷蘇聯對各國以及日本的黨的態度的非常準確的晴雨表。

足立：那是從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起的事情。

新谷：宮本集團和蘇修之間，越是勾得緊，我們得到《赤旗報》的份數就越多，缺報的事情就沒有了。

佐久間：到我歸國的時候（一九六八年夏天），《赤旗報》在蘇聯從未被限制進口，天天都有報紙送到。

按政治風向招收外國學生

新谷：我們在莫斯科讀書時，大學當局招收日本學生的手段，也和對待《赤旗報》的方式一樣，出現了非常有趣的現象。蘇聯當局完全以政治風向來對待日本學生。最初，從一九六〇年起到一九六三年，日本留蘇學生大體上由“日蘇協會”推薦，或者由蘇聯方面認為有資格的個別日本人士介紹，就可以到蘇聯留學。但是，當日蘇兩黨關係惡化時，“日蘇協會”的推薦就不再被接受，必須由“日蘇交流協會”、“日蘇親善協會”等機構的介紹，才被接納。再以後，連“日蘇交流協會”的推薦也不靈了，必須由叛徒志賀義雄的“日本之聲”出面介紹或社會黨的推薦，才准赴蘇聯留學。

因此，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一段時期，和一九六四年以後時期的日本留蘇學生，其政治質量是截然不同的。在“日本學生會”的內部，日本學生之間也截然分成兩派，形成激烈的政治對立面。

民族友好大學的日本留學生

從一九六五年夏天起，“日本之聲”選派的人，陸續到了莫斯科。當時“日本學生會”的領導，掌握在“代代木”

派的手裏。爲了向“代代木”派奪取日本學生會的領導權，蘇聯當局事先特別向“日本之聲”的志賀義雄叮囑，要求先派一批有鬥爭經驗、“身經百戰”的年青打手（笑聲）到蘇聯去。不僅如此，蘇聯當局還特別照顧“日本之聲”選派的學生，連他們的老婆、兒女也一起送到莫斯科去，由蘇聯供給食宿，真可謂招待周到了。一兩年之內，在民族友好大學，“日本之聲”派來的學生就達十幾人，他們對蘇聯當局一呼百諾，在日本留學生中做搗亂、破壞工作。我們堅決和這些敗類進行激烈的鬥爭。直到我們回國時，“日本學生會”的領導權始終未被修正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篡奪。

新谷：蘇聯當局對日本政黨的態度，也是忽親忽疏，忽好忽壞。它對日共，由於日共反對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兩黨關係惡化，這時志賀一派出頭叛變，這一來和日共的關係更加惡化，且終告決裂。此後，蘇聯當局又拉攏日本社會黨，對它大獻殷勤。這時，恰好中國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日本社會黨中的左派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使蘇聯當局十分震驚。於是蘇聯當局又回過頭來和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破鏡重圓，共同進行徹底的反華活動。到了現在，只要他是反華的，蘇聯和任何人都可以携起手來。

但是，蘇聯當局目前似乎並不太熱心於只和日共或社會黨搞好關係了，蘇聯當局目前對日本的哪些人最鍾

情呢？而是政府和自由民主黨。由於蘇聯需要借外資開發西伯利亞，和有其他種種問題，它現在最大的目標就是討好日本反動派，共同反對中國。蘇聯政府領導人不止一次地向佐藤發出邀請，請他在認為方便的時候到蘇聯訪問。蘇聯和日本之間還有一些懸案未決，兩國和約還未締結，但是當前蘇聯先要求和日本締結日蘇文化協定、交換留學生協定等。不久的將來，自民黨和政府派的留學生就要進入莫斯科的大學了。

“親蘇派”各國留學生正在增加

佐久間：現在，不僅日本的留蘇學生被蘇聯當局不斷清洗，日本以外的各國留學生也都是一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開始以前和開始以後，各國學生的情況都有了很大的變動。原本在民族友好大學讀書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學生，在人數上大體保持平衡。大論戰發生後，支持蘇聯路線的國家的留學生多起來了，不支持蘇聯路線的國家的學生則不再繼續招收，原有的也被開除出校。拉丁美洲國家，除了智利和阿根廷以外，其他國家的學生多數支持武裝革命鬥爭的路線，這就引起蘇聯當局的不滿，所以在招收新生時，只有智利、阿根廷的學生大幅度增加，其他國家的均受到限制。

非洲國家的留學生，由於他們的祖國多數還沒有建

立馬列主義的黨，政治上還存在着一些缺點，但是他們作為新興的獨立國，保持着反帝反殖的年青朝氣，多半具有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傾向。所以，他們也就不為蘇修所喜。特別是他們的皮膚，在蘇聯國內存有種族偏見的人看來，仍加歧視。非洲學生常常因為被歧視和某些蘇聯人衝突。蘇聯當局對他們很感頭痛，但是又要拉攏非洲國家，不敢對他們怎樣迫害。我們大學的阿拉伯國家的學生，原來都是親蘇的，也非常受到蘇聯當局的誇獎。可是到以色列發動侵略中東戰爭後，他們目擊蘇聯出賣阿拉伯人民，和蘇聯的關係稍為冷淡了一些。現在和蘇聯關係最好，派大量學生到蘇聯留學的，除智利、阿根廷和阿拉伯國家外，還有印度和塞浦路斯。

這些國家的學生就是所謂“親蘇派”。其中少數人，為了個人利益，甘為蘇修利用，對蘇修拍馬諂媚。

新谷：這種人已經墮落成街邊賣假貨的騙子了。

佐久間：但是，蘇聯當局却非常喜歡這一類人。近來印度、錫蘭和除印尼以外的東南亞國家派到蘇聯留學的學生增加了。這些學生和左派、進步組織毫無關係，絕大部分是由政府派出的留學生，許多人出身於大資產階級、貴族，思想非常反動。他們到蘇聯來，不讀社會科學，專讀理科工科，一部分人選讀文科，或人文科學。那是根據本國政府的方針選讀的。正好，蘇聯也討厭那些關心政治或社會科學的學生，在這一點上，蘇聯

也算是走運了。

但是，蘇聯對於那些希望學習馬列主義，為祖國解放事業而鬥爭，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傾向採取稍加批判的學生，動輒加以無情的打擊。我們從切身體驗中了解，蘇修領導集團衡量某一組織或個人，不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看他們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而是用所謂“反蘇”和“親蘇”這個尺度來決定其為敵為友的。對方即使是反動透頂，只要他今天“親蘇”，蘇聯就把他當做朋友，熱烈地和他擁抱。相反，對方階級立場正確，只要對蘇修領導集團的觀點稍加批判，就會被他們目為敵人，全力攻擊，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蘇修領導人這種態度，形成他們的一個特徵。

新谷：對今天的蘇聯修正主義領導來說，凡是對他們拍馬、諂媚的人，都被他們看作是親密友人。他們竟然以別人對他們是否拍馬、諂媚來判斷對方。相反，不拍他們馬屁，就不為他們所喜，就被他們貼上一個“反蘇”的標籤。實際上關於所謂“反蘇”問題，我們在蘇聯真是看得多了，例如那些批判斯大林影片如《晴朗的天空》、《生與死》、《靜寂》等，才是不折不扣的反蘇電影，現在那一小撮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才是真正最大的反蘇的罪人。正是他們把蘇聯大好的社會主義制度糟蹋得不成樣子。他們藉口批判斯大林，斷送了社會主義的江山。

原田：正是如此，一手葬送蘇聯十月革命成果的這些傢伙們才是反蘇的真正罪魁。

志賀一派的末路

新谷：對蘇聯領導集團諂媚的人，到最後也不見得有好下場。叛徒志賀義雄一派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我們日本學生中，有一個人曾被志賀一派收買，他立刻和蘇聯當局勾結，對日本的革命學生策動迫害。接着大量的“日本之聲”系統的人馬被送進大學來，這些志賀派的人後來怎麼樣了呢？

這些人是死心投靠蘇聯當局的，他們以盲目地服從蘇聯修正主義集團，作為自己的思想和信條。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狂熱地吹捧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照理說，該是蘇修當局最親密的朋友了。但是，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對於志賀一派，不過是當做一種一時一事的政治工具使用而已，利用價值一完，就立刻拋在一邊。當志賀一派的人為了適應蘇修當局破壞日本學生團結的需要，而被派到蘇聯時，他們神氣活現。“日本之聲”對此大肆宣傳，在他們出發時，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由神山茂夫（日共叛徒）之流親自主持。這些人在大吹大擂聲中來到了莫斯科。

他們一來到我們大學，立即把一名日本學生收買。

他們又在“日本學生會”中猖狂地搞分裂活動。例如學校當局準備邀請日本駐蘇大使中川到學校來訪問的問題，在學生會上提出討論時，絕大多數日本學生反對，主張和蘇聯校長交涉。這時“日本之聲”的學生却上演了與蘇修當局爲虎作倀的活劇。在會議上，他們狐假虎威地代表蘇修當局恫嚇說：“你們如果反對蘇聯的安排，就立刻停學回日本好了！”但是他們沒有料到這種認賊作父的作法，極大地觸怒了絕大多數日本學生。他們充當蘇修當局的走卒太露骨了，當場遭到日本學生們的總反擊，使他們的醜惡面目畢露。

可是不過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局面又有了新的變化。第一，“日本之聲”那一伙人，開始對蘇修當局拙劣的官僚主義作風也感到不滿和反感。他們儘管事事聽從蘇修，奉承諂媚，却發現主子並未給他們以應有的待遇。他們從早到晚碰在一起，就互發牢騷，不滿蘇修。第二，“日本之聲”不過是志賀修正主義者搞的一個組織，拿不出理論體系來，只是唯蘇修之命是從，做應聲蟲。但是蘇修當局的政策今天這樣，明天那樣，不斷變換，他們跟着蘇修轉，時時感到不能自圓其說，陷於不利的境地。第三，“日本之聲”發起人做夢也沒有想到，蘇共修正主義集團又和宮本集團的關係恢復和好。這一來，“日本之聲”這一伙人就進入了死胡同，蘇修再也不重視他們。這時他們之中不少人就發表長篇聲明，宣佈脫離

“日本之聲”了。

宮本一伙的轉變方向

佐久間：現在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是完全靠不住的，是不能寄以任何希望的。我們從中得到了切身的體驗。但是，宮本集團完全無視蘇聯的現實，對蘇共修正主義領導人卑躬屈節。這就注定要走上和志賀同樣的命運。

原田：特別是最近兩三年，宮本集團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深深陷入現代修正主義的泥沼。在莫斯科的革命學生和宮本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激烈，發展到組織上也必須分裂的地步。

我們前此所說的蘇聯的種種現實，是修正主義帶來的禍害。在莫斯科的日本學生對此從理論到實踐都有很深的體會。但是仍有一些人在組織上追隨宮本修正主義。可以肯定，這一伙人的最後命運必將落得和志賀一派同樣的下場。當宮本集團開始和蘇修恢復和好的時候，他們下令不許批評蘇聯的現狀和蘇聯修正主義，要求徹底執行命令，對蘇聯一概不准加上“修正主義”的字樣。

這樣一來，追隨宮本集團的那些人立刻閉口不談蘇修了，而且制止一般學生對蘇聯修正主義提出具體的批

評。宮本一伙人的態度一變，就顯露出他們自己的真面目。

被外國學生拋棄的宮本修正主義的路綫

佐久間：有一天，我們大學的俱樂部放映電影，那部影片的內容實在惡劣，連半點社會主義的影子也沒有。電影映完，各國學生在回到自己宿舍的路上，談起了這部影片，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我也故意慨嘆地說：“想不到蘇聯修正主義在文化上墮落到這種地步了。”一個非洲同學立即說：“你們還有什麼大話可說，你們的黨的和平過渡不也是修正主義路綫嗎？”

這些非洲學生的祖國，還沒有創立共產黨，但是他們通過許多具體事實，也能分辨得出真革命和假革命，用現在日本通行的話來說就是：“修太郎（老修）啊，大話少說吧！”我們當時聽到非洲學生的話，感覺到非常可恥。回到宿舍中，倒在床上仔細玩味這句話。自從宮本集團變節以後，在從事反帝反修鬥爭的各國學生看來，日本人已經成為蘇聯修正主義的朋友了。

在我們大學裏，有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學生，他們的理論，在我們看來雖然仍有很大的問題，但是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普遍主張堅持武裝鬥爭。他們說，革命就是

武裝鬥爭，就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是完全正確的。他們一般都有很高的革命情緒，士氣旺盛，行動積極。

因此，來自拉丁美洲的學生，經常和蘇聯修正主義當局發生衝突。他們斥責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和平競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是背叛革命的謬論，並和它正面地進行鬥爭。

宮本集團和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和好以後，《真理報》上常常轉載《赤旗報》的社論和文章，拉丁美洲的學生也看到了。他們非常生氣地對我們說：“日共最近開始強調和平過渡了，這種修正主義的論調，經過這幾年來的公開爭論，誰都能一眼看穿。”

我們對宮本的路綫完全墮落成修正主義，是有所了解的。我們也打算貫徹反修路綫，但是，我們和宮本在組織上還存在着聯系，即使心中明白外國同學的批評是正確的，但在國際場合却不能說。我們只是一再地深思。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對我們開始露出微笑，但是過去和我們一起從事反帝反修鬥爭的各國革命學生，却開始對我們厭惡了。我們迫切地感到，不和宮本集團從組織上決裂，就要被世界革命人民所拋棄。

同現代修正主義決裂

原田：從一九六七年九月起，在莫斯科的日本革命

學生，在組織上和宮本集團決裂了。這一年的暑假，對於我來說，實際上是大學生活的最後一次，因為就要畢業了。我利用這個假期到東歐國家去旅行了一次，當我在匈牙利布達佩斯逗留時，一位外國同學告訴我發生了“北京機場事件”，那是日共中央駐北京代表砂間一良和《赤旗報》駐北京記者紺野，盲從宮本集團，完全背叛了革命，在北京進行反華勾當，被中國革命羣衆怒斥的事件。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八月底我回到莫斯科，發現氣氛有點異樣。暑假期間，在蘇聯各地留學的印尼學生，大批集中到莫斯科來了。問他們爲什麼這樣？他們說，蘇聯和蘇哈托—納蘇蒂安政權關係這樣密切，再不能在蘇聯留下去了。他們準備到中國去。當然，印尼學生內部也有少數人背叛祖國，忘記革命，只求個人安全享樂，而長期住在蘇聯的。因此，印尼學生內部也發生了激烈的鬥爭。

他們定九月六日自莫斯科出發。我當時也想和他們一起到北京，但是時間太匆忙，辦手續來不及，而且我還有許多事務需要在莫斯科辦，去中國的念頭就此擱了下來。在蘇聯，九月一日是新的學期開始。八月底來自日本的新學生陸續到達莫斯科，需要照顧他們，在他們辦理入學手續時做做翻譯，舉行歡迎會等。九月中旬，日本學生會職員改選，我也需要做些工作，再以後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我們在迎接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時，在日本學生中間廣泛組織了“十月革命意義學習會”，深刻、徹底地討論列寧指出的“十月的道路”的真髓和精神，拿它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本質對照，討論蘇聯現在究竟是走着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問題。由於我們生活在現實中，對蘇聯修正主義的種種醜惡事例，早有體驗，大家都對蘇修抱着強烈的不滿和反感。特別是在低年級年紀較輕的學生中間，反感更是強烈。他們認為，現代修正主義和無產階級，從立場看是敵對的，兩者之間絕對談不上共同行動和組成統一戰綫，要革命，除了走“十月的道路”以外，沒有別的途徑。

因此，一九六八年二月開始的日蘇兩國共產黨會談發表共同聲明時，在莫斯科的日本學生組織“民主青年”的大部分人的反應是：“日本共產黨被蘇聯共產黨欺騙了，我們不能受騙。”緊隨着共同聲明之後，《赤旗報》發表了“日蘇兩黨會談的意義”，許多“民青”的人都斥之為滿紙騙人的謊言，一脚把報紙踢開。

剛巧在這個時候，“日蘇協會”有個代表團來到莫斯科，他們說：“一九六七年夏天，從民族友好大學畢業回日本的學生中間，不少人熱烈支持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事很使人頭痛。”

“修太郎”壓制批評

原田：從這個時候起，隱藏在黨內有右的傾向的一伙人，突然一個個伸出腦袋來，他們向支部委員會提出激烈的質問：“你們對回到日本參加‘毛澤東派’活動的一伙人，有怎樣的看法？”又說“支部委員會的領導違反了黨中央的方針”。這一伙修正主義分子，甚至盜取回到日本的一貫堅持革命鬥爭的革命左派畢業生寄往莫斯科的信件，呈送宮本修正主義集團。

面臨這種事態，我始終堅持反帝反修的立場，並公開宣佈宮本一伙已經完全墮落成反革命和現代修正主義分子。之後，我們組織了《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學習會。宮本修正主義中央領導機關在這年的春天（一九六八年四月），派了修正主義官僚津金佑近和阪本英夫到莫斯科，他們也不管什麼組織原則，突然解散支部委員會，取消了莫斯科的學生黨組織。反對修正主義的學生黨員，被隨意開除出黨。我們堅決反對宮本修正主義分子這些破壞活動，保衛了先鋒隊——黨組織。支部委員會中背叛革命而墮落成宮本修正主義分子的，只有一個人。後來我也被宮本修正主義一伙開除了。其理由也很特別，據說是因為“原田幸夫對民主青年同盟的人說了既要革命就得豁出命來幹這樣一些狂言”。（笑

聲)

經過這次事件，在莫斯科的組織，左派也分裂了出來。我們同宮本集團從組織上明確地決裂後，就能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組織鬥爭。

例如，在學習會上討論政治問題、階級鬥爭時，修太郎們就提出：不要討論政治問題了。我們說：“我們一貫都是站在向日本人民鬥爭學習的立場上的。羽田事件也好，佐世保問題也好，以及正在進行激烈鬥爭的各種各樣的日本學生運動也好，我們都必須加以考慮。”他們無詞以對，便說：“把不同的政治意見帶到日本學生中間，其目的只能是分裂學生。”他們連這種太不像樣的話也說得出口。這樣一來，一般日本學生也認為修太郎是在胡說，而根本不理它那一套。修太郎就在羣衆中更加孤立了。

修太郎還說些什麼呢？他們說：“學生的本份就是在學校裏讀書，不可太多地過問政治。我們只要拚命學好專業，到時拿到畢業文憑，就算達到目的了。”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要把學生中存在的關心政治、關心祖國解放的高昂革命情緒壓下去。

每逢一般學生對蘇修領導集團的所作所爲和對蘇聯現狀進行批評時，修太郎們就說：“不對，你們的看法完全是錯誤的。”他們舉出一些根本不成其爲理由的“理由”，竭力替蘇聯的作法辯護。修太郎說：“蘇聯無論如

何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不會發生這類事情。”但是不管他們怎樣叫嚷，他們以為不會發生的事情，在蘇聯日常生活中不斷發生，這個現實，他們無論如何也是難以抹煞的。

結果，在莫斯科的官本修正主義一伙人癱瘓無力，絲毫不起作用，甚至脫離了修太郎的組織；另一部分人則變成非常殘暴的反動派，扮演特務的角色，妄圖使學生不關心政治，放棄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修太郎們怕被學生羣衆拋棄，頻繁地組織毫無政治思想性的郊游和旅行，妄圖博取學生的歡心，使他們只顧縱情歌舞而忘掉政治。

足立：一般說來，到蘇聯留學的外國學生，原本是帶有各種政治傾向的，但是他們通過在蘇聯實際生活的體驗，幾乎毫無例外地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所做所爲，提出了批評。也有人壓制這些批評。他們不但不批判現代修正主義，還要人們和它採取聯合行動，建立統一戰綫。現在官本修正主義集團正是起着這種作用。

原田：當北京的日本留學生奮起進行反修鬥爭的時候，《赤旗報》發表了一篇叫做什麼“學生黨員們學習吧！”和另外一篇叫做“住在海外的黨員做什麼”的兩篇社論。在莫斯科，當左派分裂出來的時候，修太郎們把這兩篇論文當作金字招牌打了出來，總是說“就照這個辦吧，就照這個辦吧！”總之，那個時候有些本來就不大願

意同修正主義進行鬥爭，想方設法逃避反修鬥爭的傢伙們，都趾高氣揚起來。

同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人民的團結大會

原田：一九六八年二月下旬，以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人為主，呼籲東南亞學生會共同計劃舉行一次“和美帝戰鬥的越南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團結大會”。他們的基本方針是要和修正主義分子劃清界限，開一個反帝反修的戰鬥的政治大會。

學校當局最初因為不知道集會的內容，馬上批准了在學校裏舉行集會，但是到了開會之前四五天，它知道了集會的內容，便說“為什麼不讓學校當局和共青團代表發言”。學校當局把會議主持者找去威脅說：“這樣的集會形式是民族友好大學開辦以來從沒有過的。你們是以客人身份來蘇聯留學的，還拿着蘇聯政府的獎學金。可是你們舉行集會時，却不邀請蘇聯主人，光是客人隨意集會。這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做法。既然不讓蘇聯代表在會上講話，就絕對不准你們集會。”民青的學生沒有屈服，並且明確地回答說：“我們是要和真正地同美帝鬥爭的人民攜手來幹的，蘇聯並不真正同美國進行鬥爭，所以我們不能和你們一起幹。”蘇聯當局照例說：“蘇聯正在援助越南。”青年們反駁說：“我們不把那種援助當作

同美帝進行鬥爭的證據。搞這種騙人的援助而裝出進行鬥爭姿態的傢伙，是修正主義者。”到了開會的時刻，雙方爭論還在繼續。這時會場已經擠滿了羣衆。這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空前擁擠的一次政治大會。首先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學生代表，一個一個地起立發表充滿戰鬥性、革命性的演說，整個會場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氣氛熱烈。可是到蘇聯共青團的代表上台講話時，全場沒有一個人鼓掌。等到大學當局的代表上台講話，甚至有人退席。

佐久間：因爲這個，學校當局還大發雷霆。

原田：如果談到在莫斯科生活中的體驗，可以說，按照宮本修正主義提倡的“和蘇修組成統一戰綫統一行動”的路綫，是絕對不可能進行戰鬥的。問題在於：是同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團結，還是和廣大的各國革命人民團結，只能在兩者之中擇其一。所謂宮本顯治的路綫，是一條和蘇聯修正主義者勾結起來，同世界反帝力量敵對的路綫。如果被認爲同蘇修是一丘之貉，那就必將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拋棄。

這次集會開完以後，大學當局立即把日本學生會的領導人找去說：“日蘇兩國共產黨剛剛發表了共同聲明。讓我們忘記過去的不愉快，今後大大加強團結吧。”但是學生會代表答非所問地說：“你說什麼？我們是日本學生會的代表，所以，日蘇兩黨的事情和我們毫無關係。”這

句話使學校當局爲之啞口無言。

政治笑話

和猪在一起……

赫魯曉夫在職期間常訪問集體農莊。有一天，在赫魯曉夫視察養豬場的時候，當地的記者給他拍了一張照片。照片洗好後在編輯部却發生了一場糾紛。引起糾紛的原因是因爲照片說明是這樣寫的：

“和猪在一起的赫魯曉夫同志。”

總編輯說：“把我們黨的領袖寫成和猪在一起，這不禮貌。”

於是乎編輯部門都絞盡腦汁考慮怎樣寫才好。有一個記者提出：

“那就寫成和赫魯曉夫在一起的猪，這樣行吧？”

因爲這個建議也不算高明，所以沒有被採納。接着又提出了許多各式各樣的建議，可是……

第二天，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上刊登了一幅很大的照片，下面的說明是這樣寫的：“左起第三個是赫魯曉夫同志”。

五、毛澤東思想和各國留學生的動向

毛澤東思想給各國學生的影響

新谷：聽說我們回國以後的這一年期間（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在留在莫斯科的日本學生黨組織的內部，也出現了左派分裂的現象。在各國學生中間，革命的左派團體一個接一個的組成。還聽到這樣的消息：不僅在民族友好大學之中，就是畢業回到各國的學生，也在他們的祖國紛紛成立了革命左派組織。

在這裏，我們要談談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和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是怎樣滲透到在莫斯科的我們日本學生和各國留學生中去的？

我常為檢查清潔而到各學生宿舍房間。一起檢查的，有蘇聯共青團的代表、宿舍的管理主任和大學當局的代表，加上我作為攝影記者，到各房間去看看。有些宿舍的房門是開着的，如果遇到鎖上的，宿舍管理人員有一副鑰匙，就打開門進去。……每一間房間住着三個人。幾乎我們進入的任何一個房間，總在什麼地方有毛澤東的像片。有照片，也有畫像，既有大張的，也有小

張的。蘇聯當局人員看不下去，罵一聲學生“這小子”，再到另一間房間去看，又發現有毛澤東主席像。如果只是少數房間有，也會有鎮壓的辦法，但是到處都有毛澤東像。這樣，它就不好下手干預，只得裝做看不見。在中蘇公開論戰非常激烈的時期，共青團作出了取締中國方面的文件的決定。但是外國學生當中，仍然有很多《北京周報》和其他中國方面的小冊子。可是，像剛才說過那樣，它沒有辦法。加上連蘇聯學生實際上也想看，所以取締不了。

驅逐非洲留學生事件

佐久間：有個非洲學生，接到一道命令，以他常到中國駐蘇大使館為理由把他開除出學校，並且限令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蘇聯。這個非洲同學和我是經濟系的同班同學。宣佈那道驅逐出境命令是星期天早晨。因此星期二早晨以前，他就必須離開蘇聯。星期一上課不久，這件事情就在全系傳開了，學生都說這樣幹還了得，紛紛聚集在經濟系大樓的入口處附近。

那個被開除的非洲學生是位誠實、用功的好學生，也是學校的優等生，平素得到大家的信任。為什麼現在要將他驅逐出境呢？大家都火了。連那些親蘇的學生，包括阿拉伯各國和智利、阿根廷的學生，都火了。大家

要求系主任說明開除這個同學的理由，羣情激昂。上課時間到了，學生們都拒絕進課室，一定要求解釋理由。經濟學系大樓旁邊有一間大禮堂，學生們蜂湧而入，坐滿了禮堂的座位，喊着“叫系主任來！”

系主任來了，學生一見到他即紛紛質問：“聽說學校開除非洲同學，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回答：“我什麼也沒聽說。”於是，學生又追問：“如果是事實，你怎麼辦？”學生們說：“他是優等生，他同那些馬馬虎虎的學生不同，他是一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態度認真的學生。完全沒有理由把這樣的人驅逐出境。他的畢業論文快寫完了，打算在大學畢業後進研究院繼續學習。是一個有學者素質的人。”

系主任答覆學生的追究說：“如果是事實的話，這實在是件遺憾的事情。正像大家所說的，完全沒有理由開除他。他馬上就要畢業了，我要設法至少把他留到畢業。”

原田：他還說：“要設法爲此而努力。”

佐久問：系主任後來到校長室去弄清楚把那個非洲學生驅逐出境的真相。因此，事實上，這天是等於罷課了。以非洲同學爲首，同學們還利用這個時間發動了簽名運動，追究這一事件的真相，要求在真相弄清楚之前，暫時延期執行把他驅逐出境的命令。因爲事情鬧得太大了，教師們也都停止講課了。

系主任一回來，大家又都集合起來。系主任說：“那個非洲學生因為常去中國大使館，散發中國文件，所以決定把他驅逐出境。”“你胡說什麼？”大家吵吵嚷嚷，鬧得像捅了馬蜂窩。“到中國大使館去有什麼不好？”系主任不得不說：“的確，到中國大使館去不能說是壞事。”

原田：學生們要求從法律立場來解釋這一點，法學系副教授答覆質問說：“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笑聲）

佐久間：蘇修當局不顧學生這樣的反對，結果仍然使用權力將那個非洲學生驅逐出境。這一天的下午，校園裏出現了大批便衣特務，嚴密進行監視，並且跟蹤那個非洲學生，使他不能活動。到星期二凌晨兩三點鐘，在黑暗中，一輛汽車駛入學校宿舍來接他。他走出宿舍雖然是在深夜，但是法學系和經濟系的許多學生都起來了。我們聚集在那裏，高唱《國際歌》，回頭一看，背後早已站滿了便衣特務。

這個事件，是最好的實際教育，它說明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是什麼東西。蘇聯當局這樣做——它從各國招來了許多留學生，負擔他們留蘇期間的一切費用，施以五年的教育，結果把學生一個一個培養成為真誠的反修戰士。

原田：當時，我曾到飛機場去給他送行。到機場時

是早上三、四點鐘，機場裏已經佈滿了便衣特務。據後來那個非洲同學回國後寫來的信說，有兩名蘇聯特務隨飛機一直跟他到開羅，而且在判明他確是從蘇聯出來的以後才返回去。

佐久間：這件事情以後還有這一段插曲：蘇聯當局雖然把他開除了，但是事情竟發展到舉行罷課，他們很是慌張。那個非洲同學被解送回國兩三天後，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發表一則消息，說是因為那個同學進出中國大使館，所以將他驅逐出境。又硬造了一條反華報道，並且讓大學裏的蘇共黨員到處進行宣傳。有一次我偶然到學校負責人的辦公室去，他立即從辦公桌抽屜裏拿出那份《消息報》的剪報說：“喂！這段新聞你看了沒有？”我說：“這個麼，我看過了！那是謊言。”“什麼，你說是謊言？他定期地到中國大使館去，並且散發文件，這怎能是謊言？”我說：“仍舊是謊言！”他說：“不，我們有證據。他把從中國大使館帶回來的文件一份一份地塞進掛在學生宿舍進口處同學們的大衣口袋，這是確鑿的事實。”我格格地笑着說：“正是因為這樣說，我才說這是謊言！”他生氣而認真地說：“不是捏造，我們有確實的證據。”我便頂他一句說：“就是因為你們拿這種一眼就能看穿的隨便捏造出來的謊言去騙人，所以人們就不理睬你們。”他以為我在侮辱他，氣得臉色都變了。我又對他說：“你是知道的，學生宿舍

入口處根本沒有掛大衣的設備。”（笑聲）“正因為你們這樣胡說，就更只能使自己的信用掃地。宿舍入口處是沒有衣櫃的。”我這麼一說，那個負責人便說：“照你那麼說，是沒有啊！”（笑聲）

蘇共黨員都分頭竭力傳播捏造的情報，但是，他們都是一些無頭腦的傢伙，所以各國學生更加嗤笑他們。他們說：“確實沒有衣櫃。”同學們追問他們：“喂，那麼往那裏塞中國宣傳品？”如果他們閉上嘴，也就完了，可是他們接着說：“他是進入各個學生宿舍房間內，把宣傳品塞進掛在門口的大衣口袋裏。”（笑聲）

原田：閉着眼睛說瞎話，而且若無其事，這是修正主義的做法。這種作風是普遍的，從上到下，無不如此。

我們同各國留學生們建立在無產階級 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團結 和“修太郎”的孤立

佐久間：到我們鮮明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奮起反修，聯合革命左派組織開始鬥爭時，修太郎們的反革命的面目就完全暴露出來，幹出了極為卑鄙無恥的勾當。

修太郎馬上向蘇修當局告密，指控我們誰是“毛澤

東派”，因而要求大學當局立即予以開除，從大學裏趕出去。他們又對各國學生說：“他們是‘毛澤東派’，今後你們要同日本學生聯系時，不要同他們來往，直接與我們聯絡好了。”

倒真的多虧修太郎這麼一宣傳，各國革命學生相繼跑到我們這邊來，對我們說：“萬一你們有什麼困難時，立刻通知我們。我們一定盡一切可能援助你們。如有必要進行動員，我們就動員人。”這些話使我們感到說不出的高興。我們從來沒有像這個時候這樣體會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可貴。

這以後，大學當局把我們叫了去，問我們：“聽說你們都是‘毛澤東派’，是真的嗎？”我們說：“我們對一貫的信念一點也沒有改變。我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

他說：“在學校方面看來，你們對中國文化革命的評價，壓根兒就和宮本領導機構的看法完全不同。因此，聽說你們現在和宮本領導機構的關係決裂了，也並不奇怪。只是我們尊重始終忠於自己的信念的人。”學校負責人的話，使我們感到意外。

從這以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學生們，把修太郎的動向一一告訴我們。我們對修太郎的動向瞭若指掌。我們就根據這些情報，連續不斷地向盲從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的那一伙人開火。

等到我們在大學畢業回日本時，儘管沒有邀請，但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學生，紛紛特意趕來機場送行。至於修太郎的情形，他們縮成一堆，像是鬼鬼祟祟逃跑一樣，離開了莫斯科。當然，沒有一個外國學生去給他們送行。

原田：講起那種國際性的援助，使人永誌不忘。左派分裂出來後，各國革命學生經常鼓勵我們。他們給我們提供了特別是關於世界局勢、日本局勢和學校內部動態等詳盡的消息。

例如把世界上各種共產黨，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黨和修正主義的黨對“四·二九”論文的反應，告訴了我們。特別是有幾位以法語為祖國語言的黑人同學等，把這些反應逐字逐句從法文翻譯給我們看。他們說：“日共宮本領導集團也公然地走上了‘和平過渡’和‘反華’的道路。所以你們要充分提高警惕。”

佐久間：我們和宮本集團決裂之後，在莫斯科也毫不孤立。不僅不孤立，反而更加加強了國際聯系。我們根據快而準確的情報，不斷地對修正主義者發動主動進攻。

修太郎採取了不和我們交談的方針。在路上，在走廊，大家碰面時，他們急急從旁邊避開，逃之夭夭。有一次，我在飯堂裏面碰到一個“民青”的女同學，我向她打招呼：“你好！”她漫不經意地說了一句“你好”之後，猛

然覺醒地大喊：“哎呀！糟了，和他們講話了！”她急忙掩嘴而去。（笑聲）我們總是主動地找那些喪失了信心的傢伙談心，因此，修太郎照例揮舞“組織原則”，下了緘口令。

不僅如此，修太郎們也不同意一般學生來往。因為一見面，就必然會碰到“毛澤東派”，向他們提出質問或同他們進行辯論。因為辯論一深入，他們就無言以對，所以他們除了和自己的一伙人來往以外，不和其他人接觸。這樣一來，他們就真正把自己孤立起來了。最後，他們一小撮人徹底和外界隔絕，把自己終日關在房間裏，變成一羣見不得人的人。

原田：的確，我們在莫斯科看到了修正主義都沒有好下場——不管他是蘇聯的，還是日本的。

佐久間：說來也真有趣，我們這些在莫斯科被貼上“毛澤東派”標籤的人，昂首闊步地來去活動，而那些只知向蘇修當局巴結阿諛的修正主義者，却過着見不得人的隱居式的生活。事情就是這樣明擺在那裏。

足立：話又說回來，我在那所大學感到最好、最受感動的，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國際團結。最能表現出這種精神的，是我們因為越南問題而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舉行示威的時候。有些同學的國籍，即使打開世界地圖，一時也難以找到他們的國家所在。我們大家手挽着手，為反對共同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浴

血戰鬥。有人說，把特定的政治立場或政治路線帶進來，國際聯合或國際友好就難以建立。這是豈有此理的說法。只有明確世界人民的真正敵人，認清了鬥爭方向，毫不含糊，才能夠建立起真正的戰鬥的國際大聯合，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國際統一戰綫。

各國留學生對“日本晚會”的援助

足立：在那次援越示威過後，我們日本學生受到大學當局的處分。正好在這次示威的一個星期之後，決定要舉行“日本晚會”。這類晚會，是由各國留學生自己舉辦的，目的是爲了向其他外國學生介紹本國情況，演唱民族歌舞和戲劇，舉辦圖片展覽和木偶展覽等。日本學生會每兩年舉辦一次這種晚會。

大學校長正式拒絕接受出席這一次的“日本晚會”的邀請。這一來，所有的蘇聯師生，從大學教授、共青團的幹部到蘇聯學生，都將不來參加。即使沒有這個原因，因爲舉行“日本晚會”的地點是在一個偏僻的地方，當時許多人都擔心參加的人數可能很少，晚會場面可能冷冷清清。

可是外國同學獲悉我們因爲參加那次游行而受到蘇方的壓力，都來援助我們。中國學生表示，一定動員到日本方面所希望的人數前來參加晚會。越南學生也表示全

力支持我們。拉丁美洲的一個學生，一向不參加任何國家學生舉辦的晚會，這一回他自動和大家一起來參加了。他說：“我不是專門來看你們的歌舞表演，我是爲支持你們的鬥爭而來的。”在這種氣氛中我們舉辦了“日本晚會”。大學當局派人來窺測，想不到滿場盡是來賓，會場氣氛非常熱烈。他們所最害怕的中國學生也大批到場，使他們嚇破了胆。

同中國學生的友好

新谷：印尼學生處於流亡狀態，環境非常惡劣，可是他們反而在各方面援助日本同學，完全是忘我的，並且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代價。這是真正無私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這使我們非常感動，也使我們強烈地感到：革命運動就是建立在這種國際聯合的基礎上的。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的友好關係，這是在莫斯科最令人愉快的回憶。我們兩國學生在莫斯科，曾經共同進行了反修鬥爭。以後，就是在宮本一伙惡化了對中國的關係之後，我們兩國學生之間的友好關係，也絲毫未受影響。一九六六年十月，蘇修片面地趕走在蘇聯留學的全部中國學生。這時，我們舉行了簡單的餞行會，並到車站送行。這些事情現在看來很簡單，其實不然。當時監視非常緊，學生宿舍看門的知道

是中國同學就不讓進去。要在我們的宿舍舉行餞行會，首先要解決怎樣使中國學生進入我們宿舍的問題。到車站去送行也是如此。

當時，蘇方對給中國人送行的各國學生施加了壓力。例如蘇聯外交部打電話給北越駐莫斯科大使館，說“不要讓越南學生給中國學生送行”。因此，北越大使館向越南學生發出一個通知：“十月二十七日，中國學生將乘從雅羅斯拉夫車站開往北京的國際列車，全部回國。蘇聯外交部要求越南學生不要去送行。”對於這個通知是什麼意思，越南學生分別作出了自己的判斷，並據此採取了行動。

佐久間：我們在暑假期間到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去旅行，在愛沙尼亞的塔林車站上一下碰到幾個中國留學生，我們就站在月台上親密地談了好久。和我們一起去的外國同學問我：“你們以前就認識嗎？”我說：“不，我們以前根本沒有見過面。”他奇怪地問：“那麼你們怎麼會談得那樣親密？”這時，一個中國學生對他說：“是的，因為我們是站在同一戰綫最前列並肩戰鬥的同志啊！”

宮本一伙的“獨立自主”路綫

原田：我們同嚴肅地考慮革命問題、根據馬克思列

寧主義進行鬥爭的各國學生，堅持團結到最後。如果服從宮本顯治路線，我們就要和這些人完全斷絕關係，而同我們一直輕蔑的如同蛆蟲一般的傢伙們握手。在莫斯科，這個區別可以說是極端明顯的。所以，不管宮本顯治怎樣虛張聲勢，怎樣飛揚跋扈，宮本顯治的路線在國際上是完全行不通的。

新谷：宮本顯治一伙所幹的，正同蘇聯十年前所幹的一樣。他們根本不搞思想鬥爭或者理論鬥爭，只要服從“組織原則”，只讀《赤旗報》，就是不讓人們聽到不同的意見，特別是不讓聽到毛澤東思想，等等。（笑聲）因為他們一旦開始考慮這些事情，思想就混亂了。

足立：那就是所謂不看、不說、不聽。用這種辦法搞，墮落得快，非常快。

學習毛澤東思想

新谷：這裏想談一談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我們在蘇聯修正主義跟前，看了幾年蘇聯的現實，自然不能不認真地重新思考這樣幾個問題：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蘇聯現在還能說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究竟什麼是現代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以什麼形式產生的？怎樣才能克服現代修正主義？

宮本領導集團始終一句也回答不出我們所面臨的這

些問題。只是說：“你們對這些問題有興趣，這是好現象。不過，你們應該遵守組織原則。”反而威嚇提出這種問題的學生。我們沒有辦法，只好輪流地站在宮本領導集團的立場上，分成回答問題的和提出問題的，進行模擬討論。

關於這些問題，過去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公開論戰中，曾經大加爭論。我們在莫斯科，就國際論戰，對照許多資料和經典著作，進行了學習。最後的結果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來看，很容易理解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是最正確的。

在我們討論、學習的期間，中國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聽到這個消息，認為這是好得很的事情，我們想，要徹底地研究這場文化大革命，學習這場大革命。我們越是學習，就越是感到要重新全面地學習毛澤東思想，重新徹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不單單是中國需要的革命，我們本身所面臨的任務，在本質上也是相同的。我們從學習中理解到不能把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作是別的國家發生的革命，而站在一邊旁觀，我們自身也應該發動一場在本質上同它相同的革命。

我們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畢業回國，親身接觸日本的現實，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當時在莫斯科思考的問題是正確的，所以就立即選擇了和日本的革命左派聯合起來

進行鬥爭的道路。一九六八年畢業回國的許多同學，也在一九六七年這一年內，在莫斯科公開舉起了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進行造反，展開了鬥爭。

原田：一九六八年二月，日蘇兩黨會談的結果，宮本修正主義公然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勾結在一起，完全走進了死胡同。凡是嚴肅地考慮日本革命的學生，越是認真閱讀宮本領導集團的那一連串又臭又長的論文，就越是糊塗，從而喪失了信心。這種情況在高中一畢業就來莫斯科的年輕人中間特別多。

正是因為學習了毛澤東思想，才打破了這種困境。在組織上分裂以後，堅持革命、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朝氣蓬勃，滿懷信心地去推進鬥爭。而墮落為宮本修正主義的人的狀態是，儘管受到蘇聯政權的庇護，却表現非常自卑自餒，甚至不能抬起頭來走路。

我在莫斯科，從一九六七年九月到十二月，化幾個月時間學習了四卷《毛澤東選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硬趕的，但也是以革命的氣概讀完的。這時我又得到了俄語和英語的《毛主席語錄》。

我們把它從頭到尾反覆讀了三遍，然後每天交談自己是怎樣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而且，對照《語錄》檢查工作，進行互相批評。這是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的非常有效的方法。特別是青年，一旦開始學到毛澤東思想，就變得革命熱情或信心非常強。而這種革命氣

概，在官本修正主義那裏是已經無影無蹤了。

從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發展到 同自己的修正主義作鬥爭

佐久間：我在去蘇聯留學的時候，沒有想到蘇聯是修正主義。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我到蘇聯去時，原抱着一個很大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蘇聯革命後幾十年教育出來的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新人，是什麼樣子的人。

在我初到蘇聯的一段時間裏，雖然看到和我想像中完全不同的殘酷的現實，但我總是這樣自我寬解：這大概是例外吧，僅憑一些例外的事件，就把整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都看成壞現象，是不對的。但是隨着時日的逐漸消逝，我在蘇聯每一天都看到同樣的荒謬事物，我這才懂得，這絕對不是例外，而是成了蘇聯社會上的典型事物。

以後，日蘇兩黨也發生了爭論，在國際上也發生了各種爭論。在這當中，我們才理解，蘇聯這種現實，是現代修正主義帶來的。在我們親身體驗了蘇聯的現實和對我們進行了顛倒敵我關係的鎮壓，才感到必須同它進行鬥爭。

在我們中間什麼是社會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究竟是怎樣產生的，怎樣才能克服修正主義，也成了議論的中

心題目。這個時期，我們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學習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增加知識，而是要學會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思想，我們也要運用這種觀點來分析事物，培養自己作爲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事物的判斷能力。

在我們來說，雖然主觀上要堅決地站在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立場，但是儘管如此，在自己的工作中，却發生種種的缺點和錯誤。當我們互相批評的時候，不僅是指出你這一點不對，那一點有錯誤，而是深刻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就懂得了，儘管自己認爲是站在反修的立場上，實際上自己的思想也有修正主義。在對它進行徹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當中，我們才能更正確地知道什麼是修正主義。我在莫斯科的五年生活期間，要說得到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這一點。必須堅持鬥私批修。必須根據這個觀點，經常地檢查自己的思想。

批判蘇聯的現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總結工作，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由於這三個因素的作用，使我們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提高。正是這個時候，《赤旗報》那篇“二·四”論文發表了。沒有用上述態度進行學習的一伙人，他們過去雖然也對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批判，把蘇聯的現實說得一錢不值，但對於這篇論文的反革命本質，却看不出來。我們讀了文章後，看出了它的可疑，它就是現代修正主義。從此以後，我們嚴

密注視着宮本集團墮落的過程，親眼看到它一步一步地走上叛徒的可恥道路。抽去自我批評的觀點，只是單純地罵宮本顯治，罵蘇聯，這是投機分子也可以做到的。但是，這並不是真革命。這樣的人歸根到底是要掉隊的。我們也要清楚地辨別這種人。

足立：這是今後我們在日本建立工人階級真正的先鋒黨，建立革命的左派，推動日本革命前進時所不能忽視的。批判宮本集團，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固然重要，但是，這畢竟只是問題的一個側面，而更重要的一個側面始終是，我們自己嚴格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開展黨的工作；從鬥私批修的立場經常進行互相批評與自我批評，總結工作，把日本的革命運動不斷推向勝利。

新谷：在中蘇公開論戰剛開始，中蘇兩黨的關係非常惡化，但是日中兩黨關係還保持着良好狀態，到中國訪問過的日共領導幹部，曾到莫斯科向我們作報告，講述中國的情況。記得一位日共領導幹部這樣說，中國受到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很大的打擊。中國對蘇聯修正主義非常憤慨。但是中國並不僅僅是口頭上抨擊蘇聯修正主義而已，它還探討為什麼在蘇聯發生了現代修正主義者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產生現代修正主義的社會和歷史的因素，檢查本國有沒有產生現代修正主義的因素。經過調查研究，果然發現在中國也有產生修正主義的許多

因素。中國現在雖然在大力批判蘇聯，但是說不定中國也有一天重走蘇聯同樣的道路，說不定在中國也將發生現代修正主義者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的事態。即使現在不發生這種事，幾年、幾十年、幾百年以後也可能發生。現在，以毛澤東主席爲首的中國共產黨，正在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

聽了這個領導幹部的報告後，我們受到很大的感動。不久之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這個消息使我們受到很大的震動。因爲中國不只是在口頭上批判修正主義，而是付諸實踐，而且是幾億人民一起投入這個偉大運動的。

現代修正主義是怎樣發生的？怎樣才能防止和克服現代修正主義？從正面認真對待這些問題，並且從理論上到實踐上指明正確的解決方向的，正是毛澤東主席。要真正和修正主義進行鬥爭，必須自己也進行鬥私批修。在徹底地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和宮本修正主義的同時，也要對自己頭腦中和自己隊伍中存在的修正主義思想進行鬥爭。這才是對修正主義全面地展開鬥爭。鬥私批修，無論對於個人、對於黨都是必須進行的。

與此相反，宮本一伙是怎樣幹的呢？他們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却這樣說：“我們過去和蘇聯有過小的爭吵，那是因爲蘇共干涉我們黨的內政引起的。今後我們兩黨各自獨立自主，對於對方的事情不要說三道四。”（笑聲）

如果按照我們的事你不要說三道四的原則去辦，那就是說，蘇聯共產黨的思想如何，你不必理會它，只要你遵守“組織原則”就行，至於共產黨員的思想、信仰，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請問這樣怎能克服現代修正主義？

佐久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起時，我們大學裏的蘇共幹部就問我：“你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是怎樣認識的？你個人的見解怎樣？”我當時就直截了當地說：“這場文化大革命實在好得很。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長期論戰的一個重要的結論。從此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可以說又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不過，這一場新型的革命鬥爭，必須在你們的國家，就是在你們這個蘇聯進行。”那個蘇共幹部被我說得直瞪着兩眼，無話可說。（笑聲）

足立：我們回國以後，和許多人談起蘇聯的各種社會現實，他們聽了後都說：“這樣看來，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了！”“毛澤東的確偉大！”

過去俄國進行革命時，帝國主義者曾對它發動戰爭，企圖將新生的社會主義扼殺。當時世界的革命人民就說：“這個革命不僅僅是俄國人民的，它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產物。”他們奮起為捍衛社會主義俄國而鬥爭。如果現在還堅持這種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就必須堅決地同葬送了社會主義革命果實的一小撮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叛徒作鬥爭。應該在人民面前說明蘇聯變

質的現實，指明怎樣才能防止社會主義國家變質，怎樣才能堅持革命到底的精神，怎樣才能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並且發動人民來參加這場鬥爭。但是，現在宮本集團却為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辯護，美化蘇修，掩蓋蘇修的現實，對蘇修一個字也不批評，另一方面又幹着同印尼蘇哈托法西斯政權一樣的反華、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勾當。

蘇修和日修的反華大合唱

新谷：從來所有的革命，總是遭到反動派和反革命分子大肆辱罵的。蘇聯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不久，世界各國反動派一致對列寧極盡詆譭之能事。他們說：“列寧這個冷酷的人進行糟塌破壞，把俄國人民逼上了生靈塗炭的災難境地了。”這次中國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樣，在《真理報》等報刊上，都闢了叫作“中國發生的事情”的大專欄，天天都在說什麼紅衛兵和工人發生衝突了，哪裏又殺了人了，哪裏又罷工了，報道“毛派”在“破壞”中國的消息。他們乘此機會瘋狂地煽動反華情緒，他們甚至這樣寫：“破壞活動”越過了中國國境，也波及到了蘇聯。

對這些瘋狂的反華叫囂，我們完全不為所動。我們認為這些反華宣傳，只是反革命分子所搞的造謠誣蔑的

伎倆。然而蘇聯是從幾年前就系統地在進行反華宣傳，現在，《赤旗報》也幹起來了，只不過比蘇聯晚幾年而已。而且是把過去蘇修報刊上的陳舊東西翻譯過來刊載，官本集團跟在別人幾年前的反華大合唱調子的屁股之後，也來搞反華，實在太拙劣了。

世界性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新谷：在今天的世界上，一面瘋狂地反對中國，一面却叫嚷結成反美國際統一戰綫，這種荒謬的作法，已經行不通了。爲什麼？在我們大學裏面，世界各國有正義感的、進步的學生，都對中國、對毛澤東主席抱有非常強烈的親切感。印度尼西亞的留學生，包括印尼民族黨的成員在內，都認爲除了按照毛澤東思想進行武裝鬥爭以求祖國印度尼西亞解放外，沒有別的道路。

非洲許多國家現在還沒有創立共產黨，但是來自非洲的學生，也在某種程度上直覺地感到：真正的解放道路，只有依靠毛澤東思想。在莫斯科，當然很難獲得毛澤東主席的著作，但非洲同學知道我們有一些毛澤東主席的著作後，就忙問我們從那裏得到的，他們想要。這些非洲學生看到中國那種敢於和美國、西歐各國以及蘇聯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的氣概，產生了一種可以指望和友好的感情。由於有這種看法，他們自然地感到中國

是可靠的朋友，因此他們有了要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心情。

排除一貫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而侈談什麼組織反美國際統一戰綫，是絕對不可能的。

足立：除了本來就是出賣靈魂的傢伙或者心裏根本沒有革命的傢伙不在話下外，只要是稍爲認真考慮一下自己的祖國的解放問題的學生，經過在蘇聯學習五年到七年到回國時，大部分都成了反修的左派。這是世界各國學生的共同點。

佐久間：有一位非洲學生，讀完了經濟系即將歸國。在他離開學校宿舍時，他的朋友都到宿舍門口話別。這位非洲同學最後說出這樣一番話：“各位爲我送行，非常感謝你們。如果以爲我在這裏學習了整整五年，回國後就會成爲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同路人，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在莫斯科最大的收穫是認清了什麼是現代修正主義。因此，我回國以後一定堅決和現代修正主義作鬥爭。各位同學，希望我們要不惜犧牲一切，畢生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鬥爭啊！”這幾句話說得大家異常激動，當場歡呼聲四起。看到這種情景的蘇聯特務學生，立即通知了秘密警察。這位非洲同學到機場時，特務密探已經在那裏“恭候”了。蘇聯特務對他說：“你發表了極其荒謬的反蘇演說，不能就這樣讓你回國。”說完就把那個非洲同學押走了。

但是，偏巧那個非洲同學所屬國家的大使館人員也來機場送行，看到這一情景，立即上前從蘇聯特務手中把那個同學搶過來，坐上大使館的汽車駛到大使館去，才使他免受蘇修的迫害。

新谷：我有一個美洲黑人同學，來自馬提尼克島。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同住了一個房間。他在求學最初的兩三年，同蘇修關係非常密切。他也常談論革命。等到讀完五年大學課程回到馬提尼克島之後，他變成了真正的革命左派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感到：歸根到底，一個人只要不忘記革命，認真地追求革命真理，最後總會走上共同的革命道路的。

足立：馬提尼克島這個名字比較生疏……

新谷：它位於古巴以東，是一個小島，是法屬殖民地。

佐久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開始後，各國的共產黨在走革命的道路還是走反革命的道路這個問題上，一個接着一個地分成左右兩派。特別是從我們學校的情形來看，拉丁美洲的這種分裂是最激烈的。他們祖國從事解放鬥爭的政黨，一般是不合法的。把“和平過渡”路線搬到那種地方，黨內就必定發生分裂了。因此，首先是本國的黨分裂，接着在莫斯科的組織也隨之分裂，所有的附屬組織、團體都不例外地分裂。一方繼續高舉革命旗幟堅持武裝鬥爭；另一方則一心走“和平過

渡”、“和平共處”的道路。

足立：這已經成爲國際上普遍的現象，在世界範圍發生。

原田：拉丁美洲有三大派：一個是格瓦拉、卡斯特羅系統，一個是信仰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是修正主義的馬利肯(譯音)們。格瓦拉、卡斯特羅系統和毛澤東思想系統，在搞武裝鬥爭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在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先鋒隊的黨這個問題上，意見又不同了。他們到一塊兒就展開激烈爭論，很是熱鬧。

破“私”立“公”

新谷：各國的普遍現象可以說是，革命的左派和修正主義劃清界限後，修正主義方面即便人數多一些，也是完全軟弱無力的。而且他們一般都不准說“過激”的話(笑聲)，不談論革命。他們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大人物們的競選活動，因此，不參加競選的下級黨員，就盡量迴避政治問題，眼光只集中於個人的利益。他們的路綫不是破“私”立“公”，而是恰恰相反，徹底走上破“公”立“私”的道路。所以，革命熱情啦、革命幹勁啦等等，一股腦兒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即使修正主義暫時在人數上佔多一些，也是有氣無力，沒有力量。

再加上特別是像日本的宮本修正主義那樣，在理論

問題、路綫問題上還不如意大利修正主義明確，所以就盡量逃避這樣一些問題。因此不管問他什麼問題，就只能回答“遵守組織原則”這一句話了。

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新谷：使莫斯科的官本修正主義分子陷入最大的窘境的，就是他們總想壓制廣大學生對蘇聯現實的批評，他們千方百計為蘇聯修正主義辯護。但他們詞窮之餘，只得說：“這就是社會主義，所謂社會主義現實就是這樣的。”所以這種“社會主義”，對誰也沒有吸引力，更沒有人願意拋頭顱、洒熱血去實現現在蘇聯這種“社會主義”。如果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話，那就敬謝不敏了。

官本一伙仍舊極力花言巧語地把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叫作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一旦發生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這種問題，就陷於窘境了。他們說：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也搞侵略。他們大肆宣傳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侵略了。現在不僅僅是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就是官本集團也瘋狂地宣傳“社會主義國家的侵略性”。

然則在官本一伙所指的“社會主義國家”裏，既有侵略，又有壓迫和剝削，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又有什麼區別？

六、斯大林問題和現代修正主義

以實用主義改變對斯大林的評價

新谷：蘇聯自從爆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來，到今年十一月已經五十二年了。其中現代修正主義明目張胆地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不過是最近十多年的事。在此以前的四十年間，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蘇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勝利地保衛了社會主義成果，那是一段光輝燦爛的歷史。要研究蘇聯五十年來的歷史，撇開斯大林領導下的三十年是無法進行的。

像我們這些學經濟學專業的人，在學習蘇聯革命以後到現在的經濟歷史時，最初還可以稍許讀到列寧的話。那是因為如果撇開列寧，就什麼也沒有了。等讀到列寧逝世以後的三十年，則等於是空白。接着在書中就突然出現了赫魯曉夫。可是，最近連赫魯曉夫也在書上失蹤了。這回又輪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繼列寧之後突然出現了。（笑聲）

在蘇聯，就是現在，提起斯大林的事情仍然是很危

險的，所以忌諱談他。赫魯曉夫下台以後，在召開第二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以前的這段時間，人們都說“在這次第二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將要在相當程度上恢復斯大林的名譽”，所以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但是，結果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樣……

那麼說，現在在蘇聯，斯大林的形象是不是一點也沒有重新出現呢？不是的。斯大林的形象仍然以某種形式重新出現了。例如：在赫魯曉夫下台後一星期左右，我去參觀莫斯科的蘇聯中央軍事博物館，當時展出了三十張左右的斯大林照片。在這以前，全博物館連一張斯大林的照片也看不到。但是，這一次却展出了。博物館的講解員還介紹說，在偉大衛國戰爭開始的時候，組織了以斯大林爲主席的國防委員會，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致，進行了戰鬥，從而取得了勝利。斯大林的照片過去一張也沒有，而現在能見到幾張。斯大林的形象就是以這種形式重新出現的。而這次却恰恰相反，赫魯曉夫的照片在博物館裏卻一張也看不到了。連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照片也不掛了。爲什麼呢？因爲那些照片上都有赫魯曉夫演講的鏡頭，所以拿不出來。

以後，到了“二十三大”，格魯吉亞共產黨第一書記在演說裏說：“我們爲什麼能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戰勝納粹德國？那是因爲全體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

下，同心協力地進行了戰鬥。”一般蘇聯人聽到這種演說，立即就會明白這是在肯定斯大林。這是因為，斯大林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無視這一點，就絕對無法談論偉大的衛國戰爭。所以，蘇聯在慶祝對德戰爭勝利二十周年的時候，斯大林的名字也稀稀拉拉地出現過。

在“二十三大”上，把第一書記的名稱改為總書記，把書記處改成政治局。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只不過是改變一下官銜的名稱，在日本來說等於換一個圖章。可是，第一書記和書記處的名稱是赫魯曉夫起的，因此廢除了。而總書記、政治局則是和斯大林聯系在一起的名稱。從赫魯曉夫的第一書記變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總書記，而蘇聯共產黨的本質却沒有任何變化。這一點姑且不談。但是，這種名稱的改變，我認為，它給一般蘇聯人民造成了這樣一種強烈的印象：赫魯曉夫被否定了，斯大林時代的東西又恢復了。

在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共和國，就是現在對斯大林的評價也是好的。然而，這種評價不是把斯大林當作勝利地保衛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當作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革命家。格魯吉亞人對斯大林的評價，是說在自己的故鄉出現一位偉大的英雄。

特別是到蘇共“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徹底地推行了“斯大林批判”，把同斯大林有關係的事物全部搞掉了。

從列寧斯大林陵墓把斯大林的遺體運出去燒掉，取消了用斯大林命名的市鎮、工廠、農場和學校的名字，把所有的斯大林像和繪畫都破壞無遺。“二十二大”以後，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豎立的斯大林大銅像，當然也遭到了破壞。針對這種作法，有人號召保衛斯大林銅像，特別是學生進行了激烈的反抗。赫魯曉夫派出軍隊開了槍，打死相當多的人，硬是把斯大林像拆掉了。這是聽格魯吉亞人說的。

原田：現在在蘇聯，誰都不正面回答關於斯大林的問題。地位越高的人越是這樣。說斯大林是個非常有威嚴的人，是一位偉大的人物，這樣表示懷念斯大林的人是有的。但是，能把斯大林同思想問題、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聯繫起來，而有正確認識的人，這樣的人還沒有遇見過一個。

斯大林領導下的三十年，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十年。對於這個時代，是把它當作充滿恐怖和黑暗的時代來評價呢，還是把它作為不惜一切犧牲從國內外敵人的威脅下勝利地保衛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的時代來看呢？斯大林問題，正是蘇聯存在着的堅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傾向，同要把蘇聯拉回資本主義的傾向進行激烈鬥爭的焦點之一。從這個意義來說，斯大林在蘇聯國內受到怎樣的評價，這是測定蘇聯的革命和反革命鬥爭的力量對比的一個晴雨表。

佐久間：在研究斯大林問題時，最常遇到的，就是蘇聯現在的官僚們所奉行的實用主義。

我們一到莫斯科，就立刻去參觀列寧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但是館內連斯大林的“斯”字也沒有了。講解員在說明裏，却左一個斯大林，右一個斯大林亂講一氣。他是怎樣談到斯大林的呢？在根本沒有斯大林照片和畫像的地方，絮絮叨叨地說斯大林幹了什麼什麼壞事。我們實在聽得不耐煩了。一到莫斯科就碰到了這種事情。

就是按照這種調子，把有關斯大林的東西全都抹殺，甚至從蘇共黨史裏，把這位作了三十年的黨的最高領袖一筆勾銷了。代之而出現的，是尼基塔·謝爾蓋維奇·赫魯曉夫的名字。可是曾幾何時，赫魯曉夫又被趕下台，於是正在排印的新版《蘇聯共產黨黨史》，遇到了麻煩，非再次改寫不可，引起了一場爭吵。

我們在蘇聯的最後一年（一九六七到六八年），斯大林是受到怎樣對待的呢？不錯，同赫魯曉夫時代相比，在評價方面還是有若干不同，是恢復了一些聲望，然而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主要是只限於作為領導偉大的衛國戰爭的人而出現的。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年年初的對德戰爭勝利日，在各地貼出的大幅宣傳畫中，有穿着軍裝的斯大林的畫像，還印有斯大林在戰爭勝利時發表的演說的摘要。

足立：例如：在赫魯曉夫下台後不久上映的《偉大

的衛國戰爭》的紀錄影片裏，有斯大林的鏡頭，是斯大林在演說的一個特寫鏡頭。中間插有羣衆在聚精會神地聽他的演說和戰爭場面的鏡頭。斯大林演說的鏡頭繼續相當長的時間。對這一點，我感到驚奇，很意外地聽到了斯大林的聲音。

佐久間：我在今年年初，在摩爾達維亞共和國的首都基什尼奧夫住了四個月左右。在城市的中心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政府會館。這是聳立在基什尼奧夫市的唯一的漂亮建築物，全部是白色的。所以當地人都挖苦地稱之爲“白宮”。在它的正前方，有一座小小的凱旋門。以前，這個凱旋門兩旁的字都被塗掉了，但是最近兩年又恢復了。那就是用大字寫出的約·維·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在摩爾達維亞從納粹佔領下解放出來時的演說——大元帥演說，也被用大字刻在上邊。在莫斯科是看不到這些的。因此，我也大吃一驚，覺得真了不起。向城裏的人一打聽，他們說：“唉唷！爲恢復凱旋門上的字，還流了相當多的血哪。”

就是說，一方面，有來自下邊的絕對必須恢復斯大林聲望的壓力。另外，早就謠傳說，要重新出版一部分斯大林選集，但是還沒有出。上邊是不准用這種形式來恢復斯大林的聲望的。

原田：爲了研究蘇聯的社會主義問題，我們也對斯大林的著作非常感興趣，很想得到它。當然，書店裏是根

本沒有的，想了各種辦法到處去尋找，但是很難找到。有的蘇聯人保存着斯大林選集，要求他們出讓給我們，但是他們說：“總有一天會需要斯大林著作，所以決不出讓。”

佐久間：這也是實用主義。有的教師現在竟吹噓說：“就是在赫魯曉夫時代，我也沒燒掉斯大林著作。”我終於收集到了斯大林全集第一到第十三卷。

談到實用主義，我還想起這樣一件事。我的畢業論文寫的是蘇聯的工資問題。為此，到圖書館去查舊文獻，一讀大吃一驚。被稱為這方面的大權威的人，在斯大林時代寫的書和後來寫的書，說的完全不同。在斯大林時代寫的書，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寫的書，全是引用列寧和斯大林的話，並且一再說，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是怎樣正確地指示的。可是，同一個人在八年後出版的書裏却寫道：“斯大林時代，是經濟學毫無建樹的時代，特別是工資這個科目，由於受到斯大林的壓力，見不到陽光，在學術方面毫無進展。”在那篇文章裏，這回是左一個赫魯曉夫，右一個赫魯曉夫亂寫一通。而這個人最近寫的文章中，既沒有斯大林，也沒有赫魯曉夫了。

足立：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在斯大林的著作裏，在理論方面，還是有現代修正主義萌芽狀態的東西，加以擴大就可以形成現代修正主義體系。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中。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批判地去

讀。可是不管怎麼說，斯大林作為一位偉大領袖，領導蘇聯，堅持捍衛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而現在蘇聯竟用實用主義來對待他，簡直不像話。

原田：羣衆中間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很好的，它來自實際生活的感受。他們說，儘管處在那種連綿不斷的戰爭的困難時期，在斯大林領導的時代，日子是好過的。到農村去，問一下五、六十歲的老大娘：赫魯曉夫時代和斯大林時代，那一個好啊？她們詳細地作着比較回答說：“那還是斯大林時代好得多了。當時麵包的價錢是多少？請看現在是多少！黃油的價錢和肉的價錢都比現在便宜。”“在斯大林時代，雖然沒有豪華的東西，可是可以買到很便宜的生活必需品，日子比現在好過多了。”我從許多人那裏聽到這種說法，而且越是到下層去，這樣說的人就越多。

足立：我想，斯大林時代是困難的時代，所以生活一定很苦。可是一打聽，當場得到的回答常使我吃驚。他們說：“不，斯大林時代比赫魯曉夫時代好過。”可是，到赫魯曉夫上台，就悲慘了。赫魯曉夫這個傢伙愛講排場，一到外國去，就亂學亂搬，開設什麼無人售貨商店、簡易快餐飯館，穿的也喜歡外表漂亮，可是最重要的生活方面，却困苦起來了。人們都這樣說。

戰爭與和平問題

新谷：現在把“斯大林問題”引伸一下，再談談“戰爭與和平問題”吧！不錯，斯大林是有各種弱點，但是斯大林却建立了偉大功勳，他經歷過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接着而來的國內戰爭、反外國干涉的戰爭，打倒了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外國的干涉等；他領導了從廢墟裏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蘇聯，把它建設成爲一個擁有現代工業和國防力量的強大社會主義國家；接着又團結全國人民，打敗了納粹德國的侵略。直到他逝世之前，他一直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的一生，主要方面就是這樣。

斯大林逝世以後，赫魯曉夫一開始“斯大林批判”，他就以斯大林的部分錯誤爲口實，把斯大林創建的最重要的業績一一抹殺。赫魯曉夫幹的最大壞事，是在蘇聯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赫魯曉夫的罪行是數不盡的。其中的一個，就是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把蘇聯引向極其錯誤的方向。

在今天的蘇聯，這個“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怎麼樣了？這同已經發生的蘇軍侵捷事件也有關係，所以是一個重要問題。蘇聯人民今天在考慮“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時，經常浮現在頭腦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個體

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納粹德國侵略到蘇聯歐洲部分時，蘇方進行焦土戰後退却了。因為蘇方在退走前，對納粹要佔領的地區，燒掉一切房屋和建築物，在井裏投放毒藥，使水不能飲用，這樣使德軍即使進來了也根本呆不下去。以後，當蘇聯進軍追擊德國的時候，德方在撤退時又進行了焦土戰。等到戰爭結束，只剩下瓦礫堆了。

這樣，在歐洲各國當中，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付出的人力、物力的犧牲，是最大的。據說，受到的損害大到這種程度，蘇聯現在任何一個家庭，它的家族中總有人因戰爭而犧牲了。因此，在蘇聯人民當中，對戰爭的恐懼情緒，厭惡戰爭而要求和平的心情，不用講什麼道理，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問題就是從這樣的事實引伸出來的。赫魯曉夫在這個問題上，由正確的前提引出了錯誤的結論。

佐久問：一言以蔽之，赫魯曉夫搞“斯大林批判”的本質，就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不僅在蘇聯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而且還反對尚未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必須用這個觀點去看赫魯曉夫的“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以及“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問題。這些問題同怎樣考慮世界革命，是密切相關的。

赫魯曉夫一掌握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就開始進行這樣的宣傳：“總而言之，只要沒有戰爭而有和平，在我國

就可以發展生產，不久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到那個時候，世界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比，將發生更大的變化。在這種條件下，全世界的人們看到蘇聯的美好現實，會羨慕，會用選舉的手段，把多數共產黨議員送進議會，就可以和平地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因此，今天全世界人民最需要做的，是老老實實地等待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南越、南朝鮮和日本等在美帝國主義奴役下的人民，也不要開展民族解放戰爭等鬥爭。不管怎樣小的戰爭火星，都可能擴大成爲世界大戰。這樣，蘇聯就會被捲進戰爭，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就完蛋了，這樣，世界人民的解放也將推遲。”在蘇聯這種宣傳是相當徹底的。因此，在同蘇聯人談話時常常聽到：“現在沒有戰爭，真是好極了。總而言之，只要沒有戰爭，我們的生活就會好起來，世界也會好起來。”

我因有好幾次聽到這種議論，有點不耐煩了，就反問他們：“全世界究竟那裏有和平？在美國，以黑人爲中心正在進行着激烈的鬥爭。在亞洲，那個地方沒有戰火？在拉丁美洲，人民也拿起武器幹起來了。非洲也是一樣。在全世界都在打仗的時候，你說什麼只要這種和平狀態能够保持下去，等等，你究竟是以一種什麼打算說這些話的呢？”這樣一問，他目瞪口呆，無言以對。這是因爲在蘇聯不進行這種教育，不進行這種宣傳，而只教育、宣傳現在世界是和平的好時代。他們說，反正蘇

聯領導人聰明地同美國妥協，在設法防止戰爭。只要沒有戰爭，也就用不着軍備了。這樣，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好起來，共產主義也就可以早日建成。就是按照這種想法，大張旗鼓地同美國進行裁軍談判的。

足立：赫魯曉夫的“斯大林批判”和對“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的想法，是來自同樣的觀點。

所謂“斯大林批判”，就是說斯大林好像一個流氓，用這種辦法把無產階級專政描繪得像地獄一樣。赫魯曉夫就是這樣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代之以資產階級專政。

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赫魯曉夫拋棄了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觀點，忘記了階級觀點。抹煞戰爭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區別，否定一切戰爭。就是說，赫魯曉夫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而用資產階級觀點看問題。在這一點上，赫魯曉夫的想法，在這兩個問題上都是一樣的。看問題沒有階級觀點，不管是宮本顯治也好，赫魯曉夫也好，都是修正主義的。

原田：我們因為越南問題而舉行示威游行時，蘇聯人不參加。我們就問他們，蘇聯人為什麼在這樣重要問題上也不參加示威游行呢？他們明確地回答說：“如果有示威游行的工夫，用來勞動提高生產多好。這樣就會使蘇聯接近共產主義。蘇聯到了共產主義，世界自然也

就解放了。”他們滿不在乎地這樣對我們說。

同共青團的傢伙們交談，他們都表示討厭戰爭。問他如果發生了戰爭怎麼辦？他說：“我不願意到戰場去打仗，所以我要自殺。”二十歲左右的很結實的青年人，竟無恥地說這種話。

印尼的學生爲了參加祖國已經開始的武裝鬥爭，要回印尼。蘇聯人拚命地說服他們：“爲什麼要到那種危險的地方去呢？留在蘇聯，大學畢業了，一個月可以掙多少錢，還有住宅，可以幸福地過一輩子。”他這樣說，是懷着好心。但是，印尼學生不聽從他們的勸告。他們就說：“這傢伙真有點怪。”

我在畢業後回國前，去參觀蘇聯的坦克部隊，在那裏同蘇軍戰士談了許多。他們都住在那裏，從早到晚受軍事訓練。我首先問他們：“你們爲什麼要當兵？”問後才知道，他們差不多都是出身於農村，因爲家裏人口多，自己想上學而上不起，沒有辦法便到這裏來了。又問他們：“那麼是不是打算在這裏幹一輩子？”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說，不，盡量在這裏呆的時間短一些，設法積攢些錢，想上某大學或某專科學校。再問他們：“真想幹一輩子的，有多少？”沒有一個人回答說我要幹一輩子。這同日本自衛隊的想法，是一樣的，農民的次子、三子，找不到職業，又上不起學，所以去當自衛隊。

足立：所以，現在要是打起來，蘇聯是很危險的。因

爲沒有人會拚命去打仗。

新谷：害怕和厭惡戰爭，這是一般羣衆的思想，也是樸素的感性認識。但是，赫魯曉夫利用這種意識，傳播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戰爭已經打够了。”就是這樣一種一概否定戰爭的態度。當然也就根本不會有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的正確觀點：“要消滅戰爭，只有通過戰爭，只有用戰爭來消滅戰爭，沒有別的辦法。”說得好聽一點，也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或者小資產階級的傷感主義。蘇聯人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決不是用這種傷感主義去打仗的。

我們打敗了那麼兇惡、那麼強大的納粹德國。在世界上誰也不怕。你用弓箭也好鋼槍也好，來進攻吧！不管誰來侵略，我們都有力量打敗他。滿懷這種信心和勇氣前進。這就是斯大林的領導。斯大林的接班人如果是一位優秀的人物，就會用這種精神來教育蘇聯人民。

原田：可是，赫魯曉夫反其道而行之，像剛才說的那樣，在人民大眾中間煽動悲觀主義或對戰爭的恐懼情緒，這已成了現在蘇聯國內一般人對戰爭與和平的想法。所以，在一九六〇年前後，蘇聯拍製的影片都是什麼《一個人的遭遇》、《戰場》、《烽火大地》之類的。總之，一部又一部地拍製了以描寫戰爭如何悲慘爲重點的影片。

拍製了許多哀傷的影片，如人們正在和平地從事生

產，突然敵人的飛機來了，炸彈炸毀了城鎮和鄉村，人們被綁去打仗。回來一看，自己的故鄉成了廢墟，人都死光了。……接着又拍攝了赫魯曉夫搞的“斯大林批判”的影片。拍攝了許多這樣的影片：斯大林時代世道是怎樣的黑暗，丈夫早晨出去上班，擔心晚上是否能回來；可是“二十大”以後，世道突然變得光明了。看了這種戰爭片子，已經不分敵我了。那樣可惡的納粹德國的影子也模糊起來了。只有破壞和悲哀。由於過分的悲哀，連敵人也不恨了。已經夠了，別打仗了——拍攝了發出這樣呼籲的片子。

足立：社會主義國家，況且是列寧、斯大林的蘇聯，至少必須這樣來領導人民——用對戰爭的科學的、正確的觀點，來分清敵我，揭露發生戰爭的社會原因，按照真正消滅戰爭的方向，發動人民大眾進行打倒帝國主義、捍衛和平的鬥爭。而赫魯曉夫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看到在各地爆發的民族解放鬥爭，就感到這種戰火不知什麼時候會蔓延到蘇聯而胆戰心驚。於是甚至要壓制人民為獨立和解放而打仗。

蘇聯現在在越南問題上，也不是希望南越人民從美帝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只是考慮怎樣來撲滅戰火，所以對解放戰爭能否取得最後勝利，並不關心。蘇聯想的是，南越人民拿起武器抗擊美帝這種事，要讓它盡快地停下來。

德國問題對蘇聯所具有的意義

新谷：現在成爲問題的是德國問題。不了解這個德國問題對蘇聯所具有的意義，就不會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和蘇聯今後的動向。在蘇聯國內，對德國的恐懼心理相當強烈。這種恐懼，也可以說已經成爲本能的了。對蘇聯人來說，這種恐德症是來自歷史體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同德國打了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受到納粹德國的侵略，被搞得一塌糊塗。

因此，恨德國或者怕德國的情緒，甚至好像成了民族感情。所以，今天一報道新納粹主義在西德抬頭，整個蘇聯爲之震驚：這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情況完全一樣，歷史還要重演。這是從一般人民大眾到克里姆林宮最高領導人的共同心理狀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問題，如果不把它同美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略聯繫起來考慮，就不能真正正確解決。蘇聯實際上並沒有這樣考慮。蘇聯是怎樣看美國的呢？不是把它看作敵人，而是把它當成朋友。相反的，蘇聯是聯系着德國問題來看美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同德國作戰時，蘇聯曾同美國合作。因此，蘇聯抱着一種希望，如果今後發生了德國同蘇聯打仗的局面，美國還會做蘇聯的朋友。蘇聯就是抱着這種希望來解決德

國問題的。

所以，《真理報》等報刊，在提到美國問題時，總是強調美蘇共處是捍衛世界和平的保證，只要美蘇之間維持和平，世界上的其他問題也隨着有了解決辦法了。一再向美國提出和平呼籲。宣傳說：“美蘇兩國有史以來從未互相打過一次仗。在上次大戰時，不是還合作同德國作戰了嗎？不就是這種盟國關係嗎？今後要更加加深友好關係。”用這種觀點來考慮問題。

因此，在研究這次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時，如果不聯系德國問題來考慮，就不可能判斷蘇聯為什麼採取那種行動以及今後將會採取怎樣的行動。

佐久間：只要你隨便打開蘇聯出版的國際問題雜誌或《真理報》、《消息報》等報紙一看，就會明白這個問題。到處出現用大號鉛字印的德國復仇主義這個字眼兒。如果是舊納粹的某人如何如何了，那更是要大書而特書一番。在德國問題上，聽到風聲就打顫，氣氛就是這樣。

但是，美帝國主義這個字眼兒，只要不是遇到特大的事件，是從不出現的。“帝國主義”這個詞也出現，但是“美帝國主義”這個詞，是非常謹慎地避免使用的。

新谷：政治漫畫——像日本橫山泰三等人所畫的那種東西，內容幾乎全是描寫納粹的，很少見到描寫美國的。

原田：希特勒在侵略蘇聯時制訂的作戰計劃，最近在蘇聯當作書出版了，是很厚的一大本。在莫斯科，它現在成了暢銷書。反正你想買也很難買到。對德國問題就是這樣非常關心。此外，只要一出版有關納粹的什麼書，當天就被搶購一空。

佐久間：他們在德國問題上真是已成了神經質。所以，赫魯曉夫被逐了，某某人下台了，在這種時候，總是要把處理德國問題犯了錯誤，還有在農業問題上的失敗，列為他下台的理由之一。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足立：這樣做就說得通，容易使人們接受。

佐久間：我們曾問蘇聯當局：“你們並不認為美帝國主義是敵人吧？”他先是否定說：“不，沒有的事。”我又問他：“不對吧！你們不是認為主要敵人是德國法西斯主義嗎？”他又說：“你那麼說，也可能就是這麼回事。”

原田：有一次，有個美國大學生到蘇聯觀光旅行，在莫斯科生病了。馬上被送進醫院。……住進了蘇聯黨和政府領導人或重要人物住的特別病房，醫院院長親自護理。養了一個星期的病，然後把他送回國去。對美國人這樣照顧，遠遠超過一般禮節。對在那次游行時受重傷的中國學生，別說住院，甚至拒絕給他們治療。這樣一比較，就能知道現在的蘇聯怎麼樣了。

足立：在今天的蘇聯，受到冷酷待遇的是中國人。

新谷：在搞“斯大林批判”的時候，赫魯曉夫常說，在蘇德戰爭開始時期，由於斯大林麻痹大意，判斷錯誤，致使蘇聯受到不必要的侵略。還說斯大林不聽參謀總部的意見，獨斷專行，下達了不切實際的命令，因而連續地吃了敗仗。

可是在赫魯曉夫下台後不久，在蘇聯國防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蘇軍領導人在回答問題時說：“沒有那樣的事。斯大林慎重地細心傾聽參謀總部的意見，進行了正確的指揮，而不是獨斷專行，靈機一動就進行指揮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把蘇聯引向勝利，創建了偉大功績。”從這些地方看，同斯大林一起實際參加作戰的軍人們，似乎還能如實地正確評價斯大林。

佐久間：還有，蘇聯在三年前突然又搬出了佐爾基問題。在這以前，普通的蘇聯人誰也不知道佐爾基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可是，《真理報》等報刊突然一下子大規模地搞開了宣傳。在電影院裏還上映那部電影。從此，佐爾基，佐爾基，就鬧騰起來了，還出了郵票。這實際上是反斯大林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宣傳說，佐爾基冒着生命危險，正確地掌握了德國開戰的日期，把情報送給了斯大林。可是，斯大林沒有重視這份情報；而德國實際上就是按照那個時刻開始了侵略。這就是納粹德國那樣蹂躪我們祖國，造成幾百萬人死亡的原因。那個佐爾基鬧劇，就是爲了宣傳這個的。

原田：佐爾基鬧劇後，蘇聯大量拍攝間諜片子。……名義上叫作革命電影，而內容都是間諜片子。

佐久間：在蘇聯，間諜片子和強盜片子非常受歡迎。這種片子，過去蘇聯進口東歐攝製的，可是最近在蘇聯也拍開了。

蘇聯的斯大林時代和現代的根本區別

新谷：把列寧、斯大林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蘇聯，同現代修正主義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後的蘇聯，作一比較，這對於了解現代修正主義的毒害多麼大，以及世界上首先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是怎樣遭到破壞的，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聯系到現在在中國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同蘇聯的經驗作個比較，這對於鮮明地突出問題所在，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看蘇聯同東歐各國，它們之間有那些共同點和不同點。而且還要把日本同這些國家作個比較對照，研究其中的共性和差別。這對於我們決不背離偉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經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產生的這種巨大考驗，在日本建立光輝的社會主義，將有很大的教益。

佐久間：反動派有意識地借用批判今天的蘇聯的辦法，來宣傳社會主義還是不行啊，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行

啊，我們必須徹底地粉碎這種宣傳。

在研究蘇聯社會主義變質問題時，我最先想到的，是蘇維埃這個權力機關。這個蘇維埃機關的變質是最根本的。因為蘇維埃是蘇聯工農兵的革命權力機關。它是這些人親自直接參加，站在羣衆路綫的立場上，在黨的領導下，直接行使革命權力的組織。在列寧、斯大林時代，蘇維埃真正是屬於工人的，是屬於農民的，是屬於士兵的，他們是實際上的中心。

現在的所謂蘇維埃，是把過去工農兵直接掌權的形態經過抽筋換骨，使它本質上成爲有名無實，只剩下了外殼和名稱。現在的蘇維埃，實際上是高級官僚、名流、有勢力的人這幫傢伙，以一種類似榮譽職務的形式組成的。這幫傢伙一旦得到特權，就貪婪地去追逐各種私欲。蘇維埃已經墮落到這樣的地步，不是要在那裏認真地討論什麼問題：它已經完全變成了投票機器，不管發生什麼問題，總是全場一致通過。歸根結蒂，它實際上已經完全脫離了工農兵。

所以一問蘇聯工人——他是某工廠的工人，同我要好——他就明確回答說：“雖說蘇聯是工人階級的國家，可是實際上我們沒有任何權利。”這就是說，蘇維埃已經完全變質，它同資產階級議會沒有什麼兩樣。因為它已經成爲一部分特權階層的機關。過去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邁進的那個蘇聯，同現在的赫魯曉夫出現後

的蘇聯的根本區別就在這裏。

“蘇維埃選舉”和先鋒黨的變質

足立：蘇維埃代表的選舉，完全是騙人的把戲。一個選區只有定員數的候選人。如果定員是三名，就把三個人的名字印在選票上。領到選票，只要塞進準備好的投票箱就完事了。如果你不贊成這些候選人，可以進入掛着門簾的小房間，把候選人的名字劃掉，另寫上自己中意的人的名字，如果對代表有什麼要求，也可以寫上。但是，進那個小房間卻需要勇氣。

如果沒有什麼意見，把領到的選票原封不動地直接投到投票箱就可以了。在監選人的注視之下，敢進入小房間的，這只有懷着強烈反抗情緒或調皮搗蛋的人才能做到。你就是在選票上寫上什麼，又能起多大作用呢？一般選民對某某人是什麼人——如不是相當有名氣的人，是不知道的。例如：選舉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蘇維埃代表時，我們大學的一個蘇聯人學生去投票回來了。我們問他，你選舉了什麼人？他說，一個是赫魯曉夫，另外兩個人他連名字也不知道。許多人在去選舉站領取印好了候選人名字的選票以前，連誰是候選人也不清楚；領了選票，連候選人的名字看也不看就投票。投完票，可以到另一房間聽完爵士樂隊演奏的音樂再回去。選舉站有樂

隊，在演奏音樂，並且嚴厲督促選民去投票。所以，不管什麼選舉，公佈選舉結果總是重複老一套：投票率百分之九九點幾，得票率百分之九九點幾，全部當選，無人落選。看一看這種選舉，完全是勞民傷財。因為不管選還是不選，結果都只有一個，這是非常清楚的。

佐久間：這樣選出來的蘇維埃代表，怎麼能說是工農兵的代表呢？蘇維埃的變質……更深入地追究其原因，最後就找到黨變質這個問題上。在由列寧締造、斯大林培育時期，共產黨曾經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黨、布爾什維克黨。

還在列寧在世的時代，在完成革命後不久，曾經大規模地進行清黨。當時，孟什維克以及各種不純分子，相繼鑽進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黨，革命在前進，黨極大的膨脹了。針對這種情況，直接由工農兵逐個地審查黨員，把混進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格格不入的傢伙，一下子清理了十萬人，整頓了黨。

原田：是受人民大眾檢驗的先鋒隊。

佐久間：對！由這樣的黨領導蘇維埃這個工農兵權力機關，推進了無產階級專政。同那個時代不同，現在蘇聯的實際情況是，首先共產黨完全變質了，蘇維埃根本就是有名無實，變成了一個空架子，無產階級專政老早就停止了。即使這樣，有人却說因為還保留着“共產黨”或“蘇維埃”的名稱，所以蘇聯還是社會主義。真是

豈有此理！

足立：聯系到蘇維埃的變質，要很好地研究中國所建立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種新型的權力機構。

斯大林沒有培養革命接班人

新谷：我們所看到的蘇聯，曾在十月革命時代活躍的人，幾乎已經全部去世了，已經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時代。特別是新的一代人，已經完全喪失了革命概念，喪失了繼承前輩所完成的革命事業，堅持建設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前進的精神。現在雖然還能聽到“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詞句，但是那只不過是黨或者政府官員在公開場合作為演說用語加以使用而已，它們已經完全脫離了人民大眾的生活和思想。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要連續不斷地培養繼承、捍衛和發展革命事業的新的一代人，永遠不讓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究竟應該怎麼辦呢？這是我們到蘇聯最先碰到的問題。日本川柳有個故事，叫做“第三代一手好字寫賣房啓事”。故事說：第一代，經過千辛萬苦，蓋了一所漂亮的房子。第二代還多少保留一些上一輩的精神，總算努力維持這所房子。到了第三代，雖然有了學問和教養，能寫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筆字，但是完全喪失了前輩的精神，用一手好字寫

了“賣房啓事”，把房子賣掉了。蘇聯的情況，跟這個故事一模一樣。

所以，把列寧、斯大林時代付出那麼大的代價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一文不值半文地賣掉，再買進廉價的資本主義，不是從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而是要後退到資本主義。……要使革命精神傳遞到最後一代，怎麼辦好呢？要完成這個事業，並且在世界上第一次大胆地採取了行動的，就是這次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想完成這樣偉大的事業，那只有反覆進行觸及全體人民每個人靈魂的革命，徹底進行思想改造，有一億，就依靠一億人民的力量，有七億，就依靠七億人民的力量，捨此沒有別的辦法。這一點，在正確批判斯大林時，是一定要指出來的。斯大林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個觀點上，也就是在羣衆路線的觀點上，有一個很大的弱點。

足立：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共產黨在挑選誰來當下一個領袖時，很簡單地就選出了馬林科夫。據說，中國的領導人偶而來到蘇聯，看到這種情況，便說：“這不行！”爲什麼呢？因爲斯大林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領袖。所以，要挑選他的接班人，那就必須慎重地挑選最合適的人——他能夠正確評價斯大林生前的事業和成就，分清斯大林在哪些問題上是正確的，在哪些問題上有錯誤缺點，從

而分清斯大林的哪些地方他的接班人必須繼承，哪些東西必須糾正；並且能夠進行這種領導。如果不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就不可能繼承斯大林的精神和思想，而且像赫魯曉夫那種人，就可能突然乘這個機會，利用人民大眾中間存在的樸素的情緒、感情，實行收買人心的政策，登上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崗位。利用羣衆中存在的沒有階級觀點的反對戰爭情緒，打出“和平共處”路線。

怎樣培養革命的接班人的問題，是我們在莫斯科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訓之一。這個問題關係到全體人民的命運，因而除了百分之百地信任人民大眾，徹底地用無產階級思想加以教育和改造外，沒有別的培養辦法。斯大林沒有作到這一點，而且也沒有這種觀點。

佐久問：斯大林逝世後，沒有找到好的接班人。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缺乏羣衆路線。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好好地思考。斯大林逝世是在一九五三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是在一九五六年。這中間只隔了三年，黨就變質了，無產階級專政就開始崩潰了。

這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這三年之內就被資產階級當權派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權力呢？這一變質，雖然是在斯大林死後發生的，但其因素，早在斯大林領導的時期就已存在着。

對這個問題，中國有着十分深刻的研究。一九五六年中國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中，雖然受到當時時代的限制，例如許多地方使用“鐵托同志”這個詞間接地進行批判，不夠痛快，但已經清楚地總結了從斯大林的錯誤中值得吸取的本質性的教訓。其一是羣衆路線的問題，其二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階級鬥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將繼續存在。

從斯大林時代，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已經完成，階級矛盾基本上已經消滅”的理論。今天蘇聯領導人還說：“蘇聯只存在着工人和農民兩個階級，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不是敵我矛盾，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不需要了。雖然還有流氓和小偷，但他們不是階級。”（笑聲）他們企圖用這種形式邏輯，使他們的修正主義變成合理的。

蘇聯的現實本身，戳穿了這種理論的欺騙性，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這種修正主義理論。

實際上，在斯大林時代，黨內就已經存在着資產階級當權派。由於斯大林沒有正確地發現這個問題，以致在他逝世後僅僅三年之內，蘇聯黨和國家的權力就被他們所篡奪。另一方面，即使發現可疑的人物，但由於沒有建立階級鬥爭的理論，不能弄清發生這種問題的內在原因，僅僅作為間諜在行政上加以處理。人民羣衆根本不理解懲處這些人是為了什麼。如果在階級鬥爭中將這

些問題擺在適當的位置，那麼就會明白，除非整個工人階級自己起來粉碎他們，就打不倒這些階級敵人。因為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工作，而是整個階級的鬥爭，所以不樹立羣衆路線的觀點，就不可能真正防止修正主義。

對於這一點，前述那兩篇中國的重要文章已有清楚的闡述。從斯大林的錯誤中弄清這個問題，這成了在國際反修鬥爭中，中國回過頭來檢查自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識破“斯大林批判”實際上是修正主義者的一個大陰謀，評價斯大林作為革命家的一生，並從他的錯誤中吸取積極的教訓，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斯大林的缺點和毛澤東的羣衆路線

新谷：斯大林個人的確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但是遺憾的是，他沒有接班人。沒有培養出接班人，這是他的一個最大失敗。如果僅僅是出現一兩位歷史上罕見的偉大人物，革命暫時也可能順利發展，但是從五十年一百年來看，只有這一點，革命是決不能順利發展的。這是蘇聯五十年的歷史明確告訴我們的。

斯大林在世的時代，只要服從他的領導，一切都會

順利進行。斯大林對於在他看來是屬於傾向壞的傢伙和反革命，便用秘密警察採取行政措施或者殺掉。而人民大眾完全不了解所發生的事件的真相，養成了他們對政治的恐懼心理。因此，只是一個勁地以盲目的、無批判的態度跟着斯大林。可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後，赫魯曉夫等這些蠱惑人心的傢伙接替了他的地位，人民大眾又跟着他們走。這就是今天蘇聯的最大的悲劇。

足立：這一點，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中國，人民羣衆自己進行討論、批判，並且根據自己的判斷，揭發出鑽進領導機構的中國赫魯曉夫。七億中國人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因此，不管隱藏得多麼巧妙的反革命分子，在羣衆鬥爭中，無不露出原形。人民大眾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能分辨出真革命和假革命。廣大的人民羣衆自己在把政治不斷推向前進，在中國已經開始了這樣一個新時代。

記得很早以前，從報紙讀過這樣一則新聞：前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說過：“從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現狀看來，可以這樣說，到毛澤東的下一代以後，中國的情況也必將開始‘解凍’，刮起‘自由化’之風。”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它們所希望的就是這個。但是，這一次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帝國主義這種痴心妄想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要想使世世代代永久保持社會主義社會不變顏色，

除了依靠幾億人民的羣衆力量，別無他法。毛澤東主席從這個觀點出發，向人民提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的號召。在蘇聯就是完全沒有這一觀點的。

佐久間：宮本集團的情形和蘇修完全一樣。他們認為，有關世界和國家大事的政治路線，你們怎麼會懂得，所以你們就只要遵守“組織原則”，給我擴大報紙銷路就行了。當我們指出宮本顯治的路線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而起來向它造反時，他們還訕笑我們不過是些青年學生，居然侈談黨的路線，未免太過驕傲等等，把我們狠批了一頓。（笑聲）

足立：不讓人民羣衆關心世界和國家大事，不讓人民羣衆關心政治大事，這已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一個特徵。蘇聯也不讓人民關心國家大事，只要他們關心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工作，而天下大事由赫魯曉夫或者勃列日涅夫等人去判斷處理，人民只要老老實實地跟着他們走就是了。

從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到 勃列日涅夫的“法西斯黨”

新谷：問題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機關或者權力中樞，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或革命的左派手中，這是真正關係到全國人民生死命運的大

事。赫魯曉夫篡權後，蘇聯的社會主義一下子就垮了。赫魯曉夫當了黨的第一書記後，立即在黨內展開大清洗，當然這是從反革命立場進行這一罪惡勾當的。

赫魯曉夫首先製造了“落後於時代的石頭腦袋”這樣一個藉口，把在對待中國問題上和他有不同意見的斯大林過去的老戰友如莫洛托夫等人，一一踢開。

接着，他又以所謂實行“黨內民主”為藉口，把那些有經驗的老布爾什維克從黨的各級組織中一一清洗出去。他又隨意修改黨章，規定黨組織的同一負責人不許連選連任，或者不許三選三任，把有布爾什維克傾向的黨員從黨組織一一整掉，以新興資產階級分子取代他們的地位。而只有赫魯曉夫連選連任幾次都可以，他玩弄黨章，一至於此。

赫魯曉夫還給斯大林時代被清洗的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地主分子，一一恢復了名譽，並且讓他們混進黨內；相反，堅持革命的蘇共黨員却被清洗出去。赫魯曉夫還公然說什麼“取得政權後，只要進行生產就能到達共產主義”，他把共產黨分成工業黨和農業黨，竟然把黨變成了經濟機構一樣的東西。

赫魯曉夫就這樣使蘇共從內部腐爛變質，終於在蘇共“二十二大”以後，使蘇共不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成爲“全民黨”。

原田：赫魯曉夫就是這樣把蘇共變成了實質上與共

產黨毫不相干的東西了。赫魯曉夫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今天進一步有了發展，使蘇共墮落成爲法西斯的黨。

宮本一伙的“組織原則”

原田：那一套反革命路線，是赫魯曉夫在“黨章規定”的合法外衣之下推行的。赫魯曉夫對凡是不依照他的反革命路線辦事的黨員，都扣上“破壞黨的組織原則、反對黨中央方針”的大帽子，把他們看作簡直就是一羣大逆不道之輩（笑聲），將他們一一清除出黨。

現在，宮本顯治一伙在日本的所作所爲，正和赫魯曉夫一模一樣。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掌握了黨中央的實權，下一步就一定是以“組織原則”爲盾牌，開始清洗堅持革命的人。他們口口聲聲講“組織原則”要人盲從，實際上“組織原則”這個東西必然是爲了實現某一政治路線而服務的，“組織原則”決不是什麼單獨存在的東西。宮本集團所強調的“組織原則”，不過是爲了推行他們的“議會道路”、“自主獨立”等現代修正主義路線而已。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下，只能服從旨在爲推進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組織原則，絕對不應該服從一小撮叛徒如宮本集團的“組織原則”。

事實上，列寧就是這樣考慮並採取行動的。列寧在第

二國際墮落到“議會主義”、“保衛祖國”等背叛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時，決沒有說“雖然是反革命路線，但是組織原則還要遵守”。列寧毅然決然地宣告，考茨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第二國際已經崩潰；他和第二國際決裂，並建立了第三國際。現在誰都清楚，無論是對於蘇聯的共產主義者來說，還是對於日本的共產主義者來說，最重要的，並不是去服從修正主義黨的“組織原則”，而是要和他們一刀兩斷，重建真正的先鋒隊——共產黨。

蘇聯軍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根本區別

新谷：前面我們談到權力機構問題和共產黨的問題。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軍隊。武裝是國家權力最主要的支柱，軍隊掌握在誰手裏，和按照什麼路線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一個國家的命運。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今天蘇聯的軍隊，和美國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差不多相同。他們都是為一部分統治階級服務的軍隊，內部存在着嚴格的等級制度。他們是由根據徵兵制度而徵召來的士兵和職業軍人組成的。這些軍隊，對武器的因素比對人的因素更重視。

中國的人民解放軍，和蘇修的軍隊就根本不同。

中國人民解放軍，它的構成因素，跟蘇聯等的軍隊

根本不同，它是全心全意爲中國人民大衆服務的軍隊，內部不存在等級制度。這支軍隊既打仗，又從事生產，做羣衆工作。他們不是脫離人民的特殊武裝集團，而是人民自己的武裝部隊。這支軍隊最重視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蘇聯軍隊，在國內壓迫蘇聯人民，對外則像佔領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幹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

中國人民解放軍，名副其實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解放。我們有必要充分地研究、學習毛澤東主席的建軍路線。

—— 政治笑話 ——

去你的吧，資本主義

西方的旅行者訪問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們聽說捷克斯洛伐克在復辟資本主義，想親臨其境弄個明白，便拚命地到處探訪。有一天，在布拉格揪住一位青年，向他打聽這個事。那位青年喋喋不休地說：

“唉！竟有這種說法嗎？真是豈有此理！”

接着他回答說：

“我國憲法上不是明明寫着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所以完全不必担那個心。”

七、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社會主義各種制度的變質和崩潰

佐久間：五年之前，當然，我是對蘇聯這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滿懷嚮往之情，到莫斯科去留學的。到了莫斯科以後，最初還有許多佩服的地方，常寫信告訴日本的朋友們。

例如到莫斯科以後，認為第一方便的是，經常供應開水。除了極舊的住宅外，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有自來水，開水也是日夜供應，無論是要洗澡、淋浴、刮鬍子等，要用開水，馬上就有。因為市裏設有熱供應站，將水煮開，輸送到各個家庭。各個家庭冬天需要的暖氣，也是熱供應站輸送的。各個家庭都不要準備火盆和火爐子。我以為這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帶來的成果。

住宅建設方面，新的大型的新村，興建起來。房租很便宜，連同煤氣、自來水、電費、電視、收音機收聽費等一起，不過佔工資收入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此外交通費、郵電費也很便宜。許多到蘇聯的日本人，對這些都表示羨慕。我想：還是社會主義好。

又如上學，不僅不必繳學費，而且有獎學金。這種獎學金和日本的獎學金不同，是不必歸還的。生病或者受傷，可以到醫院治療，不必繳醫療費。從入院到出院，管治療，管飯吃，分文不收。雖然不能單單從社會福利的情況來評價整個社會主義，但無論如何，這一制度還是在列寧和斯大林的正確領導下，蘇聯的工人、農民流了汗水，建立起來的。可是，就在我們在莫斯科居住的五年期間，眼看着這些制度逐漸從內部開始變質、腐敗，有的連外表也正在改變了。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夏天到達莫斯科的。當時在莫斯科參觀訪問時，一位嚮導人員曾指着一所醫院對我說，這是莫斯科唯一的一家私立醫院。五年之後，到我回國的那一年，莫斯科的私立醫院已發展到數不清了。這種私立醫院和日本的某某醫院和某某診所，完全一樣，由一兩個醫生開業。到這類私立醫院看病，要付醫療費。憑我們的常識來看，既然有不收費的公立醫院，沒有傻瓜去這種要花錢的私立醫院。事實却不然，登門找私人醫生的病人很多，真是生意興隆。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原來這種收費的私人醫院裏有技術高的醫生，又親切又認真。一到那些公立醫院，全是衙門式的，粗暴，不給認真治病。有時推來推去，受到虐待還不說，能治好的病也好不了。與其那樣，還不如稍微花點錢，到能認真地徹底地治病的地方去，這本是病人的常情。

因此，經濟條件稍微好一點的人，都不願意到公立醫院受那非人的待遇。這就造成私立醫院日益興盛，開設的人越來越多。這一來，全體人民都享受的免費醫療的制度，就很快地崩潰了。

“休養之家”的實況

佐久間：我在蘇聯度第一個暑假時，七月間曾到黑海沿岸我們大學的“休養之家”去休息度假。在那“休養之家”的旁邊有一塊大招牌，上面寫着：“所有的蘇聯人都享有休養的權利——摘自蘇聯憲法。”我一看這幾行大字，心裏想：果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哩。

到了八月，我到摩爾達維亞共和國的一個集體農莊去勞動。在那裏我遇到一個老農並和他聊天。我對他說：“你們的國家真好，保障所有的人都有休息療養的權利。可以到‘休養之家’或者休養所裏舒舒服服地休養近一個月。”他聽我說完之後回答說：“有這樣的事情嗎？我活到這一把年紀，那種地方可一次也沒有去過。能去那種地方的，恐怕是黨和政府的大人物吧！”我聽他的答話，想到這情形確有點不對，但是又想到世界上的事情，總不免有些例外。那時我聽到那老農的一番話後，並沒有怎樣加以重視。

一九六六年暑假期間，我和另外兩位朋友一起到捷

克斯洛伐克去了。在赴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車上認識了一個在莫斯科高級政府機構裏工作的中年俄羅斯婦女。她是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名勝卡羅維發利的溫泉去度假的。卡羅維發利是歐洲有數的幾個溫泉休養勝地之一。我們便諷刺地對她說：“像你這樣地位高的人，能夠到外國著名的勝地休養，真使我們羨慕啊！”誰知她聽到之後反而不高興地說：“我不是講笑話，我對這件事正非常不滿意呢。”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的上司個個不是去意大利，就是去法國，或者赴西德這些國家去度假，我因為職位級別低，只能到社會主義國家去。”她說到“只能到社會主義國家去”這句話時，臉部充滿不服的表情。

我在旅行捷克斯洛伐克後，爲了治療胃病，到高加索一處設在山上的療養院去療養了一個月。在那療養院裏，和我同住一個房間的，是來自基輔的一個工廠的工人，要說此人體格，真個好像是一頭小牛似的健壯。他在每當醫生要來檢查病房的規定時刻前，就離開病房溜走。我便問他：“你說腸胃不好，可怎麼看不出你有病？為什麼要跑到這家專門治療腸胃病的療養院來？”他說：“我是一家大工廠的工會幹部。我的工作就是審核和批准工人們請假事宜，和給他們安排休假療養的。因此，我自己想要去哪裏就去哪裏，只要我自己簽一個字就一切解決了。”

確實，在蘇聯的憲法上規定“所有的蘇聯人都享有休

養的權利”，但是今天處在蘇聯最底層的工人、農民，事實上却不能享受療養設備。地位稍微高一點的，在蘇聯國內的療養地休養，比這高一些的，到東歐各國去，更高的，到西歐去休養。

原田：那些所謂“休憩之家”、“休養之家”等地方，其內幕也是不堪聞的。首先，性道德的紊亂非常嚴重。有婦之夫、有夫之婦到那裏後公開調情，亂搞男女關係。我到療養院時，有些蘇聯人居然親切地說：“怎麼不交個女朋友？我可以介紹！”我拒絕了他。他竟感到奇怪，問我：“那麼，你跑到這個地方來做什麼？”“你是個廢人嗎？”

在“療養院”裏從事清潔的老女工，待遇非常之低。問她們怎麼過活？原來她們把自己的房間按鐘點計算，租給那些男女們幽會，等於那種專供情人幽會的旅館，靠此多賺一些收入。凡是到“療養院”的男人莫不帶着大量的金錢去的（笑聲）。這種現象，在蘇聯已屬於常識範圍的平常事情了。

足立：蘇聯和日本一樣，找到的職業不同，在待遇上，也就存在着驚人的差別。到高級政府機關和大企業，跟在中小企業裏工作，各方面的待遇完全不一樣。我所認識的一個年近五十歲的婦女，她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充當電話機接綫員，工作已達二十多年。她就說：“療養院這種地方，我一次也沒有去過。”我說：“你是

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工作的，不可能有這種極不合理的事情。”我再詳細地問她，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她雖然是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工作，但是她們只是受工會僱傭的一個全部職工僅有五、六十人的小單位。這種小單位，自己沒有“休憩之家”、療養院、俱樂部或文化館這類的機構，因此什麼地方也不能去。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蘇聯有些事物，表面上看好像很好，但只要深入其間調查一下，就發現事實完全相反，而且往往令人感到驚異。

人口集中大城市和房荒

佐久間：住宅問題也是一樣。在蘇聯，城市人口不斷增加，特別是莫斯科人口更是急劇上升。住在地方上的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想到大城市去。

例如在我們學校讀書的地方出身的蘇聯學生，在就學期間內，千方百計要找一個在莫斯科擁有居住權的人結婚，這樣，他就可以留在莫斯科。莫斯科的房荒非常嚴重。這樣，婆媳吵架等這類問題也就發生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種類似住房互助會的組織建立了起來。這種辦法，是集合一定數量的人，各人先拿出一筆錢來，再由國家補助興建公寓或住宅，然後以分期付款方式償還，等到付清全部款項，房屋即屬己有。現

在用這種方式蓋房子的人非常多。這樣的住宅區，我也去過許多次。許多蘇聯人收入很低，却要付出高額的住宅費，莫不感到負擔非常沉重。蘇聯工人的全國平均工資是九十到一百盧布，對一般工人來說，是難以支持的。看到這種實際情況，這和日本有什麼兩樣呢？這已經很難叫做社會主義了。

足立：如果說今天的蘇聯是社會主義，那就不需要什麼共產黨了，也不要流血革命了。那些事，社會民主黨也是能够辦到的。看今天的蘇聯，不是看工人有沒有私人汽車，家庭電器普及的程度怎樣，“休養之家”設立了多少，是不是有開水供應，這些都不是主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看今天蘇聯是什麼政治潮流和什麼人掌權，把蘇聯政治推向哪一個方向，到底要把蘇聯引向何處，把蘇聯帶到什麼樣的社會？

原田：這也就是說，首先要看那個國家的人的因素，他們所遵循的是一條什麼樣的政治路線，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是什麼樣的。不從這一點看問題，就不能正確地掌握問題的實質。完全撇開人的因素，只把蘇聯現在生產的物質財富，和消費物質的質和量，和西方所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就看不出問題的本質。重要的是，蘇聯今天的經濟和經濟領域究竟是要朝哪一個方向發展。

“物質關心”和“物質刺激”

新谷：我想簡略地談一下蘇聯的“新經濟體制”問題。大家都知道，蘇聯現在的經濟情況不佳，困難很多。赫魯曉夫認為蘇聯經濟發展遲滯的原因，是經濟機構組織不好。他多次下令改組蘇聯的經濟機構，但仍然失敗。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上台後，以為仿效資本主義的一套方法，也許可以促進蘇聯經濟的發展。

他們提出了一套“物質上關心的法則”和“物質刺激的原則”，以此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是，這一套作法，就是資本主義國家這樣提出來，也未免過於露骨。他們現在就把這一套，硬說是列寧的原則。實行這一套原則的結果，蘇聯的經濟情況越來越糟糕。因為這一套法則，歸根到底是鼓勵人們去大肆追求私利私欲。實行這一套法則，使龐大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把國家和世界大事忘記得一乾二淨，一心為了肥私囊而精神都變了。現在在蘇聯，貪污納賄已成為公開的秘密。總而言之，人們都是為了怎樣才能發財而奔忙。人們的思想腐化到了這種地步，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陷於一片混亂了。

按照我的看法，蘇聯的經濟越搞越糟，固然有各種原因，但是最根本的，還在於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是

爲人民的利益服務。蘇聯當局根本就沒有這個觀點。因此失去了爲人民服務的態度的這一套官僚機構越是龐大，內部的官僚主義就越發展，腐化墮落就更嚴重起來，這是必然的趨勢。

作學問也搞“物質關心”

足立：特別是最近，這也是“物質刺激”，那也是“物質刺激”。我們就讀的大學學生曠課的人越來越多，學校當局很是頭痛，於是也來個規定，凡曠課幾十小時以上者，獎學金減半發給，甚至全部停發。不是去了解學生究竟爲什麼曠課，是不是對講義不滿，還是另有原因，而只知用行政手段進行恫嚇，連減發獎學金的手段也要出來了。學習也要用金錢引誘，還有什麼好說的。但是學校當局還大言不慚地說：“列寧的物質刺激的原則，在我們這裏也適用。”

原田：教師指導學生做畢業論文，每負責一名學生可以得到五十個盧布。有些教師爲了錢，就同時擔任許多畢業生的論文指導工作，因此名聲很壞。有個教師遇到他自己班的學生放棄作畢業論文，當面嘆息說：“我的五十個盧布又拿不到了。”（笑聲）

佐久間：一個剛進大學的女同學憤怒地對我說：“我們班上一個成績不好的女同學，仗着她的父親是集

體農莊主席，一個勁地給先生送禮，甚至用汽車把禮物載到考場，因此，她就順利地通過入學考試了。”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

新谷：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從一九六六年起採用所謂“新經濟體制”，放手給予各企業以獨立經營權，放手讓它們追逐利潤。按照勃列日涅夫這一伙的說法，只要人人都有追逐私利、滿足私欲的打算，拚命去追求利潤，就能達到“共產主義”了。（笑聲）請問這是什麼樣的“共產主義”呢？這和資本主義又有什麼不同？這樣的做法，只不過是把什麼公司的總經理，換上一個什麼委員會主席之類的稱呼，實質沒有什麼不同。

看到赫魯曉夫及其接班人大事破壞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肆無忌憚地復活資本主義，日本也流行一種議論：“經濟非常不發達的落後國家，或許可以採用社會主義制度以發展本國的經濟，但當達到一定程度的工業化水平以後，仍然會陷於停滯不前的僵局，仍然不免要實行‘自由化’，並復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適宜落後國家，在像日本這樣經濟高度發展的先進國家，則不適用。”

照佐野學、鍋山貞親等人的這套理論就會得出這樣結論：實行“共產主義”的結果，仍然不免要走向“維護天皇制度”。（笑聲）他們經常宣傳：希望自由的心情，

是人的本性，所以“自由化”總有一天必定到來。這是胡說八道。其實他們提倡的“自由化”，就是人剝削人的自由。工人階級中間沒有具有這種願意受人剝削的天性的人。

原田：“改革”經濟的目的在於：他們認為經濟未能發展的原因在於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統制經濟這一套制度，所以他們要放鬆經濟計劃和統制，採用市場經濟，讓各企業去自由競爭，通過自由競爭去發展經濟。一句話，就是採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醫治困難重重的蘇聯經濟。我們在前面談的，只是圍繞着權力等問題。而這個所謂“新經濟體制”，則是蘇聯的資產階級權力要在經濟基礎方面復辟。

足立：現在蘇聯採用的以引進“利潤方式”為內容的所謂“新經濟體制”，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蘇共中央全體會議上決定的。而捷克斯洛伐克要比蘇聯早一年作出同樣的決定。

在這個問題上，各國雖然有各種差別，但是它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剛才談到的，採用“利潤方式”和市場經濟，把過去由國家無償提供生產設備，現在則以繳納使用費的形式變成有償供給。另一方面，國家規定的生產計劃指標大幅度壓縮，而加強各個企業的獨立性。也就是說，國有化經濟或者社會主義這一特徵，已經消失了。

原田：在這一點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更徹底。例如自由價格制度已經大規模地在各個經濟領域中採用了。各企業由於優劣不同，職工的工資待遇差別也產生了。

足立：談到這個問題，我認為“按勞分配”這一社會主義法則已經崩潰了。過去上級向各企業指定的最重要的指標是生產量。因此簡單地說，就是根據生產量來實行“按勞分配”。但是“新經濟體制”却把這個基準改變了，用營業額代替了生產量。因此，具備同一條件的人進行同一的勞動，但產品暢銷的企業的工人收入，要比產品滯銷的企業的工人的多。

佐久間：現在蘇聯的工資差別還剩下極少的一點兒限制，但今後工資差別必將越來越大。在實行“新經濟體制”以前，蘇聯在定工資時，作為一種義務，規定了八項指標。所有的企業在制訂工資計劃時，必須將工資總額、工人人數、勞動生產率等全部報告並且要經過上級監督機關批准才能實行。但是新制度實行後，企業只要工資總額得到批准就可以了。至於僱傭工人人數，則由各企業自行決定。這樣一來，在工資總額的範圍內，只要減少工人數，每個職工的工資份額就多一些。前面說的工資差別還存在的一點點限制，是指工資等級表是由國家決定的，對實際上造成差別的獎金，分別大體規定了百分比。但是，這和他們提倡的“物質刺激”的原則

又有矛盾，這樣總有一天會取消的。到那時工廠廠長就必然大搞企業的“合理化”措施，拚命向工人開刀，更多地把他們解僱。

現在剩下的唯一的工資總額的指標，實際上也是想取消的。因為把它一取消，國民收入的計劃就難以制訂了，所以不得已仍然保留。但蘇聯當局已公開說，今後各企業的工資總額指標是要取消的，到時由各企業自行決定各自的工資總額。

新谷：我曾經向大學的教師提過問題：“實施新經濟制度後，不是必然會出現失業者嗎？”那個教師回答說：“蘇聯政府和黨是會採取措施不使出現那些事情的，因此不必擔心。”我想，這個答覆實際上是一句反話。他的意思是說蘇聯的黨和政府採用了引起企業倒閉和失業的方針。

足立：各個企業爲了提高利潤，而在推銷方面進行競爭，而且爲了降低生產成本，而力求節省開支。爲此，就必然會解僱勞動條件差的工人，並盡量減少用於職工福利和安全方面的資金。這樣就會出現失業者。對於這個問題，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學者等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只要保證被解僱者從失業到再找到職業期間的生活就可以了。這個想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保險制度是一樣的。還有有的工廠產品暢銷，有的工廠產品滯銷，這就有企業倒閉的可能。

佐久間：還有各企業可以把利潤的一部分，在企業內部分配。究竟是怎麼分配的呢？實際上，絕大部分被技術人員和負責事務工作企業管理人員等分享了。雖然手頭上沒有具體的數字，但是根據一九六七年的利潤分配實際情況，百分之六十以上落入了企業內部極少數管理人員之手，剩下的才分給一部分工人。

技術人員、事務管理人員的獎金，過去一向是編入企業工資預算中的，這一次却從工資預算中分離出來，而從利潤中領取。因此企業利潤如果不增加，他們除了基本工資外，一個戈比的獎金也拿不到，如果利潤大量增加，他們就可以拿到全部獎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培養企業管理人員具有“物質關心”思想，以便去拚命強迫工人為積累企業的利潤而賣命。

剩下來的一小部分獎金，並不是讓全體工人平均分配的，而是由企業管理人員用於表揚“優秀”的工人。這和最近在美國、日本等企業中所採取的種種制度，可以說是完全一模一樣。

資本主義的“集體農莊市場”

原田：商業流通機構最近也在不斷地變化。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對某些“商品”已經實行自由價格制度，可以自由規定零售價格。對其他的“商品”制訂上漲

和下跌的幅度，讓它們在市場上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變動價格。蘇聯也正在向這個方向發展。

還有，各企業在決定什麼商品生產多少時，由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合同來決定。例如紡織工廠，首先要舉辦樣品展覽，把本廠出產的各種紡織品展示出來，在那裏簽訂企業之間的交易合同，紡織廠就根據這些合同訂生產計劃。因此，也就自然只努力生產利潤高的商品。

還有蘇聯集體農莊市場，由集體農莊將國家收購以後剩下來的農產品，和各個農戶在自留地上種植的收穫物，拿到這種市場來出售。這種市場最近日益發展。在這種市場上，買賣價格根據供求關係漲落。爲了不讓集體農莊市場的價格不適當地上漲，便在市場附近開設國營商店。但是，不管怎樣，國營商店出售的商品和自由市場上的商品質量完全兩樣，所以根本不起作用。以蘋果爲例，在國營商店出售的，是小的，疤很多；在集體農莊市場出售的，大而新鮮，並且擦得很乾淨。到集體農莊市場一看，品種多，量豐富，並且可以隨意挑選，只是價格高。國營商店雖然價格較低，但是常常有牌價而無貨，即使有貨，質量不好，量也不多。

新谷：有的地方的集體農莊用飛機裝運農產品到城市裏出售。

足立：集體農莊市場的投機風氣很盛，市場上還有警察駐守。

原田：有一次我到集體農莊市場去調查各種產品價格。我剛拿出小筆記本和鉛筆，便衣特務就走上來質問我：“你爲什麼要調查這裏的情況？”我說：“不是的，我和朋友們要開一個小茶話會，想買一點又便宜又好的食品，所以到這裏來看看。”他被我這番話對付過去了。

什麼人掌握着生產資料

佐久間：前面講到了利潤分配的問題。現在在“新經濟體制”下，一個企業可以用其利潤的一部分和出賣用不着的機器所得的錢，來購買該企業所需的機械。過去，這種設備投資是在國家管制之下。國家認爲必要的機械設備，無償移交給企業，企業本身無權隨便處理這個設備。現在，企業可以用它自己的收入隨意購置機械。這一來，企業自己所購的機械設備的所有權，當然就不屬於國家，而屬於企業“集體所有”。照這種情形下去，不須經過多久，所謂的“全民所有制”就要消失，都變成“集體所有制”。這不是完全走和社會主義相反的道路嗎？再從企業內部的僱傭關係看，是不是集體所有制，也很難說了。

原田：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問題的核心是由誰來掌握生產資料。蘇聯現在自稱有兩種生產資料所有制。一種就是所謂“全民”所有制，

另一種就是所謂集體所有制。工業方面一律屬於“全民”所有制，農業方面則分爲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存在着兩種形態的所有制。

按照蘇修的公式，一向認爲集體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的形態落後，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集體所有制逐漸轉變到“全民”所有制。但是最近又說集體農莊沒有必要向國營農場過渡。只要這兩者照舊擴大生產，規模越來越大，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最後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差別就歸於消失，從而到達共產主義社會。

佐久間：談起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問題，我有一次在上法律課的時候，向教師提出這樣的質問：“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既然同時在發展，規模越來越大，最後它們的差別將消失。到那時究竟是‘全民’所有制變成集體所有制呢？還是相反？或者兩者都不是，而產生另一種所有制形態呢？”那教師不回答我的問題，却罵我說：“不許你提那種別扭問題！”“你一定是個中國派，你提這個問題究竟含有什麼意圖？”（笑聲）

但是，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國營農場最近也和工業一樣，採用了所謂“新經濟體制”。因此，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一樣，國營農場可以用它的一部分利潤和自行變賣不要的機械而得來的錢，隨意添置生產資料。也就是說，這實際上也是向集體所有過渡。因此，蘇聯當局所說的這“兩者的差別將消失”，只能是一切所有制形態都

過渡到集體所有罷了。

足立：一般地說，所謂“全民”所有本身在理論上就是奇怪的。因為：暫且假定我們現在承認蘇聯的理論，集體農莊的生產資料屬於參加該農莊的農戶集體所有，除此以外就不屬於其他人所有。可是國營農場和國營事業的生產資料屬於“全民”所有，所以，集體農莊的農民也是所有者了。也就是說，今天的蘇聯是“全民”國家，國有就是“全民”所有。這樣說來，只有集體農莊的農民是雙重所有者。（笑聲）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教師在被問及這個問題時也說：“確實有矛盾哩。”

騙人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理論

原田：蘇聯把國有部門即等於社會主義部門這個想法，擴大到荒謬的地步。在這個問題上，它有一套“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完全騙人的理論，把所謂新興國家的國有部門說成是完全的社會主義部門。這個“理論”概括起來說就是：在蘇聯的援助下，阿聯、緬甸、阿爾及利亞、馬里這些國家，不是向資本主義而是直接向社會主義發展。因為究竟還不能說它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叫做“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這在過去是指印度，最近還把印尼和加納也算進去了。

在我們班級，這個問題受到了有力的批駁，老師因

爲無法說明，常常下不了台。可是，嚴重的是，勃列日涅夫到阿聯去，還發表了“阿聯在走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的演說。蘇聯把這個“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說成是列寧的理論，就連政治經濟學的主任老師也無法爲之辯解，他在回答問題時說：“我不了解。”

這個“理論”並不是什麼列寧的理論，它恰恰忽視了最有決定意義的政權問題。把那些連共產黨都沒有的國家，只因爲經濟的重要部門——從殖民主義者手裏沒收的部門實行了國有化，就說成是“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直接走向社會主義”，問題實在嚴重。

還有，把宣佈共產黨爲非法的國家、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納賽爾領導的阿聯，說成是“走着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赫魯曉夫還把“蘇聯英雄”的獎章送給納賽爾，這在蘇聯國內也不得人心。大家說，阿聯總統爲什麼會是蘇聯英雄？

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和蘇聯對它的輕視

新谷：蘇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時，是一個經濟非常落後的國家。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建立了優越的制度，才發展成爲今天的大工業國。這正是社會主義所達到的偉大成就，因而才能隨時都有開水供應，蓋起便宜住宅，上醫院上學校都免費。但是，這些都只不過是

社會主義給人民帶來的福利的很小一部分。像蘇聯現在的物質成果，只要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做出正確的努力，任何國家都是能够辦得到的。只就蘇聯在物質方面所達到的水平來說，除了軍事部門以外，實際上還趕不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如果以每人平均的消費物資的質和量作比較，蘇聯更是低得不在話下。可是，這十年來，蘇聯重視物的因素，輕視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和思想的因素。忘掉了過去帶來偉大成就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精神。

在龐大機構中工作的人，如果思想變質了，將會怎麼樣呢？那個機構就變成了一個空殼，越是龐大，就越成為障礙。這樣，那個機構本身將土崩瓦解。由列寧—斯大林建立起來的、給蘇聯人民帶來幸福的制度，現在正在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從根基上加以破壞。

佐久間：聽柯西金的演說，篇篇都露骨地表現出非常低級下流的物質主義。他說：“我國的文化革命在很早以前就完成了。現在到了具體地腳踏實地建設共產主義的階段。以電影院為例，按人口平均計算，蘇聯的電影院每年都在迅速增加。蘇聯今天出版書籍的數量，居世界第一。”

但是，跑到電影院一看，所有放映的影片不是間諜片，就是強盜片、全武行的喜劇片，醉鬼片和美國的西部片。在這種情況下，電影院越是增多，資產階級思想對人

民大眾的毒害越大。這就不是什麼接近共產主義了。至於出版物的增加，問題在於出版些什麼東西，那些小說是些什麼內容。看看今天蘇聯的出版物，其內容實在不像話。

新谷：柯西金在談到“新經濟體制”的演說中，曾這樣說：“有些人中傷我們，說我們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這些人忽視了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他們沒有看到今天蘇聯的權力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

簡言之，他們竭力詭辯說，在無產階級的政權下，不管怎麼吸收“利潤方式”，也不是資本主義。但是今天的蘇聯，早已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在資產階級專政之下實行利潤第一的各項政策，就只能是復辟資本主義，而不會是別的。

修正主義毀滅了社會主義

佐久間：特別是和朋友們談起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們都說：“社會主義國家還會侵略別人嗎？”我說：“現在如果還把蘇聯當作社會主義國家，思想就會混亂。蘇聯現在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

我有這樣一個比方，把社會主義比做一架飛機。飛機的本質在於飛。但是現在這架飛機的引擎已經損壞不能起飛，只能擱在那裏。只從外表來看的人，還說那是一架飛機。實際上這架飛機的引擎已經損壞，作為飛機

的本質已經失去了。

一架飛機不飛行，放在野外任憑風吹雨打，自然到處都毀壞了。時間越久，必然損壞得更加厲害。飛機越大，就越成爲障礙，所以，許多人就來拆它的翅膀、螺旋槳。再過些時日之後，飛機殘骸便變成一堆爛鐵。以今天蘇聯的情形而論，如果比做不能起飛的飛機的話，它的機翼、機身已經嚴重地損毀了。也可以說，它已經成爲棄置在野地上的一堆飛機殘骸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機翼和機身相當於經濟基礎。蘇聯已經大肆着手使社會主義基礎構造變質。所謂實行“新經濟體制”，等於再把飛機的螺旋槳全部拆掉。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因爲飛機的引擎已經損壞了。引擎在這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等於社會主義的靈魂。爲什麼引擎會壞呢？那是因爲共產黨這個飛行員變壞了。

新谷：宮本修正主義，好比是給這架壞飛機抹機窗玻璃的清掃員。

足立：過去的蘇聯，不僅飛機是優秀的，駕駛員也是高手。但是後來換了糟糕的駕駛員，所以飛機不是撞到什麼，就是失事墜毀，最後飛機不能飛了。歸根到底，問題在於駕駛員。所以說，不管制度怎麼好，但是駕馭這個制度的人是起決定性的作用的。

新谷：歸根到底，是這個新駕駛員要讓那架飛機向

哪個方向飛行。這裏的關鍵問題是，使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蘇聯和光榮的蘇聯共產黨變質到這種程度的現代修正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

佐久間：讓我再打一個比方。如果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比做一個人的身體，那末現代修正主義好比人體內發生的癌。修正主義這種癌，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體內部發生，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人體就滅亡了。

對於從外部襲擊自己的敵人，立刻能夠發覺，但是對於在自己身體內部發生的、要把自己滅亡的敵人，却看不出。修正主義，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偽裝，出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營內部，所以很難識破它的真面目。

但是，不管怎樣痛苦、流血，如果不動手術切除人體內部發生的癌，就要危及人的生命。這就是或者消滅對方，或者被對方所消滅。

足立：這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和癌症採取什麼聯合行動。（笑聲）

八、東歐各國的印象和蘇聯侵略 捷克斯洛伐克

新谷：關於蘇聯的情況，我們暫時就談到這裏。下面想把話題移到東歐方面。去年八月，發生了以蘇軍爲首的華沙條約組織的軍隊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到今年，又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現了燒身自殺的人，等等。東歐是一般人所關心的地區。

保 加 利 亞

新谷：感到保加利亞這個國家，是一個非常接近俄羅斯的國家。從蘇聯到了保加利亞，不怎麼有到外國的感覺，倒有點像到了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原田：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過捷克斯洛伐克。由於捷克斯洛伐克是斯拉夫民族，言語和俄語有不少地方相似。在捷克斯洛伐克，人們也像我們在日本學英語一

樣，在學校中要學俄語。但是我只要一開口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講俄語，他們馬上露出討厭的表情。

我到布拉格時，當地人最初以為我是中國人。他們知道我是日本人後，就討近乎說：“日本人都能說英語，你為什麼要用俄語談話？”

捷國民往往把蘇聯當作落後國家看待，另一方面，對西歐的嚮往和崇拜是根深蒂固的。他們說：“我們是歐洲的一員。我們同俄國人不同。”這比想像的還要強烈得多。

聽去過波蘭的人說，那裏同蘇聯、東歐各國一樣，對美國、法國等的外國商品非常有興趣。據說，出現了四、五個偽造美鈔的集團。還據說，在那裏美元的黑市行情漲風無止境。

匈 牙 利

原田：我曾去過匈牙利。匈牙利在那些國家中，膚色稍微不同，被當作異己分子。在布達佩斯，我們仍然被當作中國人。可是，這裏和別處稍微不同，黑頭髮黑眼睛的人受到了歡迎。因此，我們受到相當親切的接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這裏的學校教育也教俄語，所以年輕人一般都懂俄語，但是不願意用。這裏也同其他東歐各國一樣，使用

英語和德語很普遍。特別是他們對德國的嚮往，超出我們的想像。強烈感到反蘇親德。

新谷：對了。在東歐轉一圈，一般地感到，德國對這個地區的影響，比我們想像的要強烈得多。他們當然反對德國的侵略，但是對德國的高度文化和技術水平，確實羨慕。

佐久間：東歐國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法西斯主義下解放出來的。幾乎所有的東歐國家都進行了游擊戰的武裝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東歐各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先鋒隊的領導下，在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下，取得了獨立，也曾建立了無產階級的政權而推進革命。不少東歐國家過去都受過沙皇俄國的統治，後來又遭受納粹德國的侵略。因此，東歐人民具有強烈的保持民族獨立的要求。這一點則是東歐各國的普遍特徵。

東 德

佐久間：我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兩個暑假中，分別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去。在那裏，仍然感覺得到當地人強烈的反蘇情緒。這種感受可說是任何一個到東歐去的人都能體會得到的。像我們這些能操俄語的旅行者，尤其能強烈地感到這一點。俄語一說出口，對方

對你就不親切了。東柏林等地尤其厲害。

我在東柏林，住在大學的宿舍裏。我用俄語同住在同一房間的學生談話，可是他根本不理你。這個學生一句俄語也不講，全講英語。他只學了一年多的英語，而俄語因為義務教育，學了六年多。儘管如此，他還是講英語，不能講俄語。我問他這是為什麼？他說，在學校時雖然學俄語，但是沒有一個學生認真地學，先生也不認真地教，只要考試及格就可以了。

我在東柏林問路的時候，德國人看到日本人迷了路，親切地把我帶到公共汽車站。五、六個德國人陪着我，為不使我乘錯車，一直等到公共汽車來。在等公共汽車的人當中，有一個像是蘇聯軍人。我用俄語向他試探一下，他說是俄國人。我以為這下好了，遇到語言相通的人了，便同那個蘇聯軍人談起來。但我突然發覺，陪我等公共汽車的德國人都走了，顯然是因為我同俄國人交談，他們心裏有反感而走的。

在公共汽車裏，我同那個蘇聯軍人談話時，周圍的乘客臉上都不高興。這個蘇聯軍人在德國駐了三年多。我問他，你講德語不困難吧？他回答說：“不，我一句德語也沒有講過。”我問他，那是為什麼？他說：“俄語在德國是義務教育，用俄語可以講得通，所以我就全講俄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俄國軍隊有三十萬左右常駐在東德。老子是蘇聯人，把這裏給解放了——他們就是這

樣一種情緒。所以，什麼都用俄語，也就引起了對俄語的反感，促使反蘇情緒更加強烈。

我們在捷克斯洛伐克聽到的一個故事，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提出要建立海軍部。有人便問他：沒有海的國家爲什麼要建立海軍部？他回答說：蘇聯不是也有文化部嗎？意思是說，蘇聯是一個落後國家，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國家，可是有文化部。所以，沒有海的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海軍部有什麼不可以？

足立：培養這種感情是不好的。但是，從這個故事裏，反映出捷克斯洛伐克人一種情緒。蘇聯的資產階級大國主義的做法，越來越刺激這些小國的民族感情。類似這種反蘇情緒，實際上不僅存在於東歐各國，在蘇聯國內也有。蘇聯國內住着各種民族，所以與其叫做反蘇，不如叫做反俄羅斯人的情緒更正確些。

南 斯 拉 夫

原田：我曾到過南斯拉夫。這裏和東歐各國一樣，聽說我在莫斯科學習，感到非常奇怪。他們說，你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爲什麼特意要到蘇聯那樣的地方去學習？蘇聯有什麼值得學習的？

有這樣一個有趣的傳說：有一天，美國總統約翰遜和蘇聯總理柯西金，加上東歐各國首腦，出去遊玩。當

汽車走到一個岔道口時，汽車司機問約翰遜，向左開還是向右開。約翰遜命令說：“當然往右開！”汽車司機留下一個往右拐的標記，便駕車向右邊走了。接着柯西金的汽車來到岔道口。柯西金命令向左拐，汽車司機便留下一個向左拐的標記，開車向左走了。最後，東歐各國首腦乘的汽車來到了岔道口。汽車司機問他們往那個方向開？東歐各國首腦經過短暫的協商後，給司機下了一道命令：立一個向左拐的標記，向右拐！他們便去追趕約翰遜了。

這個故事是說：東歐各國首腦表面上是投靠蘇聯的，心裏完全向着西方。

羅馬尼亞

佐久間：我雖沒有到過羅馬尼亞，但想談一談蘇聯的羅馬尼亞觀。我曾兩次到過原屬於羅馬尼亞版圖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蘇聯一個加盟共和國的摩爾達維亞。摩爾達維亞的語言同羅馬尼亞的語言完全一樣，只是摩爾達維亞在合併到蘇聯後改用俄國文字。

我到摩爾達維亞的首都才知道，他們差不多都收聽羅馬尼亞的廣播。羅馬尼亞的廣播，從早到晚都是音樂。就說音樂，也不大廣播古典的，從早到晚都是爵士音樂。

蘇聯國內的民族問題

佐久間：摩爾達維亞的大學教育也是用俄語。所以，摩爾達維亞人感到不方便，想用自己祖國語言學習的心情是很強烈的。但只是到最近才用摩語對摩爾達維亞人上課，而且只限於蘇共黨史和政治經濟學這兩門課程。這也不是容易得來的。摩爾達維亞人想用摩爾達維亞語受教育，於是在學生中間掀起了簽名運動，徵集了大量的簽名，向蘇聯當局提出了這個要求。蘇聯當局進行鎮壓，把徵集簽名的首謀都下了獄。我去年到基希涅夫時，聽說他們還在牢獄裏。蘇聯當局的手法是，一面搞鎮壓，一面又答應他們的一部分要求。

因此，在摩爾達維亞等地，有着強烈的與其說是反蘇不如說是反俄羅斯的情緒。俄羅斯人同摩爾達維亞人打架，摩爾達維亞人揍了俄國人，這種事一下子就在摩爾達維亞人中間傳開了。他們還就這種事在各處牆壁上寫道：幹得好極了。

足立：這種情況表明，蘇聯當局已完全喪失了列寧—斯大林時代制訂的正確的民族政策的精神。因此，在全蘇聯，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已經有了裂紋。這裏包含着同蘇聯與東歐國家之間發生的種種問題一樣的問題。

新谷：蘇聯和東歐的關係裏，包含着俄羅斯民族和

東歐各民族的關係這樣一個民族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紅軍打敗了德國法西斯，相繼解放了東歐國家。那時蘇聯紅軍的軍旗上寫着“各國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把它改寫為“爲了我們的蘇維埃祖國！”。這是非常具有象徵性的，表明了蘇聯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怎樣起變化的。

蘇聯作爲解放東歐的戰勝者，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執行的東歐政策，儘管在斯大林時代就有許多問題，但是主要方面性質還是進步的。然而到了現代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上台後，蘇聯就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拋到了九霄雲外，成爲資產階級大國沙文主義。這樣，蘇聯就以解放者自居，君臨東歐各國之上，推行優先考慮蘇聯一國利益的各種政策，因而使東歐各國自上而下的普遍的反蘇情緒強烈起來了。

足立：同樣的問題在蘇聯國內也存在。例如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合併到蘇聯，成爲蘇聯的三個加盟共和國的。到過這三個加盟共和國旅行的人，和當地青年人一談起來就會了解，他們對俄羅斯人的蠻不講理和只顧自己利益的粗暴作風具有非常強烈的反感。對於強迫他們把學俄語當作一種義務，進行了強烈的反抗。

同反社會主義聯結在一起的反蘇情緒

原田：東歐的人們認為，自己是歐洲人，俄國人不屬於歐洲的範疇。自己作為歐洲人，有傳統，文化也高——這種自尊心或自負的情緒，非常強烈。捷克斯洛伐克等國更是如此。但是，在軍事方面，在實力方面，這些國家到底是趕不上蘇聯的，所以總是在蘇聯的實力政策下，感到很别扭。

由於這樣一種氣氛，所以像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等竟敢對抗蘇聯，實行捍衛本國利益的政策，在國民中博得了好名聲。

出現在東歐各國的反蘇情緒，常常和反社會主義情緒聯結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把今天的政治、經濟制度強加給他們的一方和被強加的一方，互有反感。這裏就存在着東歐各國的悲劇：反對今天蘇聯的資產階級大國主義，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是聯結在一起的。

佐久間：赫魯曉夫掌權以後，立即強迫東歐國家推行“斯大林批判”運動。

過去這些國家都有巨大的斯大林像，對斯大林崇拜得很。可是蘇聯一發生政變，這些國家黨的領導就向蘇聯新領導的方針看齊，採取同過去的路綫一百八十度轉彎的路綫。從此以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是根

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真正站在革命運動的前列來工作，而是成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在他們本國的代理人或發言人。這種行徑，就不能獲得人民的真正信任。因此，這些國家的領導一失去人民的支持，就靠蘇聯強制的力量來幹事了。不是採取符合國內實際、依靠羣衆的政策，而是爲了推行蘇聯大國主義強加的政策，當然也就不能不更加官僚主義式地行使實力硬幹。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前總統諾沃提尼，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完全不爲人民所信任。還有東德的烏布利希，今天在東德國內不僅完全不受尊敬，也完全不被信任。連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的領導人在背地裏也說：“烏布利希之輩，也是狗屁不如。”

因此，人民對於這些叫做共產黨、掛着社會主義招牌、說話不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傢伙的不滿和批判，本來就是對於既不是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又不是共產主義的不倫不類的東西的不滿和批判。但是，又很難走上追求什麼是“真”的方向。這首先是因爲，在這些國家，掌權的假共產主義者，不斷地宣傳這就是社會主義，這就是共產主義。

西方的思想、文化乘機而入

佐久間：結果，對於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反

感，而把眼睛轉向了西方。美國和西德等帝國主義者就乘機而入，放手進行反宣傳。在這些方面，不僅是通過宣傳、廣播，還通過文件、電影等，西方的影響大量滲透進來。帝國主義自由自在地進行文化侵略，一步一步地建立了它們的地盤。

足立：歸根到底，赫魯曉夫搞的“斯大林批判”，為這些東西開放了門戶。在這些國家，出現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社會主義國家上層建築的變質，羣衆感情背離社會主義等情況，可以說比蘇聯還早。在這裏，政局不穩。背離了民心的政權，只是在蘇聯的強制力量的支持下，才得以勉強存在。在這裏西方世界的風俗、習慣，比蘇聯早好幾年就流行開，例如爵士音樂、硬殼蟲、膝蓋以上的短裙、搖擺舞等。

沒有權威的東歐各國共產黨

新谷：把東歐各國和蘇聯在各方面作一比較，很有意思。如以黨的問題來說，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黨，在人民大眾中究竟有多大影響，得到多大的支持？蘇聯的情況是，一般地說共產黨還有很大的權威，還幾乎不可能公開地批評它。人民大眾不是不公開批評它，而是由於害怕它，而要躲避它。

在大部分東歐國家，共產黨的權威一落千丈。比如

聽到一個長期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學生說，他曾同一個學生談話，在談了許多之後，那個捷克斯洛伐克學生小聲地告訴他：“不瞞你說，我是捷共黨員”。他說這話好像怕被別人聽見。爲什麼不能大聲談論捷共黨員，因爲一旦被人們知道，就會被人們擯棄。這便產生了這樣一種情況：是執政黨的黨員，可又無臉見人，在社會上很拘束。

這在蘇聯是很不同的。例如蘇聯的學生黨員就非常傲慢地公開說：“我是共產黨員，同那些共青團的小子不同，比他們更高一級。”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黨，並沒有在本國人民大眾中間深深扎根。給人的感覺是，它們類似日本的自民黨和民社黨，沒有在一般人民大眾中間扎根，所以只是一些政客們在那裏搞政治。

東歐比蘇聯早一些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原田：在匈牙利，尤其是在青年中間，嚮往西歐的情緒很強烈。在這一點上要比蘇聯嚴重得多。在匈牙利，稍微離開首都布達佩斯到農村一看，是一片廣漠的荒地，也沒有自來水。城市和農村的差距大得驚人。就是在城市裏，中心地區和其他地方也有很大差距，貧富的差距也很懸殊。人民大眾對政治漠不關心，光想着自己發財。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萊德，在市中心排列着

豪華驚人的大廈，而小胡同裏却是貧民窟。貧富之差比別的東歐國家更厲害。乞丐很多。

佐久間：在東歐各國，同蘇聯比較起來，共產黨的權威低。還有這樣一個類似的例子。我到斯洛伐克接近蘇聯國境的城鎮科希策時，有一個聰明認真的學生給我們做嚮導。當來到一所好像早先貴族住宅的豪華建築物面前時，他說：“你知道這個建築物是幹什麼的嗎？”他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說：“這個建築物裏面，住着騎在我們捷克斯洛伐克青年頭上作威作福的傢伙。”你猜他說的是什麼，原來是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科希策市委員會。這是一個典型事例，它反映了人民對於黨和青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幹部的感情，這些人在犧牲人民利益的基礎上稱王稱霸。

從蘇聯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離國境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有個城鎮叫切爾納，蘇捷首腦會談就是在這裏舉行的。這雖然是一個國境上的小城鎮，但是到這裏便嚇了一跳：有五顏六色的霓虹燈等等，未免太資本主義化了。在布拉格街上走一走，就會懷疑我們莫不是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因為青年差不多都留着長髮，是英國硬殼蟲型的，商店的櫥窗裏擺着奢侈品，還展出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只穿特小的游泳衣的女人照片。

我在莫斯科聽一個在日本某政府機關工作的旅行者說，他到過貝爾格萊德。一出貝爾格萊德車站，突然圍

上幾個年輕的傢伙，說要幫他拿行李，帶他到旅館去。到了旅館，把行李放在走廊裏，進房間去呆了兩三分鐘。出來一看，行李全沒了，只剩下手上的護照夾。

新谷：四年前，有一個做買賣的人，經莫斯科去羅馬尼亞。他回來說：“一到布達佩斯機場，行李就被偷了。還有官僚主義嚴重，辦手續慢，買賣也不好做。”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蘇聯和東歐各國的關係

足立：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打敗了納粹德國，解放了東歐國家人民，這在世界歷史上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雖然南斯拉夫變了，但是其他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保持着非常牢固的團結。

但是，這個狀態，沒有長期保持下去。到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搞批判斯大林以後，東歐國家過去所保持的團結開始出現了分裂。赫魯曉夫對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人，施加了非常大的壓力，強迫他們接受蘇共第二十大決定的修正主義路線，並且讓他們把過去豎立在東歐各國的斯大林巨

像撤掉。對於拒不接受二十大路線的阿爾巴尼亞，赫魯曉夫就實行斷絕外交和經濟封鎖。

可是，這次赫魯曉夫下台了，勃列日涅夫出來了，他領導了蘇共二十三大。

我們聽說，在這個大會上，流傳着要恢復斯大林的名譽。東歐各國首腦聽到這個謠傳後，便向勃列日涅夫哭訴說：你不要恢復斯大林的名譽，你那樣做，我們就不能跟你走了，如果這樣一搞，又要引起嚴重的混亂。因此，最後在二十三大上連斯大林的“斯”字也沒有出現。

在斯大林時代，蘇聯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朝着正確方向走的，而在具體作法上，如在民族政策等方面，粗暴地、不走羣衆路線地強加於人，也相當多。到了赫魯曉夫時代，在路線方面完全錯了，陷進了修正主義，開始搞資本主義復辟。這樣，蘇聯就全面地加強了資產階級大國主義的強加於人，從此以後，東歐國家急速地變爲蘇聯的殖民地式的附庸國家。蘇聯在軍事機構方面，控制華沙條約組織，在經濟機構方面，控制了經互會，把東歐各國完全捆住了。

蘇聯實力政策的失敗

足立：“經互會”是按照所謂“國際分工論”，叫各國

按分工進行專業生產。這樣一來，東歐各國的工業結構出現了偏頗的現象，從而在經濟上不得不強烈地依賴蘇聯。特別是那些被規定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就更不合算了。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相比較，一向就是落後的。蘇聯當局用它的質量粗劣、但售價奇昂的工業品，換取這些國家的低價農產品。東歐各國的農業生產率很低，而生產成本則很高。東歐國家每年被蘇聯這樣殘酷榨取，對於本國的經濟發展極端不利。在這種情況下，東歐國家想充分動員本國的潛在力量，發展本國的工業，建立平衡的工業結構，是理所當然的。

羅馬尼亞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惡化，是因為羅馬尼亞開發多瑙河流域時，蘇聯當局强行介入並想從中撈一把。這引起羅馬尼亞從民族利益和經濟利益方面發出的反感。就這樣，蘇羅關係便出現了今天這樣的情況。

在東歐國家中，凡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為了保衛本國民族利益作出反抗蘇聯姿態的領導人，都很得人心。歸根結蒂，雖然戰後經過了二十年，蘇聯仍未能抓住東歐各國人民的心。它只是憑暴力進行壓迫。

佐久間：有這樣一個小故事：有一天，天氣很晴朗，諾沃提尼打着雨傘在布拉格的街上走。有人問他，你為什麼要這樣？他回答說，因為現在莫斯科正下着雨。這類小故事，在羣衆中廣為流傳。到其他東歐各國去旅行，便可以發現故事的主角，由諾沃提尼變為烏布

利希、卡達爾或哥穆爾卡了。這清楚地表明了：一，諾沃提尼等東歐各國的領導人完全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他們被認為是蘇聯的傀儡；二，對後台老板蘇聯有反感。

倒向西方的東歐各國——旨在賺取 美元的觀光事業

新谷：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到莫斯科留學時，還沒有發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論戰。我當時嚮往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而且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大概可以自由往來。但是，實際上到蘇聯一看，並非如此。

我一到莫斯科，立即發現中蘇關係已經很冷淡。當時，在《真理報》上幾乎看不到有關中國的消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到中國以及其他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去，已經很困難。同時，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到東歐去也已經很困難。

我想到東歐去，便到這些國家的駐莫斯科大使館去辦手續。這些使館非常官僚主義，態度十分冷淡。例如，到波蘭大使館去，對方突然問：“你有多少美元？”我回答說：沒有。於是又問：“連馬克和法郎也沒有嗎？”我回答說：“馬克和法郎也沒有。我想到在華沙的朋友那裏去玩。我到了那裏，我的朋友會照顧我的。”對方又說：“那我們要調查一下你所說的那個人，是否

真的在華沙。如果在，我們還要調查一下他是否有能力負擔你在波蘭逗留期間的費用。等調查清楚以後你再來。”從這以後，過了一個月，又過了一年，他們對我總是一句話：“國內還沒有回答。”但是，如果你要是說，我有的是美元，那麼，就會立刻給你發簽證。

東歐各國比蘇聯更早地由政府出面大力地收買和搜羅美元。所以夏季到布拉格去的美國觀光旅客一大堆，亂哄哄的。捷政府爲了讓這些美國旅客多花一些美元，設立了很多美元商店。

比東歐各國遲兩三年，在蘇聯也由政府出面開始拚命地搜羅美元。在莫斯科也設立了很多美元商店。這種商店裏，陳列着大量的在莫斯科的一般商店買不到的質量高的商品，價格低廉。但是，如果没有美元或西歐各國的貨幣，是買不到這些商品的。蘇聯人只能看一看。這樣一來，便出現了利用外國人進行大規模的投機買賣。例如在莫斯科，到一家最大的百貨商店去買東西，如果你拿外匯買，便把用盧布標明的定價減半，再折成外匯價格。

在美元商店經常看到陳列着日本生產的半導體收音機、照像機以及西方的香烟和酒類。蘇聯大概用木材換回日本的半導體收音機、照像機以及西方的商品，再把這些商品銷售出去，撈取美元。不管怎樣，美元商店是不能陳列木材出售的。（笑聲）就是這樣，蘇聯政府最近爲

了撈取美元，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無論是東歐或蘇聯，都由政府帶頭，拚命地撈取西方貨幣，並用它來購買西方商品。這樣一來，人們要面向西方，是自然的發展趨勢。

原田：在捷克斯洛伐克，按照法定兌換率，一美元換十四克朗。但是，還有一種旅行者的兌換率，一美元換十八克朗，外交官的兌換率，一美元換二十八克朗。此外，還有黑市的兌換率，一美元換三十三到三十五克朗。我們到了布拉格的火車站，一個年青人走過來問：“你是旅行者吧？有沒有美元？兌換吧！”

佐久間：在布拉格街道上，可以看到大批從奧地利來觀光的大轎車。在那兒，我遇到了一個日本人，他說，他在維也納聽說辦理捷克斯洛伐克的入境手續很簡單，所以就想試試看，於是到了這裏。只要有外匯，不管是什麼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熱烈歡迎。

其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邊境附近有個城市，叫做卡羅維發利。兩年前曾在這裏舉行過歐洲共產黨會議。這裏，從中世紀以來，就一直是歐洲屈指可數的溫泉城。這裏的外國汽車擠得水泄不通。街上到處都是美國人、西德人、法國人。這裏最大的一家旅館的字號，叫做“莫斯科飯店”。（笑聲）

新谷：在東歐各國中，在政治上與蘇聯關係最親密的是保加利亞。在保加利亞的街上行走，令人吃驚的

是，有懸掛着“壳牌公司”招牌的加油站。國際石油壟斷資本的達奇、壳牌公司已經在保加利亞登陸了。

原田：在布拉格的銀座——瓦茨拉夫大街的盡頭，可以看到東洋人造絲公司的霓虹燈。每年夏天，在布爾諾舉行摩托車比賽。我一到那裏，一些年青人知道我是日本人，便走過來，大談什麼“本田”牌、“鈴木”牌、“山葉”牌等，表現出他們對日本的摩托車的情況很熟。

新谷：在布拉格市內跑的有軌電車，簡直像前世紀的遺物，四四方方的，連門都沒有，很破舊。但是，莫斯科市內，跑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製造的有軌電車，坐起來很舒服，走起來不震動。這使人感到，蘇聯讓捷克斯洛伐克生產好車輛，然後又據為己有。

足立：像東德或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工業水平高的國家，在“經互會”中是出超的。它們手頭都有盧布。但是，盧布再多也沒有用。拿盧布買不到什麼東西。想買的東西，只有西方有。想買西方的東西，但沒有外匯。所以，就引進西方遊客，開設美元商店。

來自西方的經濟侵略——引進外資

佐久間：但是，用這種辦法賺取外匯，是有限的。於是，便開始從西方引進外國資本。例如，在波蘭建設

了福特工廠。我記得那是西德的福特。最近，意大利的菲亞特公司在莫斯科建廠。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到處都有“可口可樂”。

在經濟系開了一門“國際經濟”課。在課堂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同是一個德國，西德獲得了發展，而東德發展很遲緩，這是為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西德沒有因為戰爭而遭到破壞，而東德遭到了徹底的破壞。也就是說美帝國主義非常狡猾，在戰爭末期，只對東德進行了全面空襲。此外，蘇聯的副教授還有自己的說法：戰後，美國對西德大量投資發展生產，所以西德發展速度驚人。

而東德却相反，當地的一些工廠設備都被蘇聯當成戰爭賠償而掠走了。蘇聯總說自己的照像機和手錶好，豈不知這些東西都是用戰後從德國運來的機器製造的，而且這以後並沒有進步和發展，全都成了過時的東西。

新谷：東歐國家之所以要把眼睛轉向西方，還有一個原因。戰後二十多年，東歐國家的生產設備早就該更新了。但是，蘇聯的機器產品，從技術水平來看，是根本不行的。而本國又沒有能力製造。因此，便想從西方國家進口最新式的機械設備。西方國家便利用這個弱點，進行經濟滲透。

原田：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五〇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是百分之九點四，六〇年起驟然下降。六三年更嚴

重，竟然是負百分之零點六。所以，人民羣衆鬧事也是很自然的事。

足立：波蘭在革命勝利以後一步也沒有前進，仍停滯在原來的狀態。就拿文化方面來看，波蘭攝製的一些影片即使原封不動拿到日本，通過資產階級演出公司放映，也會受到歡迎。因爲影片充滿着資本主義的頹廢、墮落、虛無主義和絕望。再從農業方面來看，在那裏，單幹是主要形式，集體化根本沒有進展，而且也不想搞社會主義集體化。既然這樣，我認爲是不能叫做社會主義的。我甚至懷疑波蘭是否曾有過社會主義的時代！

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的老前輩

佐久間：一般說來，南斯拉夫無論如何也是修正主義的老前輩了。南斯拉夫幾年前幹的事，現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模仿，捷克斯洛伐克現在幹的事，過幾年後蘇聯也會照樣辦。所以，有趣的是，只要仔細看一看南斯拉夫變化的過程，就可以了解東歐的其它一些修正主義國家和蘇聯很快也會和南斯拉夫一樣發生變化。

南斯拉夫瀕臨亞德里亞海，是一個風光秀麗的地方。一到夏天便有許多西方遊客。住在海邊的人家爲西方遊客提供房屋。這在日本叫“民宿”。他們這樣幹一夏天，一年不勞動也可以生活。東歐的其它一些國家也想

和南斯拉夫一樣，招徠大批西方旅客前來觀光遊覽，賺一些遊覽費過活。

原田：在捷克斯洛伐克，幾年前還有反蘇和反政府的學生運動。“五一”勞動節夜晚，學生們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獨立運動發源地的廣場上舉行示威游行。開始提出反蘇口號，政府還允許，等到出現反政府口號以後，政府便下決心禁止這種游行。這就是說，反諾沃提尼的空氣在青年中間廣泛地擴展了開來。被諾沃提尼政府下令禁止後，學生們便採取不合法的形式仍然繼續搞，市民中也有人支持。政府終於壓制不住而解除了禁令。這是兩三年前的話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青年、 學生的示威游行

新谷：剛才談到的在勞動節之夜學生們舉行反政府游行的事，我到布拉格去的時候就聽說了。這是反蘇反共的游行，是反革命的反動游行。他們人人舉着標語牌在街上游行。馬路兩旁擠滿了許多觀眾，又是鼓掌又是照像。聽說他們還把街道兩旁的有色人種的外國人拉到游行隊伍裏毆打。有一次一個黑人挨了打。恰巧他是來自古巴的黑人留學生。古巴方面馬上提出嚴重抗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低頭認罪。古巴方面還要求保證今後不

再發生這類事件，可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回答說很難保證。於是古巴政府把在捷的留學生全部撤回國。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聽說在捷克斯洛伐克學校裏進行這樣的教育：我們的生活現在所以艱苦，是因爲我們“援助”了各個新興的獨立國家。對那個所謂的“援助”（笑聲），如果問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你們是怎麼想的？他們說，我們生活所以苦就是因爲上述原因造成的。而且捷克斯洛伐克人還有一種傳統的叫作“歐洲中心主義”的情緒，覺得自己是歐洲人而高人一等。這些事加在一塊，就發生了毆打黑人的事件。所以，聽說在布拉格的亞非拉各國留學生走路時都帶一把護身用的小刀。

原田：我在布拉格街上走，就有人把我當成是“中國人”，用英語罵我。有一次在總統府前面，有一個青年人特地把小汽車開到我跟前停下來謾罵。我氣憤極了，就用俄語叱責了他一頓，他才溜走了。他們認爲中國人好戰，要破壞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生活。

新谷：這件事是說明東歐各國怎樣對青年進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教育的一個好例子。

羅馬尼亞的“獨立自主”路綫

足立：齊奧塞斯庫領導的羅馬尼亞，在東歐各國中

採取特殊的外交政策。前些時候羅馬尼亞承認了西德。羅馬尼亞是在承認西德代表全德國的這樣一個基礎上，同西德恢復了外交關係的。對此東德當然要提出批評。可是羅馬尼亞發表評論反駁說：“羅馬尼亞採取什麼外交政策，這是屬於獨立自主的國家——羅馬尼亞主權以內的事，別國無權干涉。東德的一幫傢伙以評論家的姿態出現，對羅馬尼亞外交政策百般進行挑剔，干涉羅馬尼亞內政，真是豈有此理！”從東德來說，有一種被羅馬尼亞出賣了的感覺。羅馬尼亞的這種態度，哪裏也找不到一星半點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羅馬尼亞和其他東歐各國不同的是，不搞反華運動而抗拒蘇聯。除阿爾巴尼亞以外的東歐各國，都在蘇聯的授意下拉開嗓門參加了反華大合唱。在羅馬尼亞的廣播和報紙上，直到今天也閉口不談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羅馬尼亞為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大國主義外交政策而進行的勇敢鬥爭，在國際上常常起到好的作用。可是，羅馬尼亞領導人對國際問題的基本觀點，幾乎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想法相同。比如說，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羅馬尼亞領導人認為，發生戰爭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存在着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他們認為發生戰爭的原因在於，兩大勢力各自都結成集團而互相對抗。因此，消除互相對立和競爭的氣

氛，就可以實現和平。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第三勢力論”。

又比如說，一九六九年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二十周年，是到了重新研究這個公約的時候。這時，蘇聯不斷地發出呼籲：如果西方解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歐和蘇聯方面準備解散華沙條約組織。蘇聯還建議，如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能解散，則由兩個軍事機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這時，羅馬尼亞反對蘇聯的想法，它說：“西方組織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立即組織華沙條約組織與之對抗，正因為如此，才加劇了緊張局勢。現在呼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要它和華沙條約組織同時取消，是不對的。在呼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取消以前，首先應當取消華沙條約組織。如果蘇聯和東歐國家取得了緩和緊張局勢的主動權，那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就泄了氣，走向瓦解。”

前年年初，以色列侵略阿聯時，羅馬尼亞是東歐各國中唯一沒有和以色列斷交的國家，而且在戰爭發生後，羅馬尼亞最先向以色列派去了經濟代表團。在戰爭最激烈的時期，羅馬尼亞還向地中海的美國艦隊提供石油、從側面援助以色列的侵略戰爭。

羅馬尼亞是所謂奉行“獨立自主”路線的具有代表性的國家之一，它的國內外政策，用一句話來說，就是

“我願意怎麼幹就怎麼幹，別人不要插嘴，不要說三道四”。如果說蘇聯是資產階級大國主義，那麼也可以說，羅馬尼亞是資產階級小國民族主義。

宮本修正主義一伙打着“獨立自主”的招牌。但是只要是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上，就不可能有“獨立自主”就是國際主義路線這樣的怪事。如果認為：只要一個黨打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黨的招牌，那麼這個黨走向哪裏，就可以由這個黨自己決定，這就必然導致真正的戰鬥團結的瓦解。只是看表面招牌，而不去研究其內容和路線，那麼即使想團結，這樣的團結也絕不會實現，即使實現了，也必定是假團結。

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 “獨立自主”路線

原田：今天，構成宮本一伙判斷事物的最高標準，就是在議會選舉中是有利還是沒有利。“獨立自主”的理論也是由此產生的。

如果說“獨立自主”路線是絕對正確的話，那麼在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就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說：“我們不了解外國發生的事情。各個國家想要做什麼，可以任意去做。因此我們不去評論那些對日本無直接影響的事。”不就行了嗎？宮本一伙的下級黨員中也就有這種

人，他們對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困惑不解，他們說：

“不要去管在外國發生的事情吧！”

在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發生前不久，宮本一伙採取鼓勵捷克斯洛伐克搞“自由化”的態度。它在打給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義領導的電報中說：“你們要怎麼幹，聽便吧！”可是當蘇軍果真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反對蘇軍侵捷的輿論越來越強烈的時候，他們便慌慌張張地出來辯解，既像是“批評”捷領導，又像是開始“干涉內政”了。

他們所以要進行辯解，歸根到底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期望這次事件不要給下次選舉帶來不良影響。因此，他們不是真正站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的。比如說，對於去年初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捷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再生運動”的所謂“自由化”運動，宮本一伙不去觸及這個事件的本質，即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問題。以後，當蘇聯進行武裝侵略時，他們又迴避這是因為蘇聯已經墮落成爲社會帝國主義這樣根本性的問題。還有一個最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宮本一伙過去一直主張的要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結成統一戰綫、採取共同行動的論調是否正確的問題。他們甚至對這個問題也一貫佯裝若無其事。

新谷：宮本修正主義還有這樣一個慣伎，當發生某個問題的時候，他們就發表冗長的文章，講一通既不是

這樣也不是那樣的話來掩人耳目。（笑聲）到了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宮本一伙就更不知所云了。但是宮本一伙的基本觀點是：既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個“再生運動”是批判斯大林的捷克斯洛伐克版，是“獨立自主”傾向的發展，因而基本上是支持的。但是，把蘇聯看作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隨之也就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國家還進行侵略嗎？這一點是宮本修正主義無法擺脫的一個矛盾。（笑聲）

足立：如果以為只要堅持“獨立自主”，不論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什麼，因為它對日本革命沒有直接影響，所以也就可以不管了，就可以不要什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了，只要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就夠了。蘇聯也好，捷克斯洛伐克也好，它們的方向和南斯拉夫是一致的。可是宮本修正主義說，南斯拉夫是敵人，而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是朋友。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公認的。

“宣言”和“聲明”都是妥協的產物，其中既有正確的提法，又有錯誤的提法。今天，世界上沒有一個黨遵守“宣言”和“聲明”，就連宮本一伙也沒有遵守。宮本一伙只列舉“聲明”和“宣言”中對自己有用的一些提法，把它叫做“革命原則”，並且說什麼要根據這些“原則”團結起來。如果這樣的話，蘇聯豈不是也可以只選擇對自己有利的部分而稱之為“革命原則”了嗎？宮本一伙搬出就連

他們自己也沒有全面遵守的“宣言”和“聲明”，來顯示自己立場的正確，只能說是滑稽可笑而已。

宮本一伙的特徵之一，就是常常只看形式而輕視內容。所以，他們不去具體地分析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現實情況，就想憑一張破紙到處修修補補來解決問題。宮本一伙也是現代教條主義的典型。

新谷：現代修正主義已經篡奪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改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是當代共產主義運動所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全面地正確地解答了這個問題的是毛澤東主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然而，宮本修正主義在這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中，拋出了“獨立自主”路線。如果是這樣，那麼蘇聯五十年來就是獨立自主的，儘管如此還是變修了。只舉這樣一件事便可證明，“獨立自主”路線也絕對克服不了現代修正主義。

宮本一伙大肆玩弄形式邏輯，企圖說明自己立場的正確。但是仔細一看，宮本一伙的形式邏輯，全是實用主義的東西。如果要遵守“宣言”和“聲明”的話，就應當貫徹始終才對。可是却不如此。比如說對待中國，只因爲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說什麼中國共產黨現在連黨也不是了、國家也崩潰了，我不能同它共事了。可是中國共產黨不也是“宣言”和“聲明”所公認的嗎？這麼一提，他們就啞口無言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人民自

已主動進行的。所以，我想，他們會對這場革命說：請隨便吧！其實不然，他們還是像瘋狗一樣狂吠不止。這樣，宮本一伙的所謂“理論”完全是支離破碎的，破綻百出，無法彌合，瀕於破產。

宮本一伙墮落到今天這種地步，只因爲他們喪失了對具體事物進行具體分析的態度，先是死死抱住現成的公式不放，然後就玩弄形式邏輯，是他們採取了這樣一種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不相容的作風的結果。在今天的世界上，自稱爲“共產黨”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多得很。他們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實的、真牌的，只有進行具體的調查才能搞清楚。比方說，蘇聯老早就正式地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開始復辟剝削制度，侵略和壓迫別的民族。但是，只是因爲名字還叫做“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宮本一伙就強詞奪理地詭辯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比方說，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它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爲行動指南，而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想法，“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具體解釋，它適用於落後的俄國，而不適用於今天發達的捷克斯洛伐克。列寧主義的本質就是後來的斯大林主義，世人都承認它如何地壞。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只存在於深遠的人道主義之中，我們現在必須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可是宮本一伙還把這個根本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看作兄弟黨。爲什麼呢？因

爲這是“宣言”和“聲明”所規定了的。（笑聲）現在，我們來談談去年八月二十日發生的以蘇軍爲首的華沙條約組織五國軍隊，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侵略的問題。

從諾沃提尼到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 “自由化”的發展和蘇聯等五國軍隊的侵略

佐久間：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在談到蘇聯武裝侵略之前，要從去年一月以來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各個事件中來研究。談到去年一月到八月發生的各個事件，其初期是，杜布切克爲了上台執政而表演的醜劇。這個時期，蘇聯是支持杜布切克的活動的。到了後半期，杜布切克所點燃起來的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活動，已經升級到超出了杜布切克和蘇聯所設想的範圍。

正像已經談到的那樣，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對諾沃提尼所採取的向蘇聯一邊倒政策的反感、對捷克斯洛伐克黨和政府的官僚主義、腐敗、墮落的批評，以及反對蘇聯資產階級大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各項政策的空氣，長年累月地聚積起來了。特別是諾沃提尼的不得人心，已經達到了不可挽救的程度。

在這個時候爬上來的杜布切克，巧妙地煽動人民羣衆中的不滿情緒，甚至利用諾沃提尼官僚體制下的貪污事件，以及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之間的矛盾，把諾沃

提尼趕下了台。蘇聯因爲很清楚地知道諾沃提尼不得人心，所以想拋棄諾沃提尼，而以杜布切克來換馬，便支持杜布切克奪取政權。諾沃提尼一被蘇聯拋棄，就完全喪失了力量，所以幾乎毫無抵抗地交出了政權。杜布切克一掌握政權，《真理報》馬上就用整整一版的篇幅詳細地登載他的經歷，歡迎他的上台。杜布切克上台後不久，就到莫斯科去朝聖了。

後半場戲便由這兒開演。杜布切克是利用國內反諾沃提尼、反蘇、反社會主義的空氣上台的。但是他上台後，這些空氣也就自然越來越得勢，遠遠地超過了杜布切克和蘇聯所設想的範圍而更大地膨脹起來。所謂“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綫，本來是蘇共二十大提出來的，對蘇聯來說應該是什麼問題的。但是推行“自由化”的結果，捷克斯洛伐克要從蘇聯的統治下跳出去，這就很難辦了，而且捷克斯洛伐克又和西德問題聯繫起來。由於這些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企圖脫離蘇聯的勢力範圍而剛要和西德恢復邦交的時候，蘇聯採取突然出兵進行控制的舉動。

原田：去年年初，在華沙和布拉格，學生運動幾乎同時高漲起來。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我們當時在莫斯科是這樣聽說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支援越南人民的全國青年委員會組織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並指責政府。在這種形勢下，又開始揭發了在軍隊內部有人私吞

和侵佔了支援越南人民的資金。被追查的軍人，攜帶軍事機密文件和八千萬美元，逃到美國去了。而且這些高級軍官都是諾沃提尼的嘍囉。杜布切克很巧妙地利用人民對這件事的批判的高漲情緒，把責任全部轉嫁給諾沃提尼，趕走了受諾沃提尼庇護的人，而建立起自己的領導權。

杜布切克是斯洛伐克人，後來移居蘇聯的吉爾吉斯共和國，在那裏度過了少年時代。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政治學院學習，當時的講師就是勃列日涅夫。看了他的經歷，蘇聯判斷他是親蘇派，而歡迎他上台。

杜布切克是作為反對諾沃提尼過於向蘇聯一邊倒作法的勢力的頭目爬上去的。所以，杜布切克在國內如果不繼續打着“反蘇、反諾沃提尼”的旗號，便會失去人民的支持。以杜布切克推翻諾沃提尼為誘因，捷克斯洛伐克國內要求改變一向親東方的政策而親西方，拋棄形式上叫做社會主義的東西，大胆地推行資本主義復辟，這樣的空氣突然高漲起來了。

西德的威脅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

新谷：驅使蘇聯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兵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他們對西德軍國主義的恐怖心理，這種心理在俄國人以外的人看來，已經達到瘋狂的狀態。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捷克斯洛伐克搞所謂“自由化”，想要復辟資本主

義。所以，蘇聯才出兵加以阻止。可是搞“自由化”的老祖宗就是蘇聯，即使“自由化”搞得稍稍過火一點，也不至於發動戰爭。如果說因為搞了“自由化”就出兵，那就應該出兵到南斯拉夫，但是並沒有這樣做。不但沒有出兵，反倒向南斯拉夫討好。

如果以搞了“自由化”為理由而出兵，那麼東歐各國也都在以各種形式搞“自由化”，蘇聯就得到處出兵了。只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同德國問題有關係，會影響蘇聯的安全，所以蘇聯才反對。因而並不是反對“自由化”本身，更談不到因此而出兵。僅就同西德恢復邦交的問題來說，也可以這樣說，東歐各國最先和西德恢復邦交的就是蘇聯。如果說因為捷克斯洛伐克想要和西德恢復邦交所以才出兵的話，那麼羅馬尼亞和西德恢復邦交時為什麼不出兵呢？所以只能說，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恢復邦交將對蘇聯的安全產生直接影響，蘇聯是非常神經質的。

如果說因為捷克斯洛伐克要擺脫蘇聯的影響，不按蘇聯意圖行事，所以蘇聯才出兵的話，為什麼不出兵到羅馬尼亞去呢？羅馬尼亞不但不照蘇聯旨意辦事，而且每件事情還和蘇聯頂牛。

所以，在看這次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時，不看它同德國問題的關係，便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蘇聯的行動。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與西德和蘇聯都接壤的國家，

所以對蘇聯來說，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接近的話，蘇聯就會直接感到西德的威脅。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是位於現在羅馬尼亞的地方，那麼問題就會和現在大不相同了。

據報道，發生這次侵略事件時，蘇軍侵捷先頭部隊首先開進捷克斯洛伐克與西德的接壤地區。當布拉格市民問那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聯士兵“你們到這兒幹什麼來？”的時候，他們回答說：“因為西德要侵略，所以我們要來保護捷克斯洛伐克不受德國侵略。”聽到這些話，我們便可以明白，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考慮的是德國問題，並利用德國問題來給侵略行為辯解，以騙取蘇聯人民的支持。在今天的蘇聯國內，只要把西德的威脅作為藉口，無論怎麼做都可以說服人們。

展望未來，蘇聯決不會主動從捷克斯洛伐克撤兵而將繼續賴在那兒。這是因為：首先，這次蘇聯侵捷刺激了西德，西德和西方今後將更加增強軍事力量，因而蘇聯也不會後退了。其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內駐軍便可經常干涉捷內政。因此，我想蘇聯今後一定會把蘇軍長期駐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

作為社會帝國主義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

佐久間：蘇聯害怕德國軍國主義，這是鐵的事實。

但它還有另一個側面，即蘇聯作為社會帝國主義，它要東歐各國向它臣服。

我們可以把這一情況同美帝國主義的情況做一比較。美帝國主義是真的害怕中國。但是，美帝國主義以此為藉口，組織了反華軍事包圍圈，在中國周圍的一些國家設置了大量的軍事基地，並且駐扎軍隊，奴役這些國家，並使它們殖民地化。我認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現在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它東歐各國所幹的勾當，和美帝國主義在亞洲所幹的勾當是如出一轍的。這就是說，蘇聯非常害怕西德，這是事實，但另一方面，以此為藉口，企圖從軍事上、政治上控制東歐各國。

原田：中國或西德是否真的對美蘇兩國形成了軍事威脅呢？中國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決不會對其它國家進行軍事侵略。西德則作為帝國主義國家，不能說沒有再度侵略東歐各國或蘇聯的可能性。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況來看，西德僅憑本國的力量是沒有能力侵略東歐或蘇聯的，只有和美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才有此可能。事實上西德今天親納粹勢力的再起，其背後就是美帝國主義在撐腰，但是蘇聯却和美帝國主義打得火熱。總之，事情是這樣的：對於蘇聯來說，所謂來自西德帝國主義的威脅，今天在客觀上並不存在。相反地，蘇聯本身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西德帝國主義的威脅作為藉口，對東歐國家進行侵略，把這些國家納入自己的

殖民地範圍。

足立：最近西方資產階級報紙也在大事鼓吹美蘇進行“競爭性的和平共處”。這就是說美帝、蘇修兩個霸王要瓜分世界，各在自己的勢力範圍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從蘇聯今天的戰略來看，蘇聯的本意就是要盡可能地保持歐洲的現狀，一面騰出手來全力“遏制”中國。而官本顯治一伙充當了蘇聯的走狗。蘇聯接二連三地提出新花樣來，在中國周圍形成一個包圍圈，企圖孤立中國。但是，在歐洲，沒有採取積極手段去打開現狀。

特別是德國問題，力求與美帝國主義取得默契，共同維持歐洲目前的現狀。可是和蘇聯的如意算盤相反，在東歐國家，問題一個接一個地發生。這次蘇修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與其說是指望閃電解決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不如說，蘇聯非常焦急，企圖在問題表面化以前，就以力服人，盡可能早地把力量傾注東歐。

與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阿爾巴尼亞人民

原田：從青年的意識形態，可以看出這些國家的未來前途。

有個日本記者，到東歐各國旅行之後，回到莫斯科，和我談起對東歐國家的印象。他指出，當他訪問阿爾巴尼亞時獲得的強烈感受：一點是阿爾巴尼亞還很

貧窮，特別是農村貧窮；另一點就是阿爾巴尼亞青年的剛毅頑強、朝氣蓬勃的精神，這是在其他國家所沒有看到的。他們在恩維爾·霍查的領導下，進行着艱巨的建設工作。他們說：“我們現在勞動，不只是爲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建設，也是爲了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由於阿爾巴尼亞拒絕蘇共“二十大”決定的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對她採取了斷絕邦交以及施行其他種種壓迫。由於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接壤，所以也有可能遭到南斯拉夫的侵略。但是阿爾巴尼亞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朝氣蓬勃地從事建設。

佐久間：阿爾巴尼亞工業原本是很落後的，工業在國民總生產中似乎只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業也不够發達。革命後過了十年，赫魯曉夫一下子把在阿爾巴尼亞的蘇聯專家全部撤走。蘇聯的這種經濟壓迫，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打擊是非常嚴重的。阿爾巴尼亞人民爲了把革命進行到底，經受了一切困難，不斷地進行了鬥爭。

足立：在東歐，現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只有阿爾巴尼亞。其他國家，雖然各自都有些微妙的不同，但是，都被現代修正主義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並且已經陷於混亂狀態。

共產主義運動總是有國際性的。真正堅持革命的共產黨，無論是中國或阿爾巴尼亞，必然提出有關世界革

命的路綫。一個黨是否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是判斷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標誌之一。這和宮本一伙打出的所謂“獨立自主”的旗子一比較，就立刻是非判然。南斯拉夫在很早以前就以“走向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的道路”這一形式，提出過“獨立自主”。這些國家的目前情況怎樣呢？在南斯拉夫，從去年起不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了。“五一”勞動節本來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勞動人民的節日。

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一定會起來反對修正主義

新谷：現代修正主義給人民帶來了重重的苦難，迫使各國革命人民紛紛起來揭露修正主義集團的反革命罪行。雖然在蘇聯和東歐等國，人民的反修鬥爭現在還剛剛開始，但是可以相信，這些國家的人民必然日益提高覺悟，認清是非，最後投入解放自己的鬥爭。我們可以舉出這些國家人民起來反對修正主義的例子。

原田：在反修的最初階段，任何一個國家首先總是由學生、青年和知識分子打先鋒。例如在莫斯科，有些知道我們是支持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按照毛澤東思想進行鬥爭的青年，他們來到我們身邊，解開自己的上衣，讓我們看到他們內衣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和

上衣右側內袋裏面的《毛主席語錄》。然後，他們對我們翹起大拇指，意思是說：“這才是真正偉大的！”像這種情形，我已遇着好多次了。

我到東歐國家去旅行，在東歐的大學生中，也發現有些人組織毛澤東思想學習會。儘管他們的人數還不多。特別是在東歐國家留學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學生，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活動更是活躍。

佐久間：有消息說，在蘇聯國內，已經出現了斯大林小組的革命組織，這表明蘇聯人民內部已經開始產生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強有力的鬥爭！

一九六八年一月，我到了列寧格勒，住在一所大學的宿舍裏，聽到那裏的學生告訴我這樣一件事：

一九六七年夏天，列寧格勒大學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大學研究生、學生等一百幾十人被蘇聯當局逮捕了。據說被捕者都是文學系的師生。這些批評現在蘇共修正主義領導集團路線的人越來越多地集結起來，雖然他們還未達到結社的階段，但已形成類似沙龍那樣的集體。他們指責蘇修的農村、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等政策是一條根本錯誤的路線。他們的活動，被特務當局知道後，暗中派人潛入他們的集體，一次把他們全部逮捕了。這表明在蘇聯當局這樣嚴厲的統治下，蘇聯人民已經開始用行動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路線了。

我確信，蘇聯人民一定會站起來爭取自己的解放。